

军 绅 政 权

——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陈 志 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1
F3
254

军绅政权

——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陈志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军 绅 政 权

——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陈 志 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28,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00

书号11002·558 定价0.55元

序

三十多年来，我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转向政治军事史，现在又回到社会经济史。在这段漫长的时期中，我逐渐明白了我想找的答案，一个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化的途程中有那么多荆棘，另一个是那些荆棘怎样能扫除干净。也是逐渐地，我认识了前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的绅——军政权；后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一八九五——一九四九年的军——绅政权。本书分析的就是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年之间的军——绅政权。

我所指的军是一八九五年以后渐渐发展的军队，有时也考虑团防和土匪；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军——绅政权是这两种人联合统治中国的政权。

绅——军和军——绅政权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派系的分裂和无限制的斗争。这个特点后来在国民党中继续发展。两种政权的权力基础都是土地，由控制土地掌握资源来养兵。两种政权也就因此团要保卫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对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本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到七月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讲稿改写而成的。那时我能到京都是由于日本学术振兴会经济上的帮助。在这里我正式向学振会道谢。邀请我的是京大文学部长岛田虔次和人文科学研究所竹内实两教授。他们邀请的盛意和招待的周到，我衷心感谢。

绪 论

定义，范围，方法

近代军队主要的任务在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一方面对付外敌侵蚀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一方面对付内敌分割政府统治之下的土地与行政权。“敌”由国家最高政治负责人或负责的机关来决定，不由军队自己决定。这就是说，军队服从最高政治领导的命令，因此而产生统一的指挥和管理系统。这才是国家的军队，统一的军队。

这样的近代军队从民政机构取得军饷，给养，装备。它本身不干预民政。用中国军阀时代的话来说，就是军政和民政分开，军民分治。

近代的军队另一个任务是训练，教育在役的士兵，使他们在退伍之后有职业训练和就业的资格和能力。这样，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对国家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能提供积极的贡献。如果这个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军队也能因此面对现代化有所帮助。

但是一九一二——一九三七年中国的军队，既不对侵蚀中国领土主权的外敌保卫国家的主权，（十九路军上海之战是例外。）而又自己决定谁是“内敌”。即使有中央政府来讨论决定谁是“内敌”，那个中央政府也常为军人所操纵。一个军人集团所操纵的中央政府，也常常受到另一个军人集团的反抗。许多大小军事领袖的行

动不受最高政治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指挥。这时期中国没有统一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没有统一的军队管理系统。

这样一来，各个军事领袖必需在不同的程度上自筹军饷，于是不得不干涉民政。这是私人军队形成的基础。私人的军队和私人企业有些相同的地方。军官的主要考虑是筹饷来养兵；士兵和低级军官的主要考虑是当兵来找一条生路。能干的军官好象能干的企业家，能多找钱使军队的粮饷充足装备精良。钱多半来自农业，所以土地和农民变成了私人军队必须控制必须争夺的对象。私人的军队也必须控制一个区域中的民政系统，才能从那个区域中取得养兵所需的资料。

在贫穷的经济状况之下，能取得的养兵资源不多。这些私人的军队只能做到粮饷，装备，服装，没有余力兼顾士兵的医药，教育，文化生活，更没有余力照顾军人退伍以后的生活。这样的军队对国家的现代化无益有损。

中国产生了这样的军官和军人，就是军阀时期一切主要问题的来源。

定 义

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不考虑中国人，尤其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问题的看法。那是他们对他们的问题的了解，那样的了解对问题和问题的处理显然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国问题会变成外国人所了解的中国问题，会多多少少地失去了问题的真实性。但这只是真假的问题，不一定是对错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问题了解得既真实又正确，那么我们这些外国人又何必对中国问题插嘴？

远在一九一三年，梁启超就注意到中国的分裂，他称之为

“部落思想”。他说：“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之中又有其小部落。”^① 这些梁启超的“部落”到一九二〇年代初才被一些学者直呼为“军阀”。^② 但那时的官方文件，例如一九一九年南北和平谈判的文件，还说那不过是“集团统治”，既不是“部落”，也不是“军阀”。

到一九二二年直系奉系战争时期，张作霖与吴佩孚彼此说对方是“军阀”，^③ 但是自己还不承认自己是“军阀”。他们的看法是，自己在那里谋求国家的统一，消除统一的障碍。统一的障碍是“军阀”。那种人祸国殃民，无人道，无法纪，既不合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水准，也不合于国家的法律。

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改组，改组之后不用阶级分析而仍然用民族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军阀问题。^④ 那时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军阀有三个特点：（一）不顾国家利益，而且勾结帝国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二）不顾民众利益，自筹军饷，而且剥削人民以自肥；（三）不知有主义和党，不服从最高行政负责人或负责的政治机构，以致军队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不统一。

一九二四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沿用共产国际的定义，^⑤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明军阀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又得到地主阶级援助的军人，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指挥和管理系统是否统一，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定义中最主要的部分；那样的半殖民地

① 《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饮冰室合集》，一九三六年文集卷三十，十七页。

② 《胡适文存》，一九五三年，二集，卷三，一一一页；《陈独秀的意见》，见《胡适文存》，同卷，一〇九、一二二页。

③ 崇文书局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二集，一四六、一六〇页。

④ 《革命文献》，卷十四，五六三——五六四页；卷十六，四十六页；《汪精卫集》，一九二九年，卷三，一三八、一九〇页。

⑤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七十八页。

半封建军队，即使指挥管理统一也是军阀的军队。这样的定义，可以用于袁世凯，也可以用于蒋介石。把军人和地主合成一个统治集团，比较合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定义。从这样的定义才演变出毛泽东的定义：

“脱离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①

我们所采用的定义是：（一）中国从所谓的绅士或地主政权建立之后，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那是绅——军政权。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军人的势力壮大，中国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却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受军人操纵；各地方的县长，乡长也受军人的操纵。这种政权我们叫作“军——绅政权”。（二）这种政权在朝代递换时期也有过，但是中国近代军阀勃起于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以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的军队和军阀。（三）但是，这些军阀和“军——绅政权”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民族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四）他们在一九二三年曹锟当选为总统以前，不服从最高政治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的命令；在曹锟当选为总统之后，直接操纵最高的政治领导机构。指挥和管理系统一直不统一。（五）于是他们自筹军饷，拥有防区或行政区，强迫行政区筹集军饷。

这样的军队不同于中日战争以前的湘军淮军，因为湘淮军还是由文人（绅士）行政长官所领导的军队，指挥和管理系统相当统一。军队的粮饷，装备仍然由行政长官负责，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免，中央政府还不是由军人操纵的政府。湘军为了对抗内

^① 《毛泽东选集》，卷一，八十八页。请参看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の研究》，一二〇——一三一页，一三四——一三五页，二七七——二七八页。

敌而组成，淮军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而对外敌作战，而且一八九五年和一九〇〇年为了对抗外敌而惨败，消灭。内敌外敌都是由最高的政治领导所决定的。

国民党的军队是否是军阀的军队哩？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国民党军队也不保卫国家的主权，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东北被侵略时也不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国民党的军队仍然分作许多派系，指挥不统一，管理也不统一。待遇有差别，嫡系的军队和所谓的“杂牌”队伍，待遇很不同。因此许多军队不得不自筹军饷，占据防区；因此各派军队之间时常有内战。

把范围缩小一点来看，蒋介石的军队是否是军阀的军队？除了上述的几个特点之外，他的军队是否是军阀的军队，得看“合法”与“不合法”。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政治领导由蒋介石本人操纵，那个政府没有宪法的根据，没有经过民选。它的“合法性”不以法律为根据，而依靠外国的承认和国内的一些大的政治势力的拥护。

团结国内那些政治势力的理论是三民主义，组织是中国国民党。党之所以能为最高的政治领导，因为三民主义上规定了一个“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党的工作在训导人民，不在发动人民参政。这样一来党变成了传统的绅士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拥护的组织，而这些人又受大军人的操纵。蒋介石的政权基本上还是“军——绅政权”，同时加上一些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支持。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战争，迫使蒋介石的军队为国家主权而战，那就是所谓的“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在那次战争中指挥系统趋向于统一。除此之外，自筹军饷的办法并没有完全停止；基本上的“军——绅政权”也没有怎样改变。

尽管在外表上跟军阀时期的军队不同，但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甚至蒋介石的军队，仍然是军阀的军队。

范围，方法

虽然在以后的十四章之中，我们会提到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以前和一九二八年北伐结束以后的事，这十四章主要的范围是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的发展。有的人以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和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为中国军阀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

在这样的时间范围之内，我们分析的不是军阀史，而是军阀时期的历史。我们所用的不是传记方法，传记只能包括少数重要的军人。如果以旅长以上这一个时期的军人为军阀，我们应该考虑的有一千三百个军阀。差不多关于所有的这些军阀，我都收集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不能看出他们每一个人发展的经历，但可以看出他们大体上发展的轮廓。许多小军阀，在乡下，在偏远的地方剥削人民的军阀，跟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很不一样。研究军阀时期的历史，也应该考虑到他们。

我们自然也应该考虑士兵，没有士兵也就没有军队和军阀，而军阀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养兵。兵养得愈多愈好，军阀的权力也就愈大；一旦失了兵权或失了兵权，军阀连自己的生命财产也难以保存。失掉了兵权的军阀的处境比破了产的企业家更危险。

我们不怎么样注意军队的编制，训练，驻防，战略战术，装备等等，因为这十四章不是纯粹的军事史。我们要分析的是军阀时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变迁。这些变迁产生了军阀，也因为军阀而促成了变迁。我们的任务在于分析这些变迁——原因，形态，过程，和结果。

一方面我们注重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而注重思想的变迁。某

些政治，社会，经济的结构在军阀时期衰亡，某些其它的结构在发展。某些思想被遗弃，某些思想被接受。军——绅政权是促成这些变迁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它也刺激起反抗的力量。两种力量的角斗促成了新的变迁。

军阀时期一个显明的特征是“分崩离析”——政治，社会，经济都分为派系，或分为省和省以内的区。我们把这两种分裂叫作“派系”和“地区”，也不妨叫作“派系主义”，“派系观念”和“地区主义”，“地域观念”。这当中又有结构和思想的问题。这两种观念代表各种势力，包括各种结构和思想。

这样的“分崩离析”是否等于中国史上的“战国”，“南北朝”，或“五代”？“战国”是中国统一以前的事，向着中国的统一而发展。“南北朝”和“五代”是中国已经统一以后的事，但是在中国民族主义觉醒以前的事。近代中国造成的“分崩离析”，是以民族主义勃兴为背景的。这是近代中国分崩离析不同于先前的分崩离析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否把军阀割据跟民族国家分割世界来比较？能否把中国当作世界的缩影？能否把省或防区看成一个一个的独立国家？

我们的看法是：（一）派系和省区都不是独立的主权单位。省或区宣布过“独立”，也取消过“独立”，但他们所谓的“独立”跟民族国家的独立不同。他们“独立”的主要考虑是某一个时期的中央政权，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不能代表他们所了解的“合法”或“正统”两个观念，也就是不能使他们的权力“合法”或合于“正统”。一旦中央政权合于他们的要求，“独立”也就取消了。（二）中国的中央政权不等于国际联盟，也不等于联合国。北京或南京的中央政权应当能代表“合法”“正统”，应该是“合法”与否的最高决定者，国联和联合国却都没有那样的作用。国联或联合国只能决定

国际行动是否合法，不谈正统，也不管“内政”是否合法。也许有人会说国内的种族歧视政策会引起联合国的干涉，但干涉的方式跟中国中央政府干涉各区内政的方式很不同。(三)最不当的是，如果把中国的分崩离析看成一个国际体系，那么帝国主义又放到哪里去呢？是否在内战(等于国际战争)之外，还要加上“星球之间的战争”哩？

第一章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

官, 绅, 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消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奋图强为长期政策。一八九五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一八六〇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度的信心。一八九五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一八九五年《下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参

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 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粤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一九〇〇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一九〇五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硷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

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黜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一八九四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一九一三年的五百四十九家。^①投资从一九〇五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一九一三年的一亿二千多万元。^②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致于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一九〇〇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日本去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〇·四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加上盐房,仓房,承发房。一九〇〇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③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九五七年,卷一,序及第四章。

② J·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California, 1976, 71.

③ 参考《剑阁县志续志》,《湖北云阳县志》——两者都是偏僻的县。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事，无知无识的民众没有份。民众由他们领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众参加，他们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乡绅，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①

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最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

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

^① E.P.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Michigan, 1977, 8.

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

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一九〇〇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

这样我们就转到一八九五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

练新军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主要的目的在保卫京师。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间编练成了五个武卫军,在义和团之战中损失了四个,只有驻扎在山东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得以保全。一九〇一年与一九〇七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中央政府委任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一九〇七年规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各省才开始练新军,目的也在维持国内政权的安定。

一九〇五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九〇七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

表，后者以蒋介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

不久，在中国的新军中有了两种军官：行伍出身的，甚至连字也不认得的军官；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军官。一般地说来，在北洋军系统之中，留日的军官比较少，留日而升为师长旅长的更少。在各省的新军之中，留日的和留日军官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多。这些留日的中国军官，在日本时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又和在日本亡命的中国革命党人接触。那时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之中，学者和军人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①

新军军官究竟有多少是知识分子，很难估计。以湖北的新军为例，一九〇五年加入新军的人，九十六人之中有二十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第三十二标(团)之中有二十到三十个有知识的军官。^② 这些有知识的军人，尤其是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军人，一方面能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一方面受过革命派的宣传，他们多半认为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

练新军为了安定清室的政权，练新军的结果是南方各省的新军反而成为革命的基本的力量。历史上常有这样的讽刺。

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对秘密结社的民众进行了联络和宣传的工作，最显著的是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起义。这次是由哥老会领导，反满的革命。在他们的宣言中虽然提出了建立民国的政纲，但是中国秘密结社的组织和作风却蕴含着顽强的传统的势力。不止是萍浏醴起义，孙中山依靠洪门(三合会)领导的好几次“边境革命”^③ 都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这似乎证明了各个秘密结

① 《辛亥革命》，一九五七年，卷二，十一——十二页。

② 《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六十三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一五八——一五九页。

③ 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一九七八年，松本英纪论文。

社团结行动之困难,也证明他们发动群众的能力有限。

但这并不是说秘密会社反满的情绪,要求社会正义的情绪对清室的覆亡没有贡献。正相反,他们在好些省份之中,例如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东等,摧毁清室的绅士政权有过很大的作用。四川绅士领导的保路运动变成群众性的保路军,广东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军就是很好的例子。

总结地说来,一九〇〇年代中国的绅士集团分化了,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了军队,与军人群众结合,要求共和;有的与秘密结社联络来推翻清室;大部分都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

在有组织的群众之中,军人反满,要求建立共和国体和政体;秘密结社反满,但没有显明的建设性的政纲。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呈现出离心的倾向,在这个倾向之中,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就结束了。

第二章

政治的离心力(1912—1913);

各省

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因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府是从州县，省，到北京，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的最高点。一切情报，建议都集中于北京；一切命令由北京转达到省和州县。凡是政策的决定，官吏的任免，由北京考虑，决定，批准。附属于这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还有全国的军事系统，财政系统，司法系统，消息传达的系统，都同时以中央政府为最高点。

中央政府也是礼教，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中心。圣明的天子，居于天人之际，主持国家最隆重的祭典，也主持全国最高的考试，选拔英才，赋予治国的责任。他之所以能担负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责任，因为他是“内圣外王”的完人。

这一个完人，以法治天下，更以德治天下，那才是王道。那样的政权才是合法而且有道的政权；那样的政权才能是合法与有道的最高裁判所。

从政治结构和政治社会思想两方而来看，中央政府都是国家的中心。

省是北京之下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省的划分依据地形，经济，和社会因素，也依据历史传统。省会是一省行政，教育文化，经济生活的中心。武汉之于湖北，广州之于广东，就是

例子。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保定，那是晚近的事，算是例外。

省是家族居住的地方，代表大体相同的方言，大致一样的生活习惯。广东人吃广东菜，四川人看川戏。一个省侨居外省的人有会馆，同乡会，商帮，例如江西帮，陕帮。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增强了中国人对本省的亲切之感。

一个省虽然在经济上常常不能自足自给，需要和其它省份发生通商关系，但行政上可以自决，在社会意义上是一个大的单位。自决不等于独立，省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个体。基本的原因在于它不能代替中央政府尽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它不能是有道无道，合法违法的最高裁判所。

一八九五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变化更快。北京作为最高的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裁判所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经过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北京在那两次战争中仍然不能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据改良者的看法，那是因为上下壅塞，也就是在朝在野的士绅，中央和省之间没有大开意见交换的途径，所以他们要求成立学会，国会，省议会，也要求立宪。这也就是说政府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来代表绅民的公意，所以必需改革。据革命者的看法，以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本大和民族的学说，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国体政体必须改变，另一方面认为“劣等的”满族统治“优秀的”汉族的局面必须推翻。

清室之迟迟不立宪，改革不彻底，使要求立宪的改良者失望，同时也证明了革命者判断的正确。为了使革命比较“文明”，改良和革命两大思潮趋于合流。

辛亥革命之中和以后，北京与省之间的关系政变了。

首先是许多省份宣布又取消了独立。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的省

独立的作风，并不等于说省脱离中央而变成象外蒙古那样的独立国家，外蒙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宣布真正的独立。一九一一年省独立的意义有两个：（一）行政上暂时跟北京断绝关系，不再承认北京是全国行政，财政，司法，军事系统的中心；（二）暂不承认中央政府是全国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最高裁判所。这两点是各省宣布独立的中心内容。单从这两点来看，一九一一年省的独立和太平天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什么分别。分别有，那在于一九一一年的省独立是暂时的，而且独立以后的新政权是由尊崇中国旧文化传统，在社会上根据旧标准而有地位、声望的人推选的。新政权的阶级意义保证了独立不过是暂时的。

各省的独立由三大势力所促成：第一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绅士；第二是拥护或同情革命的军队；第三是反满的秘密结社所领导的群众。这三个势力在不同的省份中组合的比例不同，于是新政权里，军政府里，权力的划分也就不同。

使军政府合法有道的势力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绅士，他们暂时代替了北京作为合法有道的裁判人。但他们不敢担任最高裁判人的职能，那是冒天下的大不韪，有篡夺的嫌疑。他们合的法是文明的法，有的道是传统的道。换言之他们参加或同情革命，使革命过程中对绅士阶级的财产生命，破坏得少一些，尊重得多一些。但一经宣布了独立，省一级的绅士和中央的绅士对立了起来；既然革命要合法有道，要“文明”一些，他们也跟秘密结社领导的群众对立了起来。在对立之中，一方面要派兵对抗中央，另一方面要派兵镇压群众，这样才能保护绅士们的新政权，生命，财产。军队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少的保卫工具。

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央军队和革命军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是湖北，其次是江苏，再其次是山西。在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东北三省之中，中央的势力根巩固。此外的宣布了独立的省份里，地

方绅士最迫切的敌人不是中央而是秘密结社所领导的群众。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南,安徽,广东,绅士和秘密结社的斗争尤其尖锐。这六省之中,除了湖南表面上由绅士领导,广东表面上由国民党(同盟会)领导之外,其余都是由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在军人势力强大的湖北,云南,山西,江西,自然也成立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在秘密结社势力比较弱的地方——江苏,浙江,福建,成立了绅士领导的绅——军政权。各省的权力就是这样划分的。

到清帝退位之后,各省取消了他们暂时的独立。新的中央政府,先在南京,后来搬到北京,承认革命过程中的既成事实。二十二省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绅士。

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三个势力的表现怎样呢?

革命的新军比较团结,相当守秩序。新军在革命中乱来的例子不多。他们和绅士合作成为推翻清室同时又维持地方秩序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四川的情形可以用作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川成立军政府时,军人和绅士讨论是否实行军民分治。意想不到的是军人赞成分治而绅士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袍哥(哥老会分子)横行,如分治,恐治安不易维持。”^①同时在广东,陕西,江西,湖南,某些军队领袖以为自己没有“资望”,缺乏行政经验,不能使军政府合法有道,所以把领导权让给绅士。

绅士们颇不团结。省一级的地方开明绅士有的支持革命,有的首鼠两端;州县绅士直接受到群众的威胁,看不出革命对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所以反对革命或对革命冷淡。有些地方绅士在革命中的表现比较好,有的却不令人钦佩。一般说来,清室的地方官很怯懦,“殉节”的很少。甚至支持或同情革命的绅士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九六三年,第三册,三十九——四十页。

也忽左忽右。山西：在北洋军攻下太原时，宣布了独立的绅士又挂起了龙旗，又拥护清廷。^①所以山西革命军领袖姚鸿发说：“一般腐儒，有何能为？”^②安徽：合肥的绅士一面支持一面反对革命。四川：尹昌衡就任都督之后，会党到处滋事，绅士们竟请已经下了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派清兵去镇压。山东：绅士们宣布了独立，立刻求皇帝宽赦，清皇帝批准他们的独立。袁世凯大兵压境，绅士们竟自取消了独立。这样的表现例子还很多。

秘密结社或会党的表现一般地都很不好，很幼稚。除了安徽的淮上军以外，其余到处捣乱，生活习儒很腐败，他们没有建设新政权的蓝图，只起了些清极的破坏作用。

军——绅政权的团结并不是没有破绽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有了临时约法，于是地方绅士的合法有道功能减小了。绅士们的钩心斗角，腐败的传统作风，使所谓的“行政经验”，“资望”，“能力”等等理由变成了荒唐的神话。绅士们的地位很快地就一落千丈。军绅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彼此依存的关系。但是军政府和以后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一面要养兵，一面要发展民政工作。这样的矛盾在革命以后因为需要扩军也需要整顿民政面不断地尖锐化。

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军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领导地位已经奠下了基础。军人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

革命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制度关系是怎样的哩？

临时约法没有提到省制，但在一九一二年对省制有两个重要的考虑之点：第一，行政区和军政区，行政长官和军政长官的职

① 见本章附录，《辛亥革命》，第四册，一八〇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册，一一五页。

权如何划分？大家希望的是军民分治，大家承认的是既成事实。第二，民政长官是民选抑或由中央任命？^①从省的立场来看，希望的是地方分权，也许最后达到地方自决（self-government）；从中央的立场来看，希望的是中央集权，这样才能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最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省制没有解决之前，袁世凯总统的措施加深了中央地方的矛盾。他委派了汪瑞闳为江西民政长官，这是江西都督李烈钧所不能容忍的。都督一旦失去了财政大权，他养兵的能力，军权，政治地位都会成问题。接着袁世凯又调换了安徽和广东的都督，以孙多森代柏文蔚，以陈炯明代胡汉民。这就挑起了一九一三年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之后，中央在建立省制和任免省政府人员方面的权力增大了。先是袁世凯修订了临时约法^②——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人员。然后是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宣布的约法，正式赋予大总统中央集权的力量。

财政是其次的一个难题。“革命之后，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③一九一三年各省承担解给中央的款项是三千二百五十万，实解不过五百六十万元。^④但是据财政部的报告，自民国元年到二年十二月，各省实解才二百六十万元！^⑤不解款受惠最大的是地方绅士，他们不交田赋；不解款吃亏最大的是中央政府，只得靠借钱度日。这又说明中央集权的必要。“第二次革命”之后，中央财政才渐渐好转。盐税交外国人管理，地方军人绅士不敢截留，收入增加了。^⑥一九一三年十月到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外

① 黄远庸，《远生遗著》，一九一九年，卷二，一八六——一八七页。

② 《政府公报》，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③ 吴鼎昌，《大借款与财政的将来》，《庸言》，卷一，十三——十四页。

④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一九一七年，卷一，四十七——四十九页。

⑤ 《政府公报》，一九一三年八月七日。

⑥ F.O., 371/1948/28726, Jordan to Grey, Junell, 1914.

国人管理之下盐税收了三千四百万，交中央的盐余(还了外债之后的剩余)一千一百万。各省的解款也增加了，一九一六年各省竟解了二千多万元。印花税，验契税，烟酒牌照税，其它中央的专款也增加了一千多万元的收入。^①一九一六年可以说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收入最健康的年头。

裁兵是再其次的一个难题，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据财政部长周学熙的“财政方针说明书”，^②全国约有兵一百万，如裁减之后留五十师，新编练五十师，需费一千五百万元。这样的巨款何从而来？结果是发很少的钱甚至不发钱，把军队遣散，或另外收编。譬如一九一三年四月广东还有十万民军，据说解散了九万。^③但是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报告，广东只解散了或者裁了半个师。^④再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材料，只有江苏在黄兴主持之下，裁兵比较有成绩，一共减少了七个师。裁兵没有成绩，造成了县区和乡区由小军人统治的局面。例如福建的永定上杭一带，小军人派军饷，拉伕。四川的乡绅当团总，县长也要跟军队的司令长官有亲戚或朋友关系。各县的支出，跟省和中央的支出一样，多半用在军队和团防身上。^⑤

黎元洪在一九二三年恢复大总统职位时的通电，适当地总结了那时中央和省的关系：“二年之役，则政党挟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依督军为中心。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⑥中央和省的基本矛盾是军人的势力无法消灭。于是政党

①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一九一七年，卷一，六十七——七十二页。

② 周叔慎，《周止庵先生别传》，一九四八年，八十二页。

③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九六二年，卷二，五一四页。

④ E. P. Young, *ibid.*, 101.

⑤ 魏金山等，《金砂暴动》，一九五七年，七——八页；沙汀，《短篇小说集》，一九五三年，四十三页；沙汀，《苦难》，十二——十三页；《中国农村》，卷二，第九期，四十一页。

⑥ 《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二集，一八一页。

和政客(绅士)依附于军人。从社会势力集团的势力来看,或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都是如此。

附录:辛亥革命时期宣布独立的各省

湖北	十月十二日	陕西	十月二十二日
湖南	十月二十四日	江西	十月二十四日
山西	十月二十九日	云南	十月三十日
贵州	十一月四日	浙江	十一月四日
江苏	十一月四日	广西	十一月七日
安徽	十一月八日	福建	十一月九日
广东	十一月九日	山东	十一月十三日

(十二月七日取消)

四川 十一月二十二日 蒙古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河南,直隶,东三省,内蒙古,西藏,青海未宣布独立。

宣布独立后各省政权形态:

中央政府仍然可以统治的省区——

直隶,河南,山东,吉林,黑龙江,奉天,内蒙古,甘肃,青海

由于秘密结社抬头而成立的军绅政权——

陕西,四川,贵州,安徽,广东,湖南

由于秘密结社势力微弱而成立的绅军政权——

江苏,浙江,福建,广西

由于新军势力壮大而成立的军绅政权——

湖北,云南,山西,江西

第三章

南北之分

分崩离析的中国表现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双重的分崩离析，而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让我们先看看中央不能控制的地方。

分析地方问题时，一般以省为分析的单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各省的情形不同，没有一个省可以代表别的省。军阀割据时代，各省之间的差别更大。要是一个又一个的省仔细地来研究，那对中国人有意义，有必要。但是对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史或中国问题的人，分省研究不但人手不够，而且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在这一章之中，我们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分析几个大的区域——北，南，和南北之间的分界线或分界区。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分法。写军阀时代的人常常说“北洋军阀”，“南方军阀”。我们的划分方法承袭“北洋”“南方”两个观念，进一步加以解释，希望能看出一些比较固定，比较确切的意义。

“北”是一个单位，因为在我们所谓的“北”之中没有南方的军事势力。“南”也是一个单位，其中没有北方的军队。“北”包括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的北部和中部，湖北的东部和中部，江西的北部和中部，福建的东北和中部。“南”指的是云南，贵州，广西。在北方山西是一个中立或孤立的区域；在南方广东是一个各派势力角斗的场所。

在东部北部的平原地带与西部南部高原之间是一个广大的缓

冲地带，包括陕南，四川，鄂西，湖南，赣南，闽西北。这一个大地区位于秦岭以南与武夷山以北，属于长江的中上游。这个区域里有几条大江可以上溯或下驶。汉水可以上达沔县，长江可以上行到重庆，嘉陵江可以上溯到陕南，湘江可以直通湘西南，赣江可以上驶到赣南，闽江及其支流可以通到闽西北。这一个区域中的山形成山麓地带，高度在五百到两千公尺左右，使它的地形不同于平原和高原。因为河流可以上下行，这一个区域对南对北都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只有水路和小道，而没有公路铁路的情况下，水道能上下行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因素。

于是，这个区域是统一中国必争之地。

南北问题是在一九一三年内战中提出来的。那次内战的结果是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陕西都由袁世凯的人控制，北方于是严重地威胁到南方势力的安全。一九一六年反袁之战，削弱了北方在四川，广东，湖南的势力，同时中国有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和肇庆军政府（以后是广州的护法政府），而且南方的势力伸向山麓地带。

南北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两个：主战与主和。

主战，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人有两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中国非统一不能富强，富强就是有道，反对统一反对富强也就是无道；第二，中国非用武力不能统一，于是为了统一和富强可以不管法律。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战略有两个共同之点：因为南方强大的军事势力一个在云南另一个在两广，所以一定要占四川以图云贵，占湖南以图两广。^①

采用这样的战略就把陕南——川北，鄂西——川东，湘江中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九三〇年，四七二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第三册，一六六——一六八页；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一九六〇年，三六六——三六九页。

上游，赣南，闽西的战略价值提高了。这些地区都是攻守的要地。北方，因为军力强大要进攻这些地区；南方，因为军力弱小，只好防守这些地区。在攻守之中，除了派军队，也要联络当地的军事政治势力。

让我们看看在这个区域中，外来的势力与当地的势力，因为南北双方的政策和压力而引起的变化。

陕南：在关中平原以南。关中平原一直为北方势力所控制，而陕南有川军（刘存厚的军队），鄂军，民军。^①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谈时期与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时期，也正是陕南民军势力极盛时期。民军是受南方国民党影响的军队，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与川，鄂，滇，黔的“靖国军”合作，先占陕西，然后顺汉水而下，与孙中山的北伐军会师武汉。^②在陕西的川军是从四川赶出去的，希望借北方的援助打回四川。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吴佩孚的势力渐渐增强的时候，陕南的民军受到很大的压力终于败亡。^③以后陕南一直由北方的军队和川军分治。^④

鄂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在荆州襄阳地区遭到反对，石星川和黎天才所率领的两旅宣布自主。自主运动不久就失败了，但是鄂西的驻军增加。为了避免这些驻军的冲突和为了他们的军饷，于是划了六个防区。^⑤到一九二一年湖北军队因为军饷不足而发动了一系列的哗变，造成湖北省内局面的混乱。川军和湘军

① 《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九四四年，第二册，一六六页；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一九二六年，上，一三二——一三三页；张云家，《于右任传》，一九五八年，八十五页。

② 张云家，《于右任传》，一九五八年，八十五页。

③ 蔡屏藩，《陕西革命纪要》，一九六二年，六十四页。

④ 《向导》，一四五期，一三四〇——一三四一页。

⑤ 国民革命军战史编纂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一卷，三十一——三十二页；《华字日报》，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借此机会援助湖北的自治运动，那就是帮助黎天才，蓝天蔚的援鄂之战，同时，吴佩孚不满于湖北督军王占元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向奉系和西南讨好的作风，也大举援鄂，企图摧毁湖北和邻近省份的自治运动。^①战争的结果是王占元下台，吴佩孚的部下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增强了吴佩孚在湖北的势力，控制了武汉的经济资源。这次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吴佩孚改变了一九一七年以来的和平统一政策，认为中国非用武力不能达到统一。

江西：段祺瑞发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南北战争时，曾经作过江西都督的李烈钧率领云南和广东军队攻赣南。^②他失败之后留下的一些滇军和杂牌队伍驻赣南，而且都投于北军的势力之下。此后，江西北军的力量不断增强，直到一九二四年直系败于奉系之后情况才改变。那时南方才又企图进攻江西。谭延闿的湘军由鲁涤平领导，滇军由朱培德领导，进攻赣南，但是没有结果。^③江西之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没有受到来自南方的严重的威胁，因为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主要兵力对比较遥远的江西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有意于江西的孙中山和李烈钧又缺乏攻城略地的能力。

福建：这一省的重要地区也一直为北军占据；这一省的南北之争也起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陈炯明率领的粤军援闽，引起福建境内民军蜂起。^④到一九一九年，南军在延平——邵武，北军在泉州——厦门，形成对峙分治的局面。段祺瑞虽然在一九二〇年失败下台，他的亲信，福建督军李厚基还撑持了两年，用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二十七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② 大本营参谋厅编，《武宁督战记》，一九二二年，七十四——七十七，一〇二——一〇七页。

③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一九二六年，上，二〇四页。

④ 《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

的是四面联络，保守中立的政策。^①但他终于在一九二二年被倾向南方的三个将领——王永泉，臧致平，许崇智——所击败，同时皖系领袖徐树铮在福建的活动也不利于李厚基。^②李的失败，引起孙传芳，周荫人的北军入闽，击败了王永泉和民军，在一九二五年安定闽局，恢复了北方的统治。周荫人主持闽政到蒋介石北伐时期。

在南北之间，形势最复杂，战略价值最高的还是四川与湖南。

四川：四川的内政受外界的干涉开始于一九一二年滇军入川平定纪律松弛的保路同志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任陈宦为四川将军，象征着北方势力的伸入。紧接着就爆发了反袁之战，南北双方都以四川为主要的战场，川局于是起了巨大的变化。川军想驱除在川的滇黔军，川军领袖刘存厚的政策是借北方的势力攻滇军，又把四川卷入南北的斗争。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四川的战争也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缩影。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之间，接近北方的刘存厚为了对抗四川的自治（autonomy）运动而向北京建议在四川设九个镇守使，镇守使的区域也就是防区；同时与南方政学系有关系的川军领袖熊克武也用防区制来号召川军攻滇黔军。在此时正式形成的防区制一面是川军本身人数扩大的结果，这个结果南北双方都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四川防区制也是南北战争所促成的。一九一九年正式成立的四川防区制，一直到徐向前的共军入川，蒋介石的势力也入川，到一九三五年才有结束的样子。

在四川发展成熟的防区制，有一个政务处，处理民政，但它的最高长官是那一个防区的最高军事领袖。其余的行政人员都由

①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② 徐道邻编，《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一九六二年，二八六——二八七页。

军人委派。区内的各县也有政务处和县议会。防区和防区内县的组织是军人领导绅士的地方政府的典型组织。人员的任命以同宗，同乡，同学，亲戚，旧部下为标准，许多县长也是军人。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①

防区行政机构的主要目的在收捐税以养兵。用刘湘的二十一军的防区为例。六十到七十县的防区，主要的收入是田赋和其它税收，这些税收的附加税，禁烟税（也就是鸦片烟税），盐税；百分之七十的支出是军费。^②在四川主要的防区有二十一军的，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田頌尧的二十九军的，和邓锡侯的二十八军的防区。

既然介于南北之间，四川的军阀免不了受南北军事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以北方支持的杨森与南方支持的熊克武为例子。

杨森原来拥护南方的省自治运动。自治失败之后，他投靠反对自治的吴佩孚和萧耀南。在吴佩孚放弃了和平统一改用武力统一政策的时候，也正是长芦盐和淮盐在鄂西跟川盐竞争的时候。川盐如果失去了“楚岸”（鄂西的市场），某些四川军人的收入和四川的政局安定就会受到影响；长芦盐来自直隶，淮盐来自江苏，如果不能恢复它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楚岸”，直系军队，尤其是在江苏面对上海，浙江皖系军队的直系军队也会受影响。吴佩孚在一九二二左右的战略是先解决四川问题，然后处理江浙问题。他利用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三个工具是杨森，刘存厚，和驻川黔军领袖袁祖铭。^③吴佩孚在中原的势力增加，杨森在四川的势力也增

① 周开庆编，《四川文献》，卷五，二十五期，六——七页。

② 中国银行，《中行月刊》，一九三二年五月，第七页。

③ 范崇实，《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四期，二十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七月二日；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Manchester Guardian*，April 26, 1924.

加。到一九二四年，他竟想统一全川。吴佩孚在一九二五年的失败，也就是杨森在刘湘，袁祖铭攻击之下而失败的序幕。^①

熊克武的势力在一九二〇年攻打滇黔军的战役中扩大了，^②他又在一九二一年攻击亲近北方的刘存厚战役中而成为四川最强大的军人。^③接着滇军顾品珍回到云南挑动了反对唐继尧的战争，广东陈炯明发动了反对孙中山的战争，南方的势力衰颓，不能兼顾四川，于是熊克武的势力也衰退，终究在川军和袁祖铭的黔军压迫之下而在一九二四年离开了四川，变成了一支无家可归的“客军”。

这以后不久南北军队卷入北伐战争，这样四川才摆脱了外界的干涉，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是川军的四个将领——刘湘，刘文辉，田頌尧，邓锡侯分割了四川，直到共军和中央军入川的时候。

湖南：湖南卷入南北之争是一九一三年“第二次革命”以后的事。谭延闿势力的退出，袁世凯势力就伸入湖南。在反袁之战时，桂军陆荣廷的军队到湖南帮助南军清除北方军队，这样就挑动了段祺瑞在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之间以武力征服湖南的政策。一九一八年北军在直隶的曹錕和山东的张怀芝率领之下，派了张敬尧的第七师和吴佩孚的第三师，以及其它的北军入湘。^④同时，桂军也入湘支持赵恒惕的湖南军队。^⑤南北双方的问题都

① 李白虹，《二十年来之川黔战争》，《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四期，七十一页。

② 《川滇战争报告书》，一九二〇年序，八页。

③ 范崇实，《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四期，六——七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

④ 《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第二期，七十四——七十六页；《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一三七——三八页。

⑤ 《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一一七页。

很复杂，南北两支军队之中有许多裂痕。那些变化多端的局面，留待下一章分析。但一九二〇年吴佩孚回军北上，北军在湖南的势力就急剧地减退。^①

在南方势力统治下的湖南分作十二个防区，^②情形颇似四川。受桂军和粤军支持的南方在湘势力分为赵恒惕，陈嘉佑，程潜，谭延闿，和在湘西的几个派系，彼此之间找不出一个调解合作的公式。^③他们之间的矛盾给吴佩孚的北方势力一个再伸入湖南的机会。赵恒惕为了应付其它的派系军队，乃借用坐镇湖北的吴佩孚的北方军。^④于是赵恒惕在湖南的盛衰，反映着吴佩孚在中原的盛衰，和国民党在南方的盛衰。这样的局面继续到一九二六年吴佩孚势力的最后消灭与蒋介石北伐战役在湖南成功的时候。

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后，接着主张武力统一的是奉系的张作霖，^⑤和国民党的孙中山与蒋介石。北伐在表面上是武力统一政策的一个成就。但北伐之后，中国仍然为各派系的军力所分割。

主和，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这是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四日肇庆军务院取消对中国的一线和平希望。^⑥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同时，冯国璋总统力主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他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愿意将川事交川滇黔，借以分化南方三省的团

① 陶菊隐，《督军团传》，一九四八年，二六〇页。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一三一页。

③ 《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④ 《华字日报》，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一日；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六A，九十四页。

⑤ 《东方杂志》，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一〇〇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先生集》，二六七页。

⑥ 《政府公报》，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结，中立唐继尧。他也主张湘人治湘，粤人治粤，这样来孤立广西的陆荣廷。冯国璋的战略跟段祺瑞不让桂军驻湘粤、滇黔军驻四川的战略很不相同。段祺瑞要求的是北方军队占川、湘，进图云、桂。冯国璋的和平工作，因为段祺瑞侵入川湘，因为南方势力在陕西福建的反攻而流产。

欧战结束之后，新总统徐世昌再努力找出一个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的方案。但症结的问题在（一）段祺瑞借参加欧战的名义而训练的参战军是否能解散或改编？^①（二）在广州集合重开的旧国会和在北京选举召开的新国会是否都取消，另组其它的会议来讨论和决定一个和平方案？^②在上海举行的南北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席上，对这两个问题绝无调和的可能。甚至在和谈期间，陕西福建前线上连停战也不可能。^③

一九二〇年皖系战败，南北再努力于和平。一九二二年黎元洪总统的努力，在规模上远不如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上海和谈。黎元洪以前吴佩孚的“国是会议”不过是泡沫似的幻影。^④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除了很短的时期之外，南北双方都有一种中央政府的组织。两个政府都以国会，立宪，护宪等等近代的政治制度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从绅士们的立场看来，南北之争是拥护保卫宪法之争；从军事领袖的立场来看，那是北方想用武力统一，南方想用武力保护既得利益之争。争夺的对象是土地，用土地来养武装的人民。于是南北之争，跟中国其它的内战一样，是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

① 《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三月十日。

②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五月十九日。

③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④ 《吴佩孚先生集》，三八三页。

因为讨论南北之争，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附带的问题：为什么在陕南，四川，鄂西，湘西南，赣南，闽西北，没有产生一个大军阀，可以统一这些区域，来对付双方的势力和压力？

在这些区域之中，我们前面说过，都存在着防区。防区是南北之争在这些区域中的产物。一经划定了防区，很难把防区统一起来。小的防区不可能产生大的军阀，因为它没有产生大军阀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些区域内的防区不能统一，正如分裂了的中国不能统一一样。分裂了的中国不能提供产生大军事独裁者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得日本大量援助的段祺瑞也缺乏统一中国的力量。

从这一个观点看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必须要同时进行社会经济的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培养一支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才能把统一中国的工作放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那样去分析，未免离开我们的题目太远了一些。

第四章

内战的形态

我们所集中分析的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的这十六年（也可以说直到一九三七年，一共二十五年），不断有内战。其情形跟日本的战国时代差不多。中国在军阀时代的内战和日本在战国时代的内战基本的原因是相同的——战争以争夺土地为目标，争夺土地为的是养兵。中国的大小军阀好象日本的大小大名。一九二八年以后有了红军，为了农民而争夺土地，中国内战的性质才有了改变。

军阀时期中重要的军阀和军阀的派系，订立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以全国土地为争夺的对象；次要的和小军阀，野心没有那么大，只在一个地方保全势力或向外作有限度的发展，以争夺一小块土地为对象。大体说来，在袁世凯死后到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以前，北洋军阀统治着从奉天（今辽宁）到浙江沿海各省，黄河流域沿陇海路各省，长江中下游各省，以及东三省，热河，内蒙古。这一大片地方的中心是津浦，京汉，陇海三条铁路干线所形成的 A 字形。铁路水道的交通，长江中下游的资源，以及这个区域内的兵工厂，使这个区域成为统治中国必争的区域。此外，在北洋军阀统治区中，另一个重要地区是南满平原的工业，农业，和交通。一九二〇年直皖战前北洋和南方军阀各派势力的分配大概是这样的：

奉系由张作霖领导，在东三省发展，形成一支日渐重要的势力；

皖系由段祺瑞领导，在北京中央政府和上海有相当大的力量，在津浦路沿线有相当大的影响，掌握的省份有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和陕西；

在形成中的直系先由冯国璋，后由曹锟，吴佩孚领导，势力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京汉线各省。

前面我们说过，南方军阀主要有两个系统——唐继尧的滇军和陆荣廷的桂军。他们知道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重点在保存实力，在西南发展。西南最富庶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那是滇桂两系，北方势力和广东本省势力角逐的场所。为了抵抗北方势力吞并南方，或者为了北方势力统一全国，就必须争夺前一章所分析的山麓地带。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明白地看出军阀时期争夺的区域：（一）为了统治中国，必须控制北京的中央政府才能行动合法有道；也必须争夺武汉和长江三角洲，才有充足的资源；（二）为了巩固和发展南方势力必须争取珠江三角洲的财富；（三）为了统一全国或抵抗北方的侵略，必须争夺山麓地带。这样一来，在这三个区域中内战的频率很高，各方的军队也就集中在这三个地区。

以一个省为单位来看，如果一个省由一个大军阀统治，如象山西的阎锡山或云南的唐继尧，省内的政权形态比较有系统，比较安定，也就比较简单。如果一个省由一些小军阀分治，情形就与全中国差不多。省内的防区相当于各派系分割中国。因为下面我们要分析四川，就以四川为例。其它由小军阀分治的省份——陕西，湖南，福建，情形跟四川相似。

四川的资源集中在省会成都和川东交通中心重庆。成都和川西平原是四川最富庶的农业区，附属于这一区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是产盐丰富的自流井（自贡市），以及川南货物集散地宜宾（叙府）和泸州。控制了这一个大地区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重庆从北方

吸收嘉陵江的物资，从西方吸收资中，内江的糖；控制着长江上下行的货物，和涪陵，万县的资源。掌握了这一大片地方也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围绕着这两大中心地带是一大群二等，三等地区，犹如二等县，三等县一样。这些次要地区有它们的战略价值，退可以保卫中心盆地，进可以向外发展。好象占据了我们所谓的山麓地带，可以进而威胁陕西的渭汾平原，湖北的中部平原，湖南的滨湖平原，或福建的福州平原一样。

就这样的战略地理的知识，让我们分析三次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或省际战争——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战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一九二四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然后分析在同一个时期中四川省一系列的省内战争——清除滇黔军的战争，清除北方势力刘存厚的战争，巩固川东的援鄂战争，以及清除南方势力熊克武的战争。了解这些军阀战争的形态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反对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A. 直皖战争

袁世凯执政以来一个基本政策是在必要时以武力使中国重归于统一。一九一三年的内战和一九一六年的内战，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权想统一中国和地方分权想维持高度地方自主的战争。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一九二〇年的战争是前两次内战的继续。

但是，前两次是南北之战，而后一次是北方内部之战，怎么能说一九二〇年的内战是前两次的继续呢？这得从一九一七年夏天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祺瑞重掌政权的时候分析起。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的时候，北京政府有寺内内阁的支持，有西原借款的援助，有赋予合法有道的权威。北京不是一个无权，无勇，无钱的空架子。但是北京没有国

会,没有总统(冯国璋是代理总统),没有副总统,而且冯国璋没有竞选为正式总统的意思。北京政府的法律地位很成问题。而南方又有一个广州的护法政府,威胁着北系合法有道的权威地位。如果能巩固北京政府的法律基础,日本的钱和北洋的军力可以用来消灭南方的反对势力。段祺瑞的看法是:“南北分裂使地方军人可以投机取巧,宣布独立,左右国政”,^①这种情形不能长期容忍下去。于是他反对督军干政,尤其是南方的督军干政。^②

在军阀割据,军人干政的局而下,要达到段祺瑞的统一和军人不干预民政的目的,只能一而团结北方的武力来消灭南方的武力,以武力求统一,以战争结束战争;另一而用政党和党员来代替武人行使政权。这两个政策都需要钱,钱则多半来自西原借款。

先是段祺瑞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成立了中和俱乐部,一年以后中和俱乐部变成了安福俱乐部。^③安福俱乐部不尽是段祺瑞或徐树铮的人,但是这两位皖系领袖可以左右他们,由他们占多数而操纵一九一八年新选出的国会。这样,皖系在总统和副总统的遴选,内阁人员的任免方面,势力远超过其它的派系。所以统系可以主张不让军人干政。

但即使有参战军的军力,皖系也不能单独地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目的。它必须与其它的北方军事集团合作。它用以号召“北洋团结”的理论最好用徐树铮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复张作霖的电报来说明:

“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着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④

① 徐道邻编,《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一九六二年,一三三——一三七页。

② 《时报》,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③ 《东方杂志》,《二十一周年纪念特刊》, D十页;谢彬,《民国政党史》,一九六二年版,七十二、七十六页。

④ 《徐树铮电稿》,一九六二年,一四五页。

这时，北洋的势力可以大体上分为四个集团：皖系，奉系，曹锟的势力，长江的三个督军——江苏的李纯，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这时，北京政府有钱，分享北京的政权也可以分享北京的收入和北京能赋予合法有道的权威；战胜南方的信心很高，战胜了之后可以分享战争的果实——土地，资源，和军队。北洋几个集团能否团结对付南方，得看北京的政权财权如何分享，战争的果实如何分享。为了找出一个分享的办法，北洋几个集团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

第一次天津会议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举行，那时湖北的荆州襄阳在石星川，黎天才领导之下宣布自主，湖南军队百攻岳州，北方大为震惊，对南作战几乎是一致的主张。^①从天津会议到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汉口会议之间，南北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北方的团结发生了严重的裂痕。荆襄自主虽然失败了，但鄂西的局势并未平定。代表北方势力的刘存厚被赶出了四川，龙济光被赶到琼州，陈树藩被赶出了西安。但在吴佩孚和张敬尧指挥之下，北军下岳州，下长沙，以张敬尧任湖南督军。

曹锟之所以派吴佩孚军入鄂入湘，第一是他有意于武汉的重要资源，第二是他怕奉系在关内的军力伸张到长江。^②湖北王占元之所以容纳北方军队入鄂，是因为岳州为南军占领之后他受到威胁。^③但另一支由山东督军张怀芝率领的征湘部队，沿津浦路南下，到了浦口，却被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所阻止，而且冯玉祥有李纯和陈光远的支持。^④让一支大军经江苏，江西去攻湖南，那时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五十六——五十八页；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一九二六年，上册，二〇四页。

② 《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③ 《时报》，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

④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七十一页。

苏赣两省都是一大威压。南北统一之战必须以江苏,江西,湖北为运兵的要道。这是长江三督基本上反对武力统一政策的关键。北洋势力于是产生了第一个裂痕。

皖系为了联络奉系来对付其它北洋势力,在一九一八年二月让奉军到秦皇岛取去了日本运来的第一批军械,但在三月间第二批日本军械运来时却不依照原定计划分拨一部分给李纯。^①这样一来,皖系(主要是徐树铮)的作风造成了长江三督和奉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李纯和陈光远甚至以辞职来反对奉军南下。^②同时,为了酬答皖系的一大批军械,张作霖提出他的政治要求:拥护段祺瑞组阁,行责任内阁制;撤换长江三督;东三省设立高等军使,并且练兵三十一师;以武力平定西南。^③

在这样的皖奉联合的情形下,段祺瑞希望能利用同时控制曹锟,由曹锟而控制能征善战的吴佩孚。他的引诱是让曹锟出任两湖巡阅使,另一面却又推徐树铮为直隶督军以代曹锟,任命皖系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湖北既然在王占元之手,两湖巡阅使那一个辉煌的头衔不过是一个空架子。^④北洋的团结于是产生了第二个裂痕。

在汉口会议时,张怀芝不出席,带兵回到山东,怕重兵在外有失去山东根据地的危险;曹锟宣布他生了病,而且主张南北问题和平解决。^⑤

① 陶菊隐,《督军团传》,一九四八年,一七七——一七八页;《时报》,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② 《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日;《时报》,一九一八年三月九日。

③ 《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时报》,一九一八年三月五日,四月十一日。

④ 《时报》,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一一二——一一四页。

⑤ 《时报》,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汉口会议失败之后，段祺瑞政策的重点在加强皖系与曹锟的关系。答应曹锟的两湖巡阅使改成了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在四川、广东毫无势力，只能在派兵作战克服之后才有利可图；湖南仍然在张敬尧手里，而江西督军是亲近曹锟的陈光远。这就说明曹锟为什么仍然按兵不动。曹锟的对策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召开了第二次天津会议，他的对南作战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担负全部军费；军械由中央供给，而且他本人控制上海，德州，和汉阳的兵工厂；他要求副总统的职位，以增强他在中央政府的力量^①。

第二次天津会议之后不久，皖系在南方的势力急剧地衰退。张敬尧在湖南不但不能向滨湖平原以外发展，而且他的贪污横行引起湖南人的反对；李厚基在福建败于粤军，福州的形势危急。这是一九一八年八月的事。恶劣的形势逼使段祺瑞向曹锟让步，允许曹锟为副总统，希望能用他的兵力再进行皖一之战，也希望用他的关系调解段祺瑞与冯国璋和长江三督之间的冲突。^② 恶劣的形势使曹锟提高了他的要求，四省经略使必须统辖四省的军务，必须扩军两个提成旅和宪兵队，警察队，这样一来经略使署每月的费用达一百三十万元。^③

皖系和曹锟的关系还没有完全调和；皖系和奉系的关系却愈来愈坏。这也是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事。在关内的奉军已经经费支绌，徐树铮竟以奉军的名义领了三百万元，只发了一百八十万给奉军。西原借款，张作霖分到二百万元，吉林的孟恩远分到了一千万，徐树铮也分到了一千万。不但如此，徐树铮在东北招收土匪，编成军队，扰乱奉天的治安，引起奉军中下级军官的反对。段祺瑞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一四〇页。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一六七——一六八页；《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十月四、五日。

③ 《时报》，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

不得不交还一百多万元欠饷给张作霖，招收的三个旅也交给张作霖，而且奉军借出的军械也交还给张作霖。^① 皖奉的关系暂时虽然没有破裂，张作霖与徐树铮的关系却到了不可弥补的地步。

北洋势力到一九一八年夏天已经破绽百出，段祺瑞的最后一着棋是选曹锟为副总统，希望能由此而团结北方，进行对南战争。但是梁士诒领导之下的旧交通系，影响之下的研究系和一些安福系议员，为了与南方和解，选岑春煊或陆荣廷为副总统，为了曹锟收买选票的价钱太低，而拒绝出席选举，以致国会几次开会都不足法定人数三百八十三人。副总统既然成了泡影，曹锟又进了医院。^②

中央政府一天在皖系操纵之下，一天对奉系，曹锟，长江三督都没有什好处。例如龚心湛内阁宣布一九一九年的预算亏欠二万万元，发不出军饷。但是徐树铮的西北筹建使署有的是钱，安福要人王揖堂代表北方到上海跟南方进行和平谈判也有的是钱。曹锟和张作霖才反对龚心湛，以靳云鹏代替他为国务总理。但安福系挟着他们在国会投票的能力，要求内阁之中司法，交通，财政三部长，财政，外交，交通，农商，陆军五次长，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省长必须是安福俱乐部的人员。这样的把持中央政权只能加深皖系与曹锟，张作霖，长江三督的裂痕，同时加强反皖势力之间的团结。所谓的直系——曹锟，吴佩孚，长江三督大概是在这时形成的。

由第一次天津会议，企求北洋四个集团的团结，到一九一九年

① 《时报》，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八月十八日；《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八月十日，八月十五日；《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一二九页；潮江渔物编，《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六十九——七十页。

② 《时报》，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春夏之间皖系的孤立，这当中的派系变化极其复杂。而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如何分享北京的政权财权，与北京赋予合法有道的权威；另一个是对南作战胜利的果实如何分享。在孤立的情况下，皖系又受到反日群众运动的冲击。一九一九年五月直到年底，因为山东问题，因为福建事件，皖系支持的中央政府在政治和道德上也变成了众矢之敌。

一九二〇年三月和四月，直奉两系两度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①徐树铮必须辞职，边防军必须由陆军部统辖；安福俱乐部必须解散。段祺瑞坚持边防军不能交陆军部；安福系坚持一九一八年的新国会决不能解散。^②从一九一七年的最大条件——以武力统一中国，皖系退让到一九二〇年七月的最低条件——保全军事和政治的基本势力。到最低条件也不能为直系奉系所接受的时候，南北战争就变成了直皖战争。

战争中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皖系第一路军(第十五师)刘询的部队不战而退，让吴佩孚能包围皖系曲同丰率领的第二路军。第二个值得注意之点是直系军队在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安徽等地接受皖军的投降，加以改编，于是势力和地盘很快地扩充。奉系军队也在直隶，热河，察哈尔收编了一部分皖军，剩下的有地盘的皖系军队只有浙江的卢永祥，中立了的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和福建的李厚基。第三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失去了地盘的皖系败军，例如湖南张敬尧的第七师和游移于鄂西豫西的吴光新的军队，有的被当地军阀收编，有的流为土匪。^③

皖系在战争中失败，政治上的势力也就随之而消失。煊赫一时的安福俱乐部变成了非法组织；由安福系操纵的国会不能继续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一三五页。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一五四——一五八页。

③ 《时报》，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它的立法的功能。直系奉系在分享了战胜的果实之外，还得重组北京的中央政府。

这次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的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许比一九一七年反复辟的战争大一些。但是那一次反复辟战争，据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G. E. Morrison的估计，只有二十七个人死亡！^① 直皖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许远不如一九一六年的反袁之战，更不如以后两次的直奉战争。

B.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以后，北方在陕南，鄂西，福建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以威胁四川广东南方势力的安全，只有湘北是南北争夺的焦点。直系奉系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以后一贯主张武力统一，但那不过是空话。真正的问题在两系的团结，两系的团结又得看中央的政权财权和地方的资源如何“公平”地分配。

为了求团结，徐世昌总统（一九一八年九月就任）和曹锟、张作霖协议的办法是：（一）直鲁豫巡阅使（曹）和东三省巡阅使（张）管辖的省份中用人行政的大权“得便利行事”——也就是“自由行动”的权力；（二）更换疆吏（督军）必须共相商榷，“以期内外如一”——也就是关内关外可以互相影响；（三）巩固内阁，不得已更换时共相示知——也就是内阁人选要曹张两人的同意；（四）中央如有重大事件共助办理。^②

这是直奉两系集体领导的中央政权，以徐世昌为总统，以靳云

① G. E. Morrison, *Correspondence*, II, Led, Lo Hui-min, Cambridge, 1977, 635.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〇年九月三日。

鹏为总理。协议中设有特别规定重开旧国会或选举新国会，也没有讨论副总统的问题。这些是牵涉到南方利益的问题。对南方是和是战，仍然举棋不定。为了留下跟南方斡旋的余地，直系奉系只能达到关于中央政府临时性的协议。协议中比较重要的还是关于地方资源的分配——曹锟承认张作霖在东三省张作霖承认曹锟在直鲁豫的最高权威，但是疆吏的任免还得经双方的同意。

为了解决地方资源问题，才召集了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到五月三日的天津会议。这时跟皖系奉系都有联络的赵倜被直系军队打败了，曹锟保荐直系将领又是奉系可以接受的王承斌为河南督军；跟皖系有密切关系的陈树藩给直系军队打败了，曹锟保举阎相文，张作霖保举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结果由大兵驻陕的阎相文继任。奉系在这次会议中的收获是张作霖以蒙疆经略使的身份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①在这样的交换条件之下，保存了均势也保存了两系的合作。所以北方才有力量支持桂系的陆荣廷攻击孙中山，联络广东的陈炯明，维持湖南的赵恒惕。

但不久直奉之间的裂痕一个又一个地出现。张作霖经略蒙疆，从靳云鹏内阁取得了七百万元，但直系经略陕西只得到一百万，靳内阁偏袒奉系早引起直系的不满。^②败于地方资源的分配，张作霖取得了热河；同时湖北因为许多次兵变，王占元辞职，曹锟保举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而张作霖只能提出不孚人望的张勋，于是直系取得了湖北与重要的武汉经济资源。一九二一年山东督军出缺，直系主张调王承斌，奉系推荐鲍贵卿，结果是中立的郑士琦继任。^③到一九二一年底，奉系在中央的权力大于直系，直系在地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三十二页。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八月八日，八月十二日。

③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二十六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一日。

方的势力大于奉系。两系的团结还可以勉强维持，还可以面向南方。十一月的保定会议，决定由直系军队围川湘，奉系军队围闽赣。直系可以用所得到的京汉路与武汉的资源来支付军费，而张作霖则必须更进一步地控制中央政府，取得日本的经济支持，才能扩大他控制之下的地方资源。这是一九二二年一月梁士诒内阁的大政潮的背景。^①

亲日的梁士诒内阁跟直系的关系向来不很好。奉系借梁士诒面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在中央地方势力均衡的局面下，是直系所畏惧，所不能容忍的。用吴佩孚致卢永祥的电报来说，这是“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②而梁士诒本人在一九二二年元旦赦免安福系在通缉中的人员，来促进奉系和皖系的合作，更是火上加油。^③一九二二年二月在保定举行的十一天的会议上，张作霖提出的（一）军人（指吴佩孚）不得干政，（二）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原任（不要管中央的事），（三）梁士诒内阁重新视事，全部为直系拒绝。一些老迈聋钟的既军又绅的人，如张锡奎，张绍曾，王士珍等的调解，不能找出一个调和双方在中央地方势力冲突的方案。战争就变成了唯一的办法。^④

动员二十多万人的九天的战争，双方的伤亡相当，一共四五千人左右。奉军投降的有二万五千，不战而退出战场的有六万左

①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② 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一九三九年，第二册，一七七、一八三页；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一九六〇年，三五四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三日；G.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Stanford, 1977, 62.

③ 《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④ 《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直奉大战史》，上海，竞智图书馆，一九二二年，四十二——四十三页。

右。^①但直系军队在山海关停止前进，奉系的根据地因为有日本的保护没有受影响。^②北京政府变成直系支持的政府——徐世昌在一九二二年六月辞去总统，梁士诒内阁由王宠惠内阁代替。^③直系请黎元洪再出任总统，准备召集旧国会，重新制定宪法，选举曹锟为总统。那是近代中国史上大家都知道的事。

C. 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九二二年战争中吴佩孚麾下的两员勇将，一是王承斌，他升任为直隶督军但失去了第二十三师的师长职位，原因是督军不能兼师长。另一位是冯玉祥，他升任河南督军，但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调任为陆军训练总监，失去了他养兵的根据地。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这两员勇将的军饷已经很有问题，所以才有包围北京总统府索饷的事。到一九二三年底一个失去了军队，一个失去了地盘，两者都不满于吴佩孚。^④

至于如日中天的直系如何处理国家大政，曹锟和吴佩孚有不同的看法。曹锟的程序是先制宪选总统，恢复残破的北京政府的合法有道权威地位，然后才能安定大局；吴佩孚的程序是先安定大局才拥护曹锟为总统。^⑤程序的先后又和北京政府的经济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北京有限的收入只能用于筹办大选或者用来安定地方局面，加强对地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不能调协的看法，各行其

① *The Times*, May 8, 1922; *China Yearbook*, 1923, 575.

② 《吴佩孚先生集》，三八三页。

③ 《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第二册，二三二页；《吴佩孚先生集》，三八五页。

④ 《中国现代史料丛刊》，第二册，十七页。

⑤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一九二九年，卷四，五十七、八十六页；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九三〇年，五〇六页。

事，双管齐下，结果是直系本身的分裂和衰弱，给奉系一个报仇雪耻的机会。

总统贿选每票五千元，浪费了三百万元。这笔钱也许来自法国的庚子赔款，改用金佛郎计算，中国损失了七千万元。同时曹锟又扶植中法实业银行复业，收到了二百万元的酬报。贿选的目的在为北京政府找一个合法有道的基础，但结果使直系变成一九一九年的皖系一样，完全失去了合法有道的根据。^①

吴佩孚开府洛阳，他的政策是以孙传芳图闽，陈炯明图粤，以苏、赣，皖军队图浙，以杨森的军力图川。^② 洛阳巡阅使署的经费每月七十八万元，四年之间支付的军费达六百八十万，多半来自京汉路和汉口的财源，北京的接济很少。^③ 到一九二四年秋天在闽、浙、川等地有一些成绩，但陈炯明退守东江，杨森退处川西，河南、湖南的情形并不稳定，而吴佩孚与萧耀南（湖北督军）因为财政奇窘而发生龃龉。在一系列的川、湘、闽、浙、苏、粤战争之后，直系是一支疲惫，穷困，内部分崩离析的军队，饷械和斗志都根缺乏。

奉军的军饷充足，装备训练都比较好，斗志也比较高，这是张作霖两年以来蓄意报仇的结果。^④ 直系虽然利用一些在东北反对张作霖的势力，如在绥芬区活动的高士侯，但没有什么成就。^⑤ 在一九二四年战争开始以前，曹锟托鲍贵卿访问张作霖，张作霖也派张九卿访问曹锟。^⑥ 想找出一个和平的公式。从几个重要的方面

①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一九二九年，卷四，二十四页，四十一——四十四页，卷七，二一三——二一五页。

②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九三〇年，五〇六、五七〇页。

③ 《吴佩孚先生集》，三一六——三一七页。

④ R.S.Suleski, *Manchuria under Chang Tso-Lin*,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Michigan, 1974, 173—6.

⑤ G. McCormack, *ibid*, 71—8.

⑥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上，五十三页。

来看，一九二四年底是直系势力两年来最弱的时候。河南的寇英杰倾向奉系；热河的王怀庆无意于战争；王承斌（开战时直军的副总司令）是奉天人与张作霖旧有关系；冯玉祥被收买以致于倒戈。^①直系饷械欠缺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战争不可避免时，才着手抵押铁路，税收，想从英美的银行，企业借款，同时又发军用票强迫绅商接收，所需的二千万元军费，只有湖北筹集了八百万。^②没有钱也许是直军不能买通津浦，陇海两条铁路运输援军的原因；^③没有钱也许是南方北军迟迟不派兵援助的原因。^④

这是北方军阀最大的一次火并，也是战争中军队叛变最严重的一次。直军投降的人数估计在八万人左右。剩下的残余部队有九个师，六个混成旅取消了番号。^⑤

这次战争的结果，奉军收编了败军，军力从战前的十七万增加到战后的三十五万。^⑥冯玉祥的国民军从两师六旅增加为八师十一旅，^⑦使冯玉祥变成全国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于地盘，张作霖由直隶伸入山东，江苏，控制了津浦路；国民军伸入了河南，陕西与直系的残余势力争斗，也伸入了内蒙古。^⑧为了阻止冯玉祥入湖北，张宗昌下江苏，东南八省在南京开会，组成联防，暂时仍由吴佩孚领导。^⑨直系损失了河南与陕西，保存了江苏，湖北，江西和安徽的一部分。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九四四年，卷三，十九——二十页；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上，二十四页。

② 《时报》，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二十七日，十月七、十三、二十五日。

③ 《中国现代史料丛刊》，第二册，三十一页；The Times, October 28, 1924.

④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二一二——二一三页。

⑤ 《政府公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The Times, December 19, 1924.

⑥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八十——一〇六页。

⑦ 波多野乾一，《现代支那之记录》，第四册，三三〇——三三一页。

⑧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九三〇年，五八九页。

⑨ 《吴佩孚先生集》，四一〇——四一一页。

这三次全国性的大战，每次都先有一段交涉的时期，有人从中斡旋。交涉失败，双方宣战。宣战的理由都是巨大堂皇的“法”或“统”的理论，在好听的话的背后，真正的理由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政权，财权，和合法有道的权威，也是控制地方的资源以养兵，以扩充势力。在每次战争中都有倒戈的现象，尤其以一九二四年的战争最严重。这也许跟收买对方的军队有关系。因为饷械都有限，战争的期限很短，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不很大。死伤的人数远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数。因此战争的结果总是（一）控制北京政府；（二）扩充地盘；（三）收编战败者的军队。换言之，这些都是分赃的战争，分赃不公平也就为下一次战争种下爆发的原因。这种形式的战争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的四川内战在形态上是前面分析过的三次战争的缩影，也和湖南，福建，广东的内战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一）省内战争动员的军队少，规模小，军械差，破坏能力比省际战争更小。譬如一九二〇年驻成都的英国领事 Mayrick Hewlitt 在城墙上观战，说那次战争好象英国 Aldershot 的操演一样，不是真的战争。^① 所以战争可以继续下去，到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一九二〇年驱逐滇黔军的战争从七月打到十二月；一九二一年驱逐刘存厚的战争从二月打到三月；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驱逐熊克武的战争从一九二二年七月时断时续地打到一九二四年四月。（二）这时期中四川的内战都有省外势力的干涉，滇，黔，陕，鄂，和北方的军队或者直接参加，或者援助军火与军械，这也是使川战能旷日持久的一个原因。一九二二年以前省外的势力还有南北之分，为了南方或北方的政治目的而争夺四川；一九二

^① Sir Mayrick Hewlitt, *Fifty Years in China*, London, 1943, 127.

二年吴佩孚战胜了张作霖之后,侵入四川的黔军与吴佩孚合流,受直系的补助。

在省自治的口号之下,四川实际的军事问题是本省的军队由一九一二年的五个师增加到一九二〇年的十个师,^① 到一九二四年增加到二十九个师和三十个混成旅。^② 在一九二四年四川有二十万军队,至少每年需要军费二千四百万元。四川本省的军队必须有防区,才能从防区中找到养兵的资源。重庆,成师,自流井,泸州,万县等富庶重要的防区。滇黔军占据这些重要的地区是川军不能容忍的事,也是一九二〇年四川战争的基本原因。滇黔军入川是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反袁之战的事,他们以“客军”身份长住四川好象现代国家让外国人用它的纸币,把本国的通货膨胀转嫁别人身上。这些“客军”一回到本省就会增加省的财政负担,掀起本省政治的不安定。滇军回到云南就引起了顾品珍驱逐唐敬尧的战争。

在驱逐滇黔军的时候,四川三个军系——熊克武,刘存厚,刘湘颇为团结,加之以滇黔军的纪律很坏,唐继尧又借口广东有事不援助滇军,于是川军以优势的军力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③

四川的三个军系之中,熊克武和刘湘当时都倾向南方,只有刘存厚听命于北京政府。于是他向北京保荐熊克武为省长,分享川西平原的资源;也保荐刘湘为重庆护军使,独占重庆的收入。他本人自然是北京任命的督军,四川分为九个镇守使区(也就是防

①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第一册,八二四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② 周开庆编,《四川文献》,卷五,一五七期,八——九页;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③ 范崇实,《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五——六页。

区)：

泸 州	杨 森	嘉, 叙	陈洪范
建 昌	刘成勋	忠, 万	邱华玉
合 川	陈国栋	绥 定	但懋辛
西 秀	余际唐	夔, 开	陈能芳
遂, 顺	邓锡侯 ^①		

只有杨森占泸州, 陈洪范占嘉定叙府是比较好的区域, 其它不属于他的队伍只分得一些穷苦边远的区域。他又把熊克武的势力分散到四川各地。分赃不均, 使熊克武与刘存厚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为了备战, 刘存厚扩军到十一个师; 同时熊克武有一军, 两师, 一个混成旅, 和余际唐的江防军一万多人, 刘湘有两师, 两混成旅。^② 实际上熊克武和刘湘的军力远大于刘存厚,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争, 刘存厚败退到陕南。熊克武战胜之后用的也是防区制——他自己的第一军占川东, 川北; 刘湘的第二军占川南; 刘成勋的第三军占川西。此外的九个混成旅和十个旅分防各地。^③ 四川境内这时候没有客军, 暂时团结起来, 巩固川东的防务, 推广川盐在湖北西部的销路, 和四川烟土(鸦片)的销路, 两者都是重要的军费来源。这样才有一九二一年秋的援鄂之战。

援鄂之战发生在湖北一系列兵变, 湖北督军王占元下台的时候。在吴佩孚, 萧耀南的大军对抗之下, 川军败退四川。同时蛰伏在陕南的刘存厚, 得到曹錕的援助, 又打回四川。^④ 于是川军各派系

① 范崇实,《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五——六页。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

③ 范崇实,《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的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十三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④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争夺地盘的战争又开始。这是由刘湘领导的反熊克武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吴佩孚乘战胜张作霖的威望,利用杨森,刘存厚,和黔军袁祖铭攻熊克武,而熊克武联络滇军反攻。双方互有胜负,成都,重庆几次易手。一些小军阀,有时保持中立,有时反复地在两方面作战。最后熊克武被逐出川,在湘黔边境漂流到广东。

吴佩孚解决四川问题的办法是委任没有什么力量的邓锡侯为省长,以亲近北方的刘存厚为督军,以军力薄弱的田颂尧为军务帮办,以杨森为川东护军使来监视军力强大的刘湘^①。他的处理虽然没有影响到四川军人的防区,但成都和重庆的资源落到他能信任的人的手里。四川的局势必然会因为他的势力的消长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些小战役中,双方也宣战,发通电用传统的道德仁义来解释作战的理由。例如一九二二年七月,刘湘攻击熊克武为“暴乱党徒,……争权攘位,利己营私……”。^② 战胜的军队也收编败军,这是熊克武,刘湘,杨森等军力扩充的主因。交战之中,倒戈,改变方面的事极其平常,例如刘存厚依赖的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都在一九二一年背叛了他,^③ 后来又在一九二四年跟他合作攻打熊克武。

为了统一,为了消灭军阀的割据,军阀们发动了许多次战争。战争愈多,军队也愈多,地盘的问题愈严重,养兵的问题也愈严重。打来打去,打出了一个蒋介石。不幸的是蒋介石并非中国的德川家康。

① 《华字日报》,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七月二十日。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③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

附表一：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兵力布署

(1920.7.4—7.9 五天)

直 系		皖 系	
领袖	曹 錕	领袖	段祺瑞
第三师	吴佩孚	边防军	
第三混成旅	萧耀南	第一师	曲同丰
直隶第一混成旅	王承斌	第二师	马 良
第二混成旅	阎相文		(山东)
第三混成旅	曹 錕	第三师	陈文运
约 27,000 人		第 5 师	张树元
		第 9 师	魏宗瀚
		第 15 师	刘 询
奉系		约 37,000 人	
领袖	张作霖	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
第 27 师	张作相	第一混成旅	宋子扬
第 28 师	张景惠		(通县)
		第二混成旅	宋邦翰
			(河南)
		第三混成旅	褚其祥
		第四混成旅	张鼎勋
			(河南)
		第 7 师	张敬尧
			(湖南, 湖北)
		第 10 师	卢永祥
			(浙江)
		第 6 混成旅	何丰林
			(上海)
		其它	吴新田
			吴光新
			陈树藩
			(陕西)

资料来源：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V，15—16，175—177。

濮江渔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二期，93—94。

附表二：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兵力布署

(1922.4.28——5.5 七天)

直 系		奉 系	
总司令	吴佩孚	总司令	张作霖
东路 第26师	张国镔	东路	张作霖
西路 第23师	王承斌	第三梯队	
中路 第3师	吴佩孚	第3混成旅	张学良
后备 第24师	张福来	第4混成旅	蔡平本
第4混成旅	张锡元	第8混成旅	郭松龄
约100,000人		第四梯队	
第11师	冯玉祥	第7混成旅	李景林
第20师	阎治堂	第1混成旅	阙朝玺
第25师	萧耀南	第五梯队	
第8混成旅	靳云鹗	许兰洲率黑龙江	
鲁军1旅	张克瑤	两旅骑兵	
		西路	张作相
		第一梯队	
		第1师	张景惠
		第16师	邹 芬
		第2混成旅	郑殿升
		第9混成旅	牛永辅
		第二梯队	
		第27师	张作相
		第5混成旅	齐恩铭
		第6混成旅	鲍德山
		约125,000人	

资料来源：《直奉大战史》，38—39。

《吴佩孚先生集》，379。

资料来源：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

上，20—21。

附表三：一九二四年直奉第二次战争兵力布署

(1924.9.16---11.12 56天)

直		系		奉		系	
总司令		吴佩孚		总司令		张作霖	
		(第3师)		第1军		奉军第2师	
副总司令		王承斌				姜登选	
第1军 指挥		彭寿莘				奉军第5师	
第1路		第15师		第2军		奉军第1师	
		彭寿莘				李景林	
		第13混成旅				奉军第23,24,26旅	
第2路		第23师				张宗昌	
		王维城		第3军		奉军第4师	
		第7混成旅				(即第27师)	
第3路		第9师				奉军第5,19旅	
		董政国		第4军		奉军第10,12,	
		第14混成旅				14,25旅	
第2军 指挥		王怀庆				奉军第8旅	
		(第13师)		第5军		第29师	
第26旅		刘富有				热河第1师	
直隶四路巡防队		龚汉治		第6军			
毅军		米振标				共约170,000人	
第3军 指挥		冯玉祥					
		(第11师)					
第1路		第7混成旅					
第2路		第8混成旅					
		张之江					
		李鸣钟					
		共约85,000—100,000人					
十路援军 指挥		张福来					
第26师		曹 锟					
陕西暂1师		胡景翼					
第24师		杨清臣					
第6旅		张席珍					
第14师		靳云鹗					
第20师		阎治堂					
陕西第2师		张治功					
豫军		李治云					
第1混成旅		潘鸿钧					
察哈尔第1混成旅		谭庆林					

资料来源：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上，28—35。《政府公报》，1924.9.18。

资料来源：《吴佩孚先生集》，392—394。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上，35。

附表四：北伐(1926——1928)

A. 国民革命军之成长

1925	第一军	蒋介石	第二军	谭延闿
	第二军	谭延闿	第三军	朱培德
	第三军	朱培德	第四军	李济琛
	第四军	李济琛	第五军	李福林
	第五军	李福林	第六军	程潜
1926	北伐前夕		第七军	李宗仁
	总司令	蒋介石	第八军	唐生智
	第一军	何应钦	共约 100,000 人	

B. 湖北湖南之役

吴佩孚军		国民革命军	
湘军两师	叶开鑫	第四军	张发奎
桂军一师	马济	第七军	李宗仁
粤军一师	刘志陆	第八军	唐生智
赣军一师	唐福山	共约 50,000 人	
	(援湘第三路)		
湘鄂军数千	李倬章		
余荫森一旅	宋大霈		
孙建业一旅	(援湘第一路)		
一师	王都庆		
	(援湘第二路)		
二旅	董政国		
	(援湘第四路)		
第 25 师	陈嘉谟		
二旅	陆运, 李炳煦		
共约 100,000 人			

C. 江西福建之役

孙传芳军

第一方面军

邓如琢师

唐福山师

蒋镇臣师

杨如轩师

杨池生师

张凤歧旅

刘宝题旅

第二方面军

郑俊彦师

李彦青旅

王良田二团

第三方面军

卢香亭师

谢鸿勋师

周凤歧师

李俊义混成旅

杨庭和混成旅

杨镇东旅

第四方面军

周荫仁二旅

骑兵团

张毅师

李凤翔师

第五方面军

陈调元师

王晋混成旅

刘凤图混成旅

第六方面军

颜景崇混成旅

马登瀛混成旅

共约 150,000 人

国民革命军

江西方面

第一路 第七军 李宗仁

第二路 第六军 程潜

教导师 王伯麟

第三路 第三军 朱培德

第二军 戴岳师

张辉瓒师

第四路 第二军 谭道源师

陈嘉佑师

第十四军 赖世璜

福建方面

左翼司令 谭曙卿

第一军三师

中路司令 冯轶裴

第一军第 14 师

右翼司令 张贞

第四独立师

第 20 师

第六军及 14 军各单位

D. 决战

安国军		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	张作霖	总司令	蒋介石
第一方面军	孙传芳	第一集团军	蒋介石 17 军
第二方面军	张宗昌	第二集团军	冯玉祥 16 军
第三方面军	张学良	第三集团军	阎锡山 8 军
第四方面军	韩麟春	第四集团军	李宗仁 8 军 2 师
第五方面军	张作相	共约 700,000 人	
第六方面军	吴俊升		
第七方面军	涂玉朴		
共约 400,000 人			

E. 结果

第一集团军	20 军	第四集团军	21 军
(其中 9 军为蒋介石嫡系)		其它	9 军
第二集团军	21 军	全国共 82 军	
第三集团军	11 军		

资料来源：《中央日报》，1928.7.22。

第 五 章

联 省 自 治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一再努力恢复中央集权的局面，而地方的军——绅政权却日渐巩固。集权和分权两个矛盾的趋势挑起了一九一三年的“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之役”，以及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战争。在这几次内战中受战争破坏严重面又不受南北双方任何一方面完全统治的省份，提出用省宪达到自治，然后由立宪的各省联合起来统一中国。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再掀起了那些省份对联省自治的兴趣。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南方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年直奉第二次战争之后，北方的局势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渐渐消沉下去。在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之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是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之外，另一个谋求统一的办法。

联省自治的背景我们在第三章之中略略提到过一些。这里我们加上两点考虑。第一，由立宪的各省联合来统一中国反映出中央政府的立宪工作失败了，所以希望由各省自己立宪，找新的有道合法的源泉，使政治行为和政策的决定有一个规律，这样来结束乱七八糟的局面。一九二〇年以前的三次内战都是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集权的原则，以武力统一的方法来达到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同时南方的军——绅政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这样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有一个中央政府，广东

也有一个中央政府。在南北这两大势力之间的一些政治军事领袖，于是主张由省自治达到联省自治。

这时期中许多人用“自治”这个名词来表示大体相似而又很不相同的政治目标。它可以解释为“一省管一省自己的事”——湘人治湘，川人治川。所谓的湘人，川人，指的是湖南或四川的军政领袖，也就是那里的“军——绅政权”。它也可以解释为“人民自己管自己的事”，从乡到县，到区，到省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根据大家接受的宪法，选举行政人员。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之间，倡导第一种意义的“自治”的军政领袖，远超过倡导第二种意义的人。

无论倡导的是哪一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用自治的省的联合来消除一切内战，达到中国的统一。他们的步骤是在每一个省之内用讨论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经济上的难题，订立省宪，先达到省的统一。然后由统一的各省联合起来，再用讨论和立宪的方式达到全国的统一。

这样的目的和步骤都是值得称赞和拥护的。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为什么没有实际的成就？这些公开宣布的目的和步骤是否只是表而文章？在表而文章的后而是否各省有各省真实的，自私的打算？

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之间倡导联省自治的有许多省份——湖南，湖北，四川，陕西，这是介于南北之争的四个省；广东，广西，福建，这是受南北之争的影响的三个省；云南，贵州，这是在西南高原上不大受北方影响的两个省；浙江，这是直皖战后还可以由皖系控制同时又跟南方势力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省。达十个省中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自治运动。我们先看看联省自治运动最主要的省份，它们主张联省自治的环境，原因，方法，然后再看各派赞成和反对联省自治的理由，最后分析联省自治运动失败的因素。这样也

许可以解答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省份

湖南的自治运动是在两个条件之下产生的，一个是张敬尧督湘时对湖南人的种种剥削，严重地伤害到湖南本地军人和士绅的利益；^①另一个是三次大的内战，尤其是一九二〇年的内战，使湖南受了很大的损失。于是在驱逐张敬尧之后，湖南的军——绅政权想超出南北之争。^②首先是谭延闿再执掌湖政，请军绅代表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三日讨论自治办法。^③但谭延闿在短短的执政期间滥发纸币，增加税收，来应付巨大的军饷的要求，以致湖南省议会认为，赶走了北方的势力，达到了“湘人治湘”的自治，也不过是“以暴易暴”。^④用武力赶走了倾向南方的谭延闿之后，赵恒惕大力推行他的联省自治运动，^⑤支持他的有军人，绅士，和工商界的人如梁启超，熊希龄，范静生。^⑥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湖南仍然不断地受到南北势力的干扰，不断地有战争。这些干扰和战争更加速了湖南自治立宪的要求。在一九二一年年底湖南公布了省宪，^⑦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赵恒惕竟当选为省长。^⑧从形式上看来，这也许是四年间联省自治运动的最高成就。

陕西在一九二一年主张自治有两个派别，也有两个不同的原因。由段祺瑞委任的督军陈树藩，利用自治的口号来联络南方势

① 《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九年，第二期，六十七页。

② 丁文江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一九六四年，一六六——一六七页。

③ 《时报》，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④ 《时报》，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三十一日。

⑤ 《时报》，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杨幼炯，《中国立法史》，一九三六年，二八七——二八八页。

⑥ 杨幼炯，《中国立法史》，一九三六年，二八七——二八八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九五七年，一三〇页。

⑦ 《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⑧ 《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力,对抗代表直系侵入陕西的阎相文。^①真正代表陕西本省势力的民军领袖于右任也主张自治,但他的目的是要所有的外省势力,皖系的陈树藩,河南的刘镇华,直系的阎相文都退出陕西。^②

四川的自治思想开始于护国之战和滇黔军入川的时候。^③一九一九年北方势力所支持的刘存厚,请北京政府任命九个镇守使,公推总司令兼省长来实行合法的军绅统治,^④于是挑动了一九二〇年代的四川联省自治运动。在北京的四川自治运动宣言,明白地指出了四川联省自治的理由:

“吾川介在南北,为双方所争,当局者时而托命中央,时而附和护法,或南或北,徘徊莫定,一误再误,民不堪命矣。惟及今力图自治,则战端可由之而弭。”^⑤

领导这个运动的人是代表南方势力的熊克武和倾向南方的刘湘。^⑥其他的军人则摇摆不定。大致川东的军人对自治的主张比较热心。四川的知识分子(如重庆的自治期成会和成都的自治学会)^⑦和国民党人(如戴季陶,吴玉章,杨庶堪)^⑧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选举立宪等比较重要的工作,则由一九二一年的重庆将领会议和一九二二年的成都将领会议包办。

①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二日。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③ 李旭，《蔡松坡》，一九四六年，八十三页。

④ 范崇实，《一九二——一九二二年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四期，七——十二页。

⑤ 范崇实，《一九二——一九二二年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四期，十三、十五页；吴晋航，《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二十五——二十六页。

⑥ 《四川文献》，第五卷，三十一期，三——四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七月六日；《时报》，一九二二年九月九日。

⑦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三日。

⑧ 吴晋航，《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二十五页。

口头上湖南和四川的联省自治运动都要摆脱南北之争，但是在两省自治运动高潮的时候又发动了介入南北之争的一九二一年的援鄂之战。援鄂之战表面上的理由是帮助邻省的自治运动。赵恒惕公开宣布的理由是“湖南既以自治号召天下，为自治而战亦名正言顺”。^①四川援鄂军统帅但懋辛的誓师词里说：“吾人固主张省自为谋，而省与省之间仍不可忘互助之谊。”^②“为自治而战”或“互助之谊”，跟“一省管一省自己的事”那样的“自治”是背道而驰的。这似乎表示表面上的理由之外还有更迫切的实际需要，使川湖的军队不得不进兵鄂西。

湖北要求自治有一些微弱的声音。^③自治的势力集中在鄂西，它之微弱因为湖北境内北方的军力太强大。那时在鄂北和豫南集中着战胜了皖系吴佩孚的军队，省内又有孙传芳的军队和从湖南撤退的张敬尧的败兵。主持省政的王占元是一支急于想保持自己势力的军事力量，他所最怕的是吴佩孚势力伸入湖北。于是他一面要好于张作霖，^④一面提倡鄂、川、滇、贵、湘、赣的六省自治同盟。^⑤湖北内政之糟可以从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一系列兵变看出来。那是湖北的“兵变年”，主要的城市和军事重地，例如武昌，宜昌，孝感，武穴等等地方，都有兵变。王占元联络奉系与南方六省自治同盟失败，内政不稳，给吴佩孚伸入湖北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吴佩孚入鄂对四川和湖南是一大威胁，于是两省援鄂之战在秋天爆发了。

从湖南本身看来，援鄂的急迫的理由是谭延闿赵恒惕之战以

①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③ 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一六六——一六七页。

④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⑤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

后,省内的军队太多,划分了防区,各区自行收税,以致省库空虚。赵恒惕又不能裁军,只好把一些不属于他的部队派到湖北去找出路。^①这些军队包括程潜,蓝天蔚,鲁涤平的部队,跟南方的国民党有联系,^②驻扎在湘西湘南,对赵恒惕的新政权是一大威胁,对湘西的云南贵州鸦片烟税收也是一大威胁。^③湘西是云南贵州鸦片烟转运到长沙,汉口,上海的一条道路。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四年,李烈钧的滇军,沈鸿英的桂军,蓝天蔚的杂牌军,熊克武的川军,以及当地的五花八门的军队,一直劫持这一条路上的鸦片烟税。^④从宝庆到长沙每月的鸦片税在一百万元以上。^⑤如果赵恒惕能利用联省自治的名义,调走客军和杂牌队伍,重新掌握鸦片税收,同时阻止吴佩孚军入鄂入湘,那对他在湖南的政权是最好不过的政策。

湖北对湖南的经济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湖南的米,茶,桐油,药材,矿产多半运到汉口,转售与上海或北方。湖南所需要的洋布,洋纱,石油等等也从汉口运到长沙。^⑥如果吴佩孚控制了汉口,湖南政治军事形势会因为吴佩孚控制了武汉的经济资源而起很大的变化。

四川本身的考虑略有不同。汉口和重庆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同于汉口和长沙的关系。四川的桐油,药材,猪鬃都输出到汉口;四川所需要的洋布,洋纱,石油来自汉口。四川是一个很重要的产鸦

① 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一六六——一六七页。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四日。

③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十月五日,十二月二十一日;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十八页。

④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十八页;黄绍竑,《五十回忆》,一九四五年,第一册,一〇六页。

⑤ 《银行周报》,第十九卷十期,七页。

⑥ 《商务官报》,丙午,二十号,——三页。

片的省，川土（四川鸦片）和云土（云南鸦片）由重庆，万县，运到汉口。一条路是沿长江而下，另一条路是经过鄂西的施南。^①集中汉口的川土云土每年的税收达二千万元。^②这些经济资源落到军力强大的吴佩孚的手里，对四川军人是很不利的。

四川军绅领袖的另一个考虑是川盐的“楚岸”。“川盐济楚”是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淮盐不能运到湖北而采用的政策。川盐所“济”的是宜昌府，施南府，鹤峰厅。^③四川产盐最盛时，每年的产量是一千四百载。^④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楚岸改用芦盐（河北盐）和淮盐，例如沙市用百分之二十的芦盐，宜昌用百分之四十的芦盐。^⑤川盐的销路损失了六百载。^⑥这些济楚的川盐多半来自川东的盐区。如果吴佩孚掌握了湖北，他可能在湖北扩大芦盐淮盐的销路，用以帮助直系在直隶江苏的势力，对抗奉系势力向南方伸张，但牺牲的是川盐的销路。^⑦川军援鄂也为了川土，川盐，其它的经济利益而战。保障那些经济利益，也就是保障川东军人从鸦片和盐取得的军饷。因此川东军人对援鄂也特别起劲。吴佩孚在湖北的胜利对川湘的自治运动会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

军——绅政权的主要支出是养兵，养兵才能巩固那个政权。在军——绅政权统治时期，有的军绅赞成中央集权，有的赞成地方分权；有的主张帝制复辟，有的主张保存约法。这些表而上振振有辞

① 《湖北通志》，第五十卷，五十一页。

② 《银行周报》，第九卷十期，七页。

③ 吴铎，《川盐官运之始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三卷二期，一八二页。

④ 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一九三八年，T三二——三四页。一载重量多少没有查出来。

⑤ 《时报》，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七日。

⑥ 《工商半月刊》，卷六十八期，一四二页。

⑦ 范崇实，《一九二——一九二二年四川军阀混战》，《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四期，二十页。

的大政方针的后面，主要的考虑是如何找钱，养兵，用兵来实现大政的方针。联省自治运动也不例外。在湘，鄂，川，自治要用兵力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要找钱养兵才能实现。各省找钱的方法不同，于是各省自治运动的考虑也就不同。

从整个中国的政局来看，主张和反对联省自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先看两三个学者的意见。

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认为中国是最不宜于行中央集权的国家。强行的结果必定是中央鞭长莫及，同时地方又没有人民的自治，于是只好由军阀来割据。消灭这样的军阀割据应该用的唯一的办法，不是武力统一，而是加强地方人民的自治(self-government, 不是 autonomy)，然后用联省自治来达到统一。^①章太炎，徐佛苏^②的理论跟胡适大致相同。社会主义者的李大钊认为南北的冲突，省与中央的冲突不能用武力来消灭，只能用联省自治来解决。不但如此，地大人众的国家多半由联省而形成联邦制的国家；由联省或联邦面这到大联邦，全世界的联邦，终以消除国界种界，而消除一切的冲突。^③在五四运动和南北双方上海和议的时期，自由主义者，左翼的知识分子多半一向情愿地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他们办的期刊——《新安徽》，《新浙江》，《新江西》，《新山东》——是宣传联省自治的刊物；销路很广的《东方杂志》，《太平洋》，《改造》等宣传联省自治，希望用联省自治来打击军国主义，保障人民的权利。^④

① 《胡适文存》，一九五三年，第二集，卷三，一一一、一一七页。

②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③ 《新潮》，卷一第二期，一五二——一五五页；《李大钊选集》，一九六二年，一三二页。

④ J. Gray(ed.),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 Chesneaux 关于联省自治的文章，一〇六页。

同一时期,两个主要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对联省自治大体上抱反对的态度。

国民党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一直反对中央集权,这是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国民党同情联省自治的根据。但是国民党在地方政治上的理论基础是地方自治(self-government, 不是autonomy), 地方自治的阻碍又是军阀的统治。国民党和学者们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消除这个阻碍。这个难题又使国民党犹疑不定。使国民党更加犹疑的是在有些地方(例如四川)它需要军阀的支持, 在其它的地方(如陕西)又需要打倒军阀。它参加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南北和平谈判, 支持过四川和陕西的联省自治运动, 但同时孙中山又组织过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的北伐。用和平也好, 用武力也好, 孙中山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军阀统治, 达到地方自治。但是在他的北伐的过程中, 他和广东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发生了冲突, 终于发生了战争。

陈炯明主张的联省自治跟湖南, 四川, 浙江军——绅政权的主张很不相同。他要求的是人民有权管理自己的事, 以村, 县的直接民主政权来消灭大小军阀。所以陈炯明才能支持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自治运动。^① 所以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和陈炯明争执的不是地方自治的理想, 而在于不经和平协商的方式, 在广东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形下, 对北方用兵。^②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虽然攻击联省自治政策, 但这并不表示国民党最后放弃了用和平方式达到统一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孙中山逝世之前不久, 还一面组织北伐,

① 《华字日报》,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吴铁城, 《吴铁城先生回忆录》,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一页; 陈炯明, 《中国统一刍议》, 一九二八年。

② 《华字日报》,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九月十二日。

一面又到北京与大军阀协商。他去世之后国民党才完全放弃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念头。

陈独秀反对胡适的联省自治的主张，因为有实力的人主张的联省自治“建筑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决不是建筑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①据陈独秀看来，所谓的“联省自治”实际上是“联督割据。”^②省宪，省议会不过是军人驯服的工具，联省自治不过是军人的魔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中国的统一必须经过革命战争。

如果我们撇开学者们的理想和势力还微弱的政党的主张，中国当日的实际情形是北方最有力的军事集团——皖系，直系——主张武力统一，南方最有势力的军事集团主张联省自治。南方的军力不能征服北方，如果要北方接受联省自治之议，一定要能合乎北方主要的利益，解决北方主要的问题，同时也能合乎南方的主要利益，解决南方主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利益和主要的问题在于土地，资源，养兵。北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个大军阀统治着几个省（联省统治），为巩固这种统治而订立的制度是“巡阅使”或“经略使”制。南方的联省自治要把这种局面改成一个督军只管一省的局面。这个办法只能消除联省统治的大军阀，而不能消除督军和军——绅政权。

即使达到了各省自治的局面，省怎样“联”？没有人在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提出过具体的办法。也没有提出过在达到省自治之后和达到联省自治之前，那一段过渡时期中中国全国的行政组织如何产生，产生之后又如何执行它的什么样的职权。

即使联省的方式可以找到，过渡期中国的行政组织问题可以

① 引自《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一一八——一二七页。

② 《向导》，卷一第二期。

解决,依照陈炯明的建议,中央政府只负责外交,军事,对外宣战媾和,划分省与中央的财政,由中央决定省与省的关系。^①这当中最棘手的还是军事与财政两个问题。陈炯明主张统一国军,由中央指挥,由中央担负军饷和军需。那样一来必然引起几乎不可解决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问题。

这些实际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主张联省自治的人不讨论的问题。他们之避免这些问题说明了他们注意的是自治(各省的军——绅政权只管本省的事),而不是“联省”来达到中国统一。如果彻底实行,中国会变成二十几个独立国家。

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的联省自治之议,实际上却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理由。倡导“自治”的各省都是为了那几个省本身的自私的考虑。例如唐继尧在一九一八年倡议联省自治,是为他向外发展,滇军进兵鄂西川东有一个借口。^②既然考虑的只是自私的理由,那么各省之间利益的冲突,中国如何能在各省自治之后保持统一,就不是他们热心的问题了。

那样的联省自治之议,甚至在主张最起劲的赵恒惕的湖南,也免不了有好些不能令人不怀疑的行动。一九二三年夏秋之交,湖南受到南方军力的威胁,赵恒惕还可以提出“武力护宪”的口号。但是三个月之后,在更强大的吴佩孚的军力威压之下,他就只好宣布结束湖南的自治。^③

军——绅政权所支持的和反对的联省自治是一句空话,一个梦想。正如陈独秀所说,那不过是“联督割据”,只能造成更大更深

① 《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一九二八年,十四——十五页。

② 《时报》,一九一八年四月九日。

③ 《时报》,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二日,十一月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十二月一日。

的混乱。湖南,四川,湖北,甚至陕西,福建,在这四年中,联省自治只为它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增加了政局的动荡。

当时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资源,养兵。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应该先从经济入手,犹如解决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问题应该先由“关税同盟”(Zollverein)入手一样。联省自治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解决办法,试验了四年,既没有清楚的概念,也没有实际的效果。于是就被人们遗弃了。

第 六 章

士 兵

历史学家受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从研究上层领导人物的历史，转而研究下层被领导人的历史。士兵是军队中的最下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研究农民运动变成一个“时髦”的题目。中国的士兵多半来自农民。在这一章里我们分析“士兵”这个题目，不止是为了时髦，而是因为军阀时期许多基本问题，不从士兵的分析着手恐怕得不到答案。我们的基本假定是这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因为军费增加，田赋增加，战争的破坏而进入了长期萧条的阶段。农民负担的债务加重，生活痛苦，失去了土地而不得不另谋生路。这个假定我们要在第十和十一章里详细分析。从那一个假定出发，我们应该证明的是当兵和带兵是一种职业，一种事业。从士兵的观点来看，当兵是职业；从军官的观点来看，带兵是上进的阶梯。不得不当兵的农民增加，士兵的人数增加，带兵的军官增加。军力膨胀，军费更膨胀。税收，田赋，战争的频率加大，这样军阀时期的恶性循环就形成了。想从那样的恶性循环中逃出来，必须裁军。如果不能裁，只好养兵。我们在前面一再地提过，养兵是军阀的基本考虑，也就是军阀时期一切军事，政治，经济难题的根源。那么一来，士兵这个题目就不能忽略了。

当兵并不是要另找生路的贫苦农民唯一的别的出路，中国的工业，手工业等等可以吸收一部分从农村中漂流出来的贫农。另一方面，想当兵来谋生的除了贫农之外还有其他的穷人——小手

工艺者，破产的商人，没有出路的学生，海外归来的工人等等。^①《东方杂志》第四十二卷三期上登载了一个短篇故事，描写一九二〇年代一个四川穷人当兵的经过：陈老三是个贫农，在农闲时抬滑竿（没有遮风雨设备的轿子），因为滑竿和农业担负的捐税太重，不能继续那样谋生，于是放弃了农业，逃到成都，入了伍，只有那样才“有吃，有穿，有钱用”。^②

据我所知，只有社会学家陶孟和在《社会科学杂志》一九三〇年六月号上发表的《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分析过中国军阀时期军队中的士兵。他分析的是一九二〇年代驻扎在山西太原的警卫旅五千人之中将近一千名士兵的社会背景。在那些士兵中，百分之八十七点三来自农业或没有职业的家庭，其余是小手艺人，商人，医士，教书先生。那些从农村来的士兵，如果自有耕地，平均所耕的地在二十七点七四亩之下，他们之中百分之七十一不能单靠种田维持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士兵之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一无父无母，而百分之四十九双亲俱存。他们的父母也许有兄弟姐妹照顾，可是百分之二十一点三竟是独生子。在独生子之中绝大多数有父母，绝大多数没有耕地或房产，绝大多数没有结婚。一般地说来，结了婚的人当兵的不多，只占全体的百分之二十七，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家庭负担。相反地，绝大多数要寄钱回家供养父母和其他的家庭人口。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不识字，年龄多在十五到二十九岁之间（占全体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据《东方杂志》的报道，年轻的士兵身体好，也容易听长官的话，比老兵好带一些。但他们也容易在打仗时逃跑，有时丢弃了，有时出卖他们的枪械。^③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三页，第二册，四一〇——四一二页；《独立评论》，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一〇八页。

②③ 参看沈从文，《小说选集》，一九五七年，三十八——四十页。

据陶孟和的报告,也许因为年轻身体好,容易找到别的职业,所以很少人当兵到四年以上。这一点我以为颇有问题。他的分析并没有说退出太原警卫队之后,士兵们找到了当兵以外的其它职业。很可能的是那些士兵从一个部队退伍又加入其它的部队,或者变成了团丁,土匪。这种情形在贫瘠的山地尤其普遍。福建的民军,湘西的杂色部队,常常换长官,常常受改编,但是大部分的士兵还是那些人。如果短篇小说里描写的情形与真实情形相距不远,当兵可能是十年以上的职业。^①

从陶孟和的调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当兵实在是职业,是穷人的一条生路。太原警卫旅的士兵每月收入在六元三角到九元之间。他们多数有能力寄一些钱回家。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广东士兵的收入也差不多。在一九一四年平均每月收入十二元,可以剩九元养家;一九一七年军队增加了,平均每个士兵的收入减到六元到七元五角,但也还可能有些剩余。^②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在一九二六年北伐之前,平均每月每个人收入在十元到十一元之间。这大概因为都是新兵,所以收入的差距很小。除去伙食六元左右,所剩的就不多了。^③ 把这些数字跟第十一章表二(B)的农民收入来比较,一个士兵如果收入每月八元,等于耕种一百亩地的一个四川自耕农的一家五口人的收入! 只有在五十亩到一百亩左右的小地主的收人才比他的收入好一些。

士兵的报酬当然包括当兵所冒的危险。但死伤的危险并不大。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为例,双方的伤亡一共四五千,但

① 艾芜,《都市的忧郁》,一九五九年,四十六——五十二页。

② 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第一册,一〇三——一三六页。

③ 沈凤岗,《蒋委员长全集》,一九三七年,卷五,九页; C.M. Wilbur and J.L.Y.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 1956, 179.

是双方动员了二十多万人。^① 伤亡的危险不过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点五。再从沈从文所描写的一个普通兵会明来看，会明说“打仗并不可怕”。一冲上前就可以发三个月的饷。^② 沈从文所描写的是湖南的小战争。在第四章里我们引用过英国驻成都领事 Sir Meyrick Hewlett 描写的一九二〇年成都之战，他说那好象英国兵演习一样，枪朝着天上放，死伤不多。十二年之后我经历过成都的巷战。当时我的印象也是内战并不怎么可怕，反而觉得好玩。也许我那时有些孩子气，不了解局势的严重。但是家里的人还照样打麻雀，一点也不怕。怕的是败兵撤退时烧杀奸淫。那时我也没有看见多少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兵。

穷苦的农民多，想当兵的人也多。中国于是用不着广泛地实行征兵制，而募兵或招兵。甚至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也是募来的兵。^③

募兵的办法是由地方长官奉军事当局的命令招募。他们找几个没有兵的失了业的下级军官(营长,连长之类),军官找“募兵贩子”。募成了军以后,发枪械制服,发月饷,训练一下,就组成了一支军队。^④ 其办法有点象募华工出洋做工或者募工人到上海去做“包身工”一样。所不同的是“募兵贩子”由地方长官给一点钱作为他们的报酬,他们不从兵身上挤出钱来当作他们的职业收入。“拉壮丁”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时的现象,那也许因为当兵的风险太大的原故。^⑤

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例如北方平原和大城市,招募的兵不一定

① *The Times*, May 8, 1922; *China Yearbook*, 1923, 575.

② 沈从文,《小说选集》,三十八——四〇页。

③ *The Times*, April 29, 1924.

④ 朱执信,《朱执信集》,第二册,三六九页。

⑤ 艾芜,《都市的忧郁》,一九五九年,五十八——六十六,七十五——八十六页。

是本地人。陶孟和调查的太原警备旅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点三是山西人。到外乡去招来外乡人当兵，那样的兵比较听话。最好是招长官家乡的人，没有言语的隔阂，又可以依靠同乡观念团结部下。这些外乡兵叛变逃亡的事故都比较少一些。但他们也容易引起驻扎地居民的不满。在外乡招兵的情形很多，李厚基驻福建，但到江苏徐州去招兵；孙传芳也驻福建，但到济南去招兵；蔡成勋驻江西，但到河南去招兵；蒋介石驻黄埔，他的兵是从上海招去的。^①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也不一定就在本地招兵。例如四川第一旅驻万县，那是山区，但招的兵是从豫西、鄂西来的。^②一般的说来，山区招的兵多半是本地人。例如广西招兵，喜欢收容从山区来的头脑单纯的钦州人。^③驻四川的滇军招了许多四川人，后来都带到云南去了。^④

当兵是穷苦的人谋生之路。这些人离开了农村就从“隐蔽的失业”变成了真正失业的“自由劳工”而参加劳工市场的竞争。这样一来，军阀就象大工厂的厂长，下级军官就象工头。有办法的军阀等于能干的企业家，能筹款养兵；没有办法的，只好欠饷。多数的军阀都经过没有办法的时期，欠过军饷。卢永祥，唐继尧，甚至吴佩孚都欠过军饷。^⑤驻在福建没有什么办法的王永泉的军队，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之间竟自欠饷十一个月之久。^⑥在那种情形下，军官和士兵就只好在驻屯地方自己想办法，拿老百姓的东西

① 《时报》，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The Times, April 29, 1924.

② 《时报》，一九二四年七月八日。

③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一九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④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⑤ 《华字日报》，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一日；《徐树铮电稿》，一九六二年，一八八页。

⑥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不付钱,抢劫,自行收税,哗变,逃亡等等。

在士兵的“劳工市场”上,竞争招募,也就是来收买的还有乡下的团首,城里的商团,他们也要失业的农民替他们服务。此外还有“遍地皆是”,也就是说各省都有的土匪。那么一来,这个时期中脱离生产的武装农民远超过武装士兵一百万到三百万的人数。据冯和法的统计,^①四川一省就有民团五十万人,这也许估计过高。福建在一九三一年,六十四县中五十二县有团防。全省有五万军队,却有四万团丁。单是龙岩一县,靠近江西苏区,就有一千五百到两千团丁。^②这些数字都不尽可靠,但团防是吸收失业农民的一个出路则是不成问题的。

关于土匪的数字更不可靠。据何西亚《盗匪问题研究》的估计,^③在一九一六年以前,中国有十一万四千名土匪;一九一六年以后,恐怕更多。许多土匪就是溃散的军队,许多军队就是招抚改编的土匪。^④四川北部的匪在反对袁世凯战争时加入护国军,在张勋搞复辟时称保皇军,南北之战时叫作靖国军。闽西北卢兴邦的军队,湘西周朝武的军队都是土匪军。^⑤所以黎元洪总统在一九二二年一份通电里说:“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⑥一九二五年在北京举行的善后会议也有同样的观察。^⑦总统府的军事机关,参陆办公处,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就下过命令,不准军官招土匪为军。^⑧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四川善后会议的决议,也不

①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第二册,八二七页。

②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一册,八七九——八八二页。

③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九三一年,二二五——二二六页。

④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十六期。

⑤ 《时报》,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六日;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⑥ 《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二集,一八〇页。

⑦ 《善后会议提案》,一九二五年,卷五,《议案》,二二五页。

⑧ 《时报》,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准军人招团防土匪为军。^①

事实上,几乎没有一支正规军中没有土匪出身的兵士,也就是说没有一支正规军没有土匪出身的军官。最显著的招编土匪而成的军队有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的鲁军,倪嗣冲的安武军,赵倜的豫军,刘镇华的镇嵩军,更不必提在各省边界上的军队。辛亥革命以后,由会党招集的民军比较多的省份有四川,陕西,河南,广东等省,这些民军或者收编为正规军(如陈炯明的军队),或者遣散而为土匪。^②一九一六年后,在陕西,福建,广西极为活跃的民军,自治军等非正规军,除了领导人不是公认的土匪头子之外,性质和土匪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军饷来源。^③

这时乡下的情形正如沙汀在一篇小说《苦难》中描写的那样。县长浑身武装,本来就是军人。县城的桥头城门由团丁把守,县外山上是军队和土匪。军队,团防,土匪争夺和保卫的是土地,资源,人。他们之间的争夺,各地都有报告。军队,团防,土匪是军阀时期脱离生产的武装农民,人数应该在五百万以上。同一时期中国的新式工业人口不过二百万。

正规军是怎样训练的?我没有读过可靠的详细的记载。一般的印象是训练得不好。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民国初年的北洋军,在原则上“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④这样的文章,不知道有几个军官可以看得懂。那不过是儒家传统治兵的理想。军队好象一个大家庭,军官

① 《四川善后会议录》,一九二六年,下,四——六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四一四——四一五页。

③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一九二六年,上,一三一——一三二页;《华字时报》,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④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陆纯编,一九一四年,第二卷,四页。

是父兄，士兵是子弟。那样的将官才是儒将。新军只是形式新，内容还是传统的那一套。北洋军除了表面上整齐划一，内容和技术都陈旧腐败。^①这种“新瓶旧酒”的情形，跟中国的新政府组织，中国的新式企业差不多。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公式在军事训练方面的发展。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位英国军官在贵州参观陆军，对陆军的训练有很不好的印象。放枪常常不准，浪费弹药。*The Times*的记者G.E. Morrison对一九一二年河南军队的训练也有同感。^②国民党一位年轻而且头脑清晰的领袖，朱执信，在俄国革命后到过俄国，他就看出士兵的政治训练很重要，认为那是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因素。^③后来到苏联去参观过，到黄埔负责练兵的蒋介石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党之军队只能受党之命令，服从党之裁制。”^④但是在黄埔，他训练的是军官，不是士兵。他的政治训练只及于军官，而且他练兵的模范是曾国藩，胡林翼等等近代的儒将。^⑤对士兵他用两个办法：（一）军需独立，希望军饷能按期如数发给士兵；（二）连坐法——如果军官与军士犯了法，一齐处分。^⑥蒋介石也还是一面承继儒家传统，一面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办法在那里进行他的“政治训练”。士兵并不了解革命，只跟着长官行动。长官也不一定了解三民主义，因为党领袖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的解释。军官也不一定依照党的指示行动，因为党内派系分歧，有各种各样的指示。^⑦

① 《游学译编》，第六期，六一三页；黄绍竑，《五十回忆》，一九四五年，上，二十七页。

②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O. 371/1085, 3408.

③ 朱执信，《朱执信集》，第二册，三七三——三九四页。

④ 《革命文献》，十六册，一〇五页。

⑤ 张其昀，《党史概要》，一九五一年，第二册，四六六页。

⑥ 蒋介石，《蒋总统言论汇编》，一九五六年，第八册，一五四——一七〇页。

⑦ 《汪精卫集》，一九二九年，第三册，一三七页；黄绍竑，《五十回忆》，上，一七〇页。

一九二四年十月所谓的“首都革命”或“首都政变”以来，训练比较好的军队是在北京的冯玉祥的部队。^①但后来在北伐战争中，他的军队的纪律也弛废了。^②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也差不多。北伐初期在长沙，武汉，纪律还好，到九江时就变坏了。^③到了山东的济南时更糟。^④至于其他的军队，烧杀抢劫奸淫是常见的事。正如Wellington所说的那样：“战利品是你那腥臭的手抓住不放下的东西。……兵是人类的渣滓。”^⑤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建议书中对军阀的军队批评得十分恰当：

“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参谋无作战之准备，经理无可稽之册。……虚报军额，吞没军饷。强劫税收，庇赌包烟，通盗运私，干涉民政，霸占机关。……财权武力兼于一身。……军官之富者，多积资在万数之上；而兵士则穷至衣不蔽体。……人民畏兵甚于畏匪。”^⑥

这样的军队没有技术训练，退伍之后没有谋生的技术，对中国的现代化丝毫没有帮助。这样的军队把伤病的工作完全交给别的机关去处理。红十字会、基督教会的医院，一些民办的慈善机关，残废士兵的工厂等等。这些机关的数目不多，人力财力有限，只能解决整个士兵伤病问题的一小部分。在军队中花柳病和疫症流

① 张西曼，《历史回忆》，一九四九年，二十七页；周作人，《看云集》，二六九页。

② *The Times*, December 23, 1927.

③ *The Times*, September 1, 1926, October 23, 1926; *Manduster Guardian* April 8, 1927.

④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八页。

⑤ G.M.Trevelyan, *British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London, 1947, 126.

⑥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七 J，二十一——二十一页。

行。打败了之后把伤兵遗弃不管是常见的事。^①

这样的军队的主要武器是 Mausers(毛瑟)和 rifles(步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加上一些手榴弹,机关枪,手提机关枪(Luger automatic pistols)。大概一千名士兵之中,如果装备相当好,有八百枝步枪,五挺机关枪。^②照这样的比例,一九二五年以中国有二百万军队计算,应该有一百五十万枝步枪,一万挺机关枪。^③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旧式的。加之以每个军士所有的弹药不多,在战争中中国军阀的军队破坏杀伤的能力不会太大。

中国军队也配备得有一些大型重武器,加山炮,大炮。但数量极少,少于机关枪,而且没有测距器(range finders),只是军官用望远镜(field glasses)在猜射程应该多远。炮弹也很少。所以除了吓人之外,没有什么效果。^④中国老式的城墙还很有效,可以证明大炮之不行。攻城的办法还是挖长壕,用炸药炸城墙,或者用云梯爬城墙。^⑤

士兵的杀伤和破坏能力有限,内战的破坏性主要不在战争的过程之中,而在战前战后。战前战后士兵破坏行为一方而因为欠饷,另一方而因为士兵的训练不好。中央和地方政府欠发军饷是常见的事,据一九二三年 *China Yearbook* 在七一二页的估计,全国欠饷达一亿八千万元之多。欠饷的军队不能开拔到别的地方,

① 《时报》,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九月十八日;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关于士兵疾疫》,《时报》,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一月十一日。

② 《第四军纪实》,一九四九年,六十九、八十二——八十三、九十、一五九、一六〇——一六一页。根据所报告的缴获的武器算出来的比例。并参看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六A,四十五上——下页。

③ *China Yearbook*, 1923, 579.

④ *China Yearbook*, 1923, 575—576.

⑤ 例如北伐时期的武昌攻城战,《革命文献》,第十三册,一九九——二一五页。

因为在驻扎地方能找到当地的收入。如果要开拔，就得付欠饷和开拔费。欠饷的军队也不能或不愿意打仗，好象工人罢工一样，要他们打仗就得发欠饷。

如果不发欠饷，士兵对付的办法是兵变。在兵变之中，他们抢劫人民的财物，这常是由兵变匪的开始。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外国的借款少了，欠饷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兵变也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湖北集中的军队，有皖系在一九二〇年的败兵，南方的客军，本省主张联省自治的军队，和本地的杂牌军，其中许多单位都发生了兵变。^①

据我收集的一九〇八——一九三六年三百次兵变的资料，以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十年间最多，有二百零六次。这十年间又以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的六十八次，和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的八十四次是兵变的两个高潮。兵变的地域分布是：湖南四十一次，湖北，河北各三十四次，四川二十六次是全国这二十八年兵变最多的省份。湘，鄂，川三省兵变一共有一百零一次。

绝大多数的兵变是经济性的，欠饷是主因。政治性的兵变很少；一九一二年北京第三镇(师)变乱，结果使中央政府不迁到南京，那是例外。政治性的兵变，如彭德怀，贺龙，邝继勋，董振堂，罗炳辉，刘伯承等人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那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

每次战争之后，士兵的破坏性表现在抢劫，烧杀，奸淫。他们的长官，也以“自由行动三天”来鼓励和报酬士兵勇敢的行径。^②据朱执信的分析，这些平常生活无聊又不安定的士兵，多半没有结婚，突然打了几仗，十分疲劳，要找人出气，要尽情地放纵一下，于是

①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② 《北京兵变始末记》，一九一二年，五页；《朱执信集》，第二册，三七七——三七八页；Manchester Guardian, January 14, 1926.

抢,杀,烧,奸淫。^①张勋的辫子军占了南京之后,张敬尧的军队占了长沙之后,都有这样穷凶极恶的表现。^②四川军人说:“婆娘家,洗脚水,洗了一盆又一盆。”^③我记得在高中受军训的时候,一个军事教官对我说,军队的精神就在烧杀奸淫,没有这种精神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至于当军官的人,他们从军不但是职业,而且是上进的阶梯,由此而取得财富,权力,地位。他们想存钱,买田地房产,提高自己和家里人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恐怕没有一个全国都遵照的水准。在民国初年,国军(也就是中央直辖部队)一个连长每月六十两银子,加上二十两办公费;一个团长每月一百两,加上一百四十两办公费;一个师长每月四百两,加上六百两办公费。^④此外,他们也贪污,克扣军饷,吃空额,私赏军火。^⑤如果一本正经,不贪污,就很不容易和同营的其他军官合作,反而会站不住脚,有失去职业的危险。^⑥军官之间的人事关系也是传统的亲戚,同乡,同学关系。^⑦在他们之间军纪是一回事,私人关系是另一回事。也象文官一样,养戚官官相卫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营私舞弊的来源。

波多野善大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军阀の研究》一书中第二八三页,列举了好些带兵发了财的军官。《上海时报》也在每个大军阀死时或者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宣布他们的家产有多少。不止是大军阀象张作霖,曹锟,李纯那样,积累了几千万元,投资于地产,高

① 《朱执信集》,第二册,三七六——三七七页,四六二——四六四页。

② G.E.Morrison, *Correspondence*, I, 1977, 215; 《时报》,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③ 沙汀,《短篇小说集》,一九五三年,六十一页。

④ *China Yearbook*, 1914, 320; 1925, 1960.

⑤ 《朱执信集》,第二册,三七三页。

⑥ 《朱执信集》,第二册,三六四页。

⑦ 胡光骐,《蜀游杂感》,《独立评论》,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七十页。

利贷,近代的企业等等。^①小军阀也搞得不错。在福建带民军的陈国辉,贩鸦片,存积了八百多万元;^②在贵州北部给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的侯之担也有一百多万元。^③

一般军官升官的机会是打仗。打了胜仗,财富,权力,地位都增加;打了败仗,投降。投降之后,一个下场是被遣散,遣散时有遣散费。带着遣散费和败兵,可以暂时当土匪。一九二三年山东临城有一次劫火车的案件,因为车上有外国人,被绑了票,于是变成一次国际事件。抢车的匪就是打败了的赵倜,张敬尧,张勋的旧部队。闹出了这样的大事之后,那些土匪又收编成正式的军队,以土匪头子孙美瑶为旅长。^④打了胜仗,收编败军和投降的军队,占领败军的地盘。那也同时是败军的另一个下场。但战胜的军官因此而增加自己的军力和收入。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年刘镇华的镇嵩军变成陕西河南之间,一支巨大军力的过程。^⑤这样的情形常有。湖南赵恒惕收编张敬尧的败兵,^⑥川滇之战中川军收编拥护滇军的败兵,^⑦一九二三年桂系沈鸿英收编广东李福林的败兵,^⑧都是例子。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也采用这个方法,收编或收买敌军,来达到他统一中国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问:为什么不在每次内战之后,遣散败兵,来达到裁军的目的?为什么北伐战役中的蒋介石也不能采用

① 《时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此种数字不能当作很精确的数字处理,参看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の研究》,二八三页。

② 《时报》,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

③ 《时报》,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

④ 陈无我,《临案纪实》,一九二三年,二十八,五十二,五十三页。

⑤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上,一三五——一三六页。

⑥ 濂江渔父,《直皖战争始末》,《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七十五——七十六页。

⑦ 《川滇战争报告书》,一九二〇年序,八——九页。

⑧ 《华字日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

这个办法来使中国重归于治？诚然，遣散败兵和裁军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想减少中国养不起的兵额。一九一二年以后有两次裁军的提议：一次在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另一次在一九一九年南北裁军会议时期。^①如果裁军之后没有安排士兵的计划，那只能增加流民盗匪的人数。^②孙中山提过一份工兵计划，把一些现有的军队改为工兵，训练他们修路或做其它工作。他们的生产所得，一半归于国家，一半归于工兵。这个计划显然要得到军阀的同意与合作。^③不经所有的大军阀同意合作的裁军与遣散都是很危险的。民国元年黄兴裁军，结果是国民党的军力大为减弱，在一九一三年内战中大败。^④一九二八年湖南福建遣散军队，另外有人在那里收编遣散了的军队，结果是有些军阀变弱了，别的一些军阀变强了。^⑤北伐之后的编遣会议，要把军队裁到八十万，军费不能超出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估计裁军费要一亿九千二百万元，政府找不到那样一笔钱。而且着手裁军时，四个集团军的待遇又不公平。第二集团军裁十万人要一千万元，但没有钱；第四集团军只领到三百万元的裁军费。^⑥结果因为编遣而造成了一系列的兵变和一系列的內战。

大军阀小军阀不同意不合作的遣散还有一个危险，一失去了兵权，军阀自己的生命财产也保不住。用战败的军阀来证明这一点。张宗昌，曲同丰，谭浩明，洪兆麟，徐树铮，张绍曾，孙传芳等等，都是烜赫一时的军阀，都是在战败之后，被复仇的人刺死的。曹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二十二——二十三页；《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② 《时报》，一九二九年三月三日；《吴佩孚先生集》，三一九页。

③ 《革命文献》，第七期，一〇五——一〇七页。

④ 《独立周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三页。

⑤ 《时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二日，八月二十六日。

⑥ 《时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七月二十日，九月八日，十月十七日；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九月二十三日，十月十八日。

馄的家竟被人抢劫；^① 陆荣廷的孙儿，改了姓名，十三岁时在上海被人刺死；^② 魏邦平败退之后，自己化装为西崽（茶房，侍者），逃到香港。^③ 军阀自己的安全靠他们手下的军队。遣散或裁军不但要保障士兵的生活，也要保障军阀的生命。

“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军阀带兵是一种骑虎不能下背的局面。

① 《时报》，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② 《时报》，一九二三年七月五日。

③ 《时报》，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附表: 中国军队 估计

省 别	1919	1923	1923—24	1925
北方: 吉林	33,000	140,000	110,000	40,000
黑龙江	31,000			22,000(350,000*)
奉天				90,000
新疆	12,500	20,000	7,700	24,000
察哈尔	25,000	12,000	8,520	11,000
绥远	21,000		8,000	11,000
热河	15,000	9,000	6,150	21,000
直隶		38,000	57,000	180,000
河南		55,000	34,500	203,000
甘肃	24,000	50,000	49,600	77,000
山西		50,000	43,400	64,000
山东	64,000	40,000	44,000	115,000
内战区: 陕西	131,000	50,000	37,000	77,000
湖南	165,000	40,000	43,600	68,000
四川	122,000	186,000	90,000	250,000
湖北	84,000	30,000	84,500	110,000
江西	50,000	18,000	20,900	
福建	71,000	30,000	66,000	69,000
南方: 浙江	38,000	35,000	32,300	61,000
安徽		30,000	21,000	30,800
江苏	88,000	60,000	42,700	77,000
广西	47,000	60,000	10,000	49,000
广东	69,000	151,000	86,000	113,500
贵州	27,000	50,000	7,150	39,000
云南	26,000	45,000	44,000	50,000
共 计	1,169,500	1,508,000	877,620	2,262,000
估 计	1,400,000	1,620,500	1,500,000	1,450,000

资料来源: *China Yearbook*, 1924, 1925.

《华字日报》, 1919. 2. 12.

丁文江, 《民国军事近纪》, 上, 80—106.

其它估计: 《辛亥革命——反袁之战前500,000(*China Yearbook*, 1913, 1914)

反袁之战——直皖之战 1,000,000—1,200,000 (C. F. Remu, *Foreign Trade*, 172—173; *China Yearbook*, 1923)

直皖战后——第二次直奉战前 1,500,000

第二次直奉战后——北伐2,000,000—3,000,000

第七章

派系与内政

分析了一些关于军人的问题之后，让我们换个题目，看看军——绅政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之后，凡是关心国事的中国人，无论多么保守，多么激进，都致力于国体和政体的缔造工作。政党，国会，立宪，选举，总统，内阁，新式的司法系统，新式的财政系统，新军，新式的警察……。这些新制度，有的借自日本，有的来自西方。这些借用的理论，法律，组织，在外国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结果，国体不稳定，政体也不稳定。同时，主要的政治社会势力，认为中国的基本文化传统（体），社会组织（纪纲）绝不能变，也不应该变。即使变，也只能一点一滴地变。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有时给叫作“国粹”（如学衡派就这样说），有时给叫作“积习”（如鲁迅就这样说）。那也就是当时人常常提到的“国情”。借用的东西不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行不通。国情既是中国文化的“体”，“体”和借来的“用”格格不入，结果“用”也就无用了。

从内政方面来看，军阀时期主导的政治目的是统一。统一于君主立宪或统一于民主立宪。以武力或以和平方式统一，那是其次的问题。无论如何，中国必须统一，由统一才能使国富兵强。那是多数关心国事的人的希望。但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的实际是不统一，是分崩离析。在愿望和实际之间存在着破坏统一的力量，那些力量形成了正式的组织，如鲁军团和安福系；或非正式的组织，用

私人关系结成的关系网。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 and 关系网都可以称为派系。

派系不把自己看成派系，正如军阀不把自己当作军阀一样。他们对自己的意象 (self-image) 与对其它派系的意象很不相同。结成派系时总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或成套的理论——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福利，那是每个派系对自己的看法。别的派系则被认为是阻碍国家统一富强，有害于人民福利的组织或关系网，应该打倒，解散，那是每个派系对别的派系的看法。自己的派系是理想，别的派系是实际。改变实际来达到理想是每个派系斗争的方向和目标。于是派系与派系之间结下了不能解决的纠纷，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结成派系常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等传统的私人关系。这些私人关系都不是平等关系，把这些传统关系带进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来，就把基本上属于平等的党员，议员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人组成的政党，国会等变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

不平等的关系是主从，长幼，尊卑的关系。主子，长者，尊者以恩惠来团结从属的人；从属的人以尽忠主子，长者，尊者的态度来依附于派系的领袖。于是在军队之中，大军阀以金钱，地盘，官阶来维系小军阀；小军阀以忠心作战，尊重上官的意见来依附于大军阀。军人派系的意见和组织是这样团结起来的。在政党或政府部门中，派系领袖或长官以薪水，职位，权力来维系拥护他们的人；拥护他们的人以忠于领袖，尊敬长官的态度来依附于领袖长官。绅士的派系意见和组织的团结也是这样维持的。主从，长幼，尊卑的关系，在派系之中是一种交换关系，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收买。取得了团结之后，一个派系为了某一个问题的，某一个目的而

奋斗。

我们可以问：政党也是政治斗争的组织，但为什么中国有了政党还需要派系？政党有政纲，有组织法，有党内外政治行为的规律。规律不一定象共产党的“铁的纪律”那样严格，但讨论，交换意见，表决；表决之后少数服从多数。派系没有政纲，只对某一个或某一些问题有特别的看法。派系即使有组织也没有明确的组织法。派系政治行为的标准不是“讨论，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传统的恩惠和忠诚的交换关系。

派系的政治文化不但在中国政治和军事生活中很显著，在金融界也很显著。金城，盐业，大陆，北洋保商等银行都是支持北洋军阀的银行；各省的银行支持的是各省的军阀。交通系控制着交通银行。以同乡关系为基础的有广东帮，川帮，江浙帮的银行和钱庄。报纸和政治派系有密切的关系。北京的《公言报》，《民国公报》，《民国日报》等十五家，天津上海的《大公报》都是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时代安福系的报纸。^①一九二〇年北京七十七家报纸都有派系的支持。

这些热心于新式政治军事组织的人，同时又努力搞派系的人，都是一八六〇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从小受了传统教育或传统文化的影响，到一八九五年后中国民族主义觉醒了，他们也到了可以采取政治行动的年龄。一方面他们承继了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企望中国能统一富强。一方面向往一个统一富强的国家，一方面干破坏统一阻挠富强的工作。甚至一九〇五年废除传统的考试制度之后，留日留英美的学生也不能完全消除传统政治社会文化对他们的薰染。他们在军阀时期发展了这样的作风，在国民党内也还保留了这样的作风。

^① 南海风子，《安福痛史》，一九二六年，上，一九三页。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内政中的派系作风。

这时期的军阀分作许多派，各派有自己的领袖。拥护他们的人除了从属关系之外，更加上姻亲，父子兄弟，同宗，同学，同乡，结拜兄弟等等私人关系，来巩固每一个派系的团结。这些派系之下又有小的派系，如皖系的靳云鹏派和徐树铮派；直系的保定派和洛阳派；滇军的唐继尧系和顾品珍系。这些派系都用人名或地名来标志，正说明了他们在原则方针上几乎没有分划的可能。

我们先看张作霖领导的奉系。

园四一龟早年的著作和 G. McCormack 新近的著作，对张作霖的出身和最初拥护他的人分析得很详细。他们多半是马贼出身，经过一九〇五年的战争，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一九一六年的反袁，张作霖统一了奉天省。占据了地盘，接受了日本的支持，于是张作霖这个“怪杰”有施恩的能力来团结部下，扩充军队。随着军力的膨胀，对地盘的要求也加大。他的势力先伸到黑龙江，然后到吉林。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时，他统一东三省的计划完成了。而且奉系的势力伸入内蒙古和直隶。奉军高级将领之间的人事关系还是旧日的绿林兄弟关系，同时受过新式训练的，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的军人也在奉系中有了一些力量。军队愈扩充，部下的要求愈大，张大帅就必须愈有施恩的能力。这是东北军政民政冲突的很本要点，是日本与张作霖冲突的症结，是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的原因。

一九二二年战败之后，一般人认为张作霖放弃了传统的绿林兄弟关系，引用新式军官来改组他的军队，准备报战败之仇。^①这里所指的改组恐怕主要在中下级军官之间，旅长以上的变更有，但

①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近代支那名人鉴》，一九二八年，一三八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国闻周报》，卷五十三期，A三十页。

并不大。这就是说传统的人事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尤其是地盘的控制，仍然在老派的手里。老派和拥有土地的绅士已经建立了多年的关系，如果用新派的人来控制地盘，他们必须是绅士能接受的新人物。那就是要把“新瓶”装上“旧酒”。

一九二二年以后有两个重要的领袖出现。一个是杨宇霆，另一个是张学良。两者都是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人，杨是张大帅的老部下，张学良是大帅的爱子。这两个人带兵，参谋，但不控制土地。这是奉军新旧两派矛盾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打败了直系之后，张学良反对旧派军人的土匪作风，表现得最激烈的是他反对以张宗昌为江苏督军。^①张学良的部下郭松龄反对旧派霸占地盘，甚至采取了叛变的行动。^②奉军中新旧两派对蒋介石北伐军的政策也跟土地，军——绅合作政权有密切的关系。新派不以地盘为重，因而反对跟北伐军正面冲突，倾向于和平解决。^③

在奉系之中，绿林结拜兄弟关系不一定可靠。冯德麟反对张作霖，吴俊升与张作霖争夺吉林督军的地位都是例子。^④亲戚关系也不一定可靠，吉林督军孟恩远和他的外甥高士侯意见行动相左就是例子。^⑤从属关系也不可靠，郭松龄叛张是一个例子。除了父子关系之外，作军事领袖的人一定得有不断增加的施恩的能力，而且要比别的领袖施恩的能力大。这样才能团结部下，同休戚，同进步。施恩的能力主要靠土地的控制。

再用蒋介石的兴起作例子。他在北伐时期，占有的土地不断

① 《革命文献》第二十一册，一七一—二页。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G.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5*, 1977, 150.

③ 《东方杂志》，第一一六期；*Manchester Guardian*, May 27, 1927.

④ 《徐树铮电稿》，四十五页；G. McCormack, *ibid.*, 30—32.

⑤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扩大,施恩的能力不断加大,北伐军的扩张也就很快。^①北伐胜利的一个主因是他的施恩能力大于敌军领袖,他能分化敌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给陈果夫的电文里说得很露骨:“海军来归,须先发饷三十五万元,坚其来归之心。”^②因为北京政府没有发饷,所以海军“南归”。政治原则的考虑倒是次要的。

政治上的派系,我们以安福系为例于。

一九一八年组成的安福俱乐部,不称“党”,实际上也不等于一个政党,因为它没有政纲。王揖堂受段祺瑞,徐树铮两个军事领袖的指示,把当时多半是绅士组成的小政团结合成一个团体,在国会中有一致的意见,投票时有一致的行动。这些议员必须常住北京。为此,每个议员每个月领安福系的津贴三百元,在重要的选举投票时另外有津贴。^③例如选徐世昌为总统,每一张赞成票五千元;选曹錕为副总统,每一张赞成票三千元。经费来自段祺瑞得到的西原借款,财政部拨款,鸦片烟收入,卖米给日本的收入等等。^④这个政治团体以段祺瑞为中心人物,操纵了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新国会。^⑤在那时内阁中,安福系的势力也很大。例如一九一九年五月徐世昌提名以周树模为总理,安福系要求以交通,财政,司法三部长,一些次长,中国银行总裁为交换条件。结果交通,财政,司法,北京警察总监等要职都由安福系的人把持。^⑥

① Carsun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1952, 92.

② 《革命文献》,第十四册,三四五页。

③ 濂江渔物,《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十五、二十页;陶菊隐,《督军团传》,二〇〇页; *The Times*, October 21, 1918; *China Yearbook*, 1925, 1121.

④ 濂江渔物,《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十二——二十二页。

⑤ 安福系在新国会中有三百三十票,旧交通系一百二十票,研究系只二十余票。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二八〇页。

⑥ 濂江渔物,《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十三页。

安福俱乐部有奉系的国会议员，受张作霖的操纵；也有直系的议员，受曹锟的操纵。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发津贴，也有武力可以威胁议员们；议员们则留在北京，出席国会，投票。到一九二〇年皖、奉、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的时候，直系和奉系的安福议员都脱离了安福系。^①

以交换关系为主的安福系要能交换才有成立和存在的必要。交换的场合是在安福俱乐部发津贴，在国会中投票。所以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南北和平会议中安福系一成不变的要求是一九一八年选举的国会决不能解散，决不能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选举的旧国会来代替。^②等到直皖战争中皖系战败，安福系失去了凭借的军力，失去了在国会中的交换能力，也就不必再存在下去。

派系政治与派系军队有它本身不可避免的弱点。第一，派系以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关系网以领袖为中心。领袖失去了施恩的能力，下台或者死亡，如象梁士诒在洪宪帝制运动中失去了交通部，新交通系就代替了旧交通系，派系就会瓦解。旧领袖下台或死亡，新领袖起而代之。即使在那样的情形下，人事关系变了，这就是中国人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意见也不同了，那一个派系的性质也要改变。曹锟代冯国璋而领导形成“直系”的一些将领，所谓的“直系”本身的结构和主张也改变了。第二，派系是同时存在的，同一时期只有一个派系那就不是派系。因为好些派系同时存在，每一个派系的权力影响都有限，也没有完全消灭别的派系的能力。于是派系斗争多半不彻底。在缺乏斗争能力的情况下，形成了宽容大度的斗争作风——“穷寇莫追”，“网开一而”。今日的派系仇

① 陶菊隐，《督军团传》，二四五——二四六页。

② 南海胤子，《安福痛史》，一九二六年，上，一三〇页。

敌,可能变成明日的派系朋友。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直皖之战以后都有一批人受通缉,重要的“罪犯”都没有捉到,事过境迁,这些人又恢复了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第三,一个派系之中没有正式的上下行和平行的消息传达机构,多半靠个人的接触和个人意见交换,有时靠中间人斡旋。这样才亲切有礼,事情才办得通。一纸公文或者开会讨论,那是不讲情面的作法,在派系中不多见。这样靠个人私下的意见传达交换,很难免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了解,而且为说诳,强调,歪曲,反悔,否认制造机会。这是派系之中不和谐的一个根源。第四,派系的形成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见解,但总不如交换关系那么重要。见解可以曲解来为交换关系,人事关系辩护。这又增加了派系内部与派系之间团结的困难。派系政治和军事上的意见分歧,常常为交换关系,私人关系面加深,造成派系的分裂,或派系联盟变幻无常的状态。

由于这些弱点,派系之内与派系之间,一致的意见不容易达到,达到之后也不容易维持多久。这种作风带进了新式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组织之中,常常把新组织弄成行不通,没有用的点缀。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和现代化的实际由此面南辕北辙。

第八章

派系与外交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有四个内应，四个工具，——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①军——绅政权之必须打倒，因为他们跟帝国主义勾结。

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形成时期，帝国主义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极不利于中国的势力。一九〇三年陈天华的《警世钟》说帝国主义把“大好江山变做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为最下的奴才。”^②但是在一九〇〇年代一般的认识是帝国主义来自“民族之力充沛于内不得不溢于外。”^③甚至于孙中山也把帝国主义看成“民族主义发达的最后阶段”。^④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虽然不好，民族主义却是中国急需的思想。民族主义发展到精力充沛不得不溢于外的阶段，中国就变成了象英，美，日，法那样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的中国也许变为帝国主义的中国，找几个弱小国家发泄它过剩的精力。但哪不要紧，欺负别人总比被人欺负舒服些。要紧的是那个“神州大国”，“神明贵种”能变成“列强”（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中国在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代很弱，中国弱由于中国自己不争气，自己的缺点太多，并不是外国的压迫，更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有内应，工具。

① 李宗黄，《中国国民党史》，一九二八年，三三四——三三五页。

② 《辛亥革命》，第二册，一一二页。

③ 张榕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九六〇年，第一册，一二〇页。

④ 崔书琴，《中山先生与共产主义》，一九五四年，七十七页。

如果单就军人来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期,惋惜的是中国没有日本幕末维新时代的“侠士”,^①中国要有千百“志士”就好了。有“士道”或“武士道”的志士,具有“游侠魂”,发挥军国主义的精神,那种人是近代的军人。只有他们才有“国民之抱负,社会之纪律,国民之共同心”。^②换言之,训练新军人,把中国变成军国,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可以发扬,最后变成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一。这是一九〇〇年代的人看出的中国最理想的发展途径。军人是达到中国帝国主义的工具,是中国最优秀的子弟,没有他们是不行的。

从军人是中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工具,应该拥护,到军人是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应该打倒,前后为期不过二十年。一般关心国事的人对军人的看法的改变,自然和军人对国内问题的处理有关系,也和军人对外交问题的处理有关系。

中国由军——绅政权处理的第一个重大外交问题是欧洲战争。

一九一七年中国参加欧战有两个实际上的重要考虑。第一,以参战为名向外国借款,也希望能提高关税率,缓付庚子赔款,这样来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窘迫;第二,中央需要大量的款项是为了政治军事两方面巩固政府的地位,中心工作在训练参战军,有了参战军之后可以用来解决国内分裂割据的局面,达到武力统一。^③皖系军人自然支持参战政策,因为中央政府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此外,东北,直隶,河南的军人也支持参战。^④

① 石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一九五七年,三八九页。

② 张榕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九六〇年,第一册,八十七、八十九页,四二八——四二九页。

③ 《关于财政需要》,参看外务部致驻日使电,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四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第七册,九十六、一〇四页。

④ 《新青年》,第三卷四期;罗家伦编,《国父年谱初稿》,一九五九年,第二册,四二〇页。

增加关税率的要求没有达到,但缓付庚子赔款为期五年。^①至于向外借款,主要是西原龟三分几次借给段祺瑞政府的四千五百万元,利率平均在百分之八以下,不收回扣,也不要求确切的担保。^②这代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间所有日本对华借款的百分之五十八,同时日本借给中国无确实担保的款项占一九二五年以前中国所有的无确实担保的外债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五。^③由于这些借款,日本控制了东北和山东的一些铁路,东北的一些矿产资源,和一些银行(如交通银行)。皖系政府则用借款来训练参战军,团结北洋势力,支付行政费用。^④前提自然是答应参战。

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宣布对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到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终止对德战争,^⑤段祺瑞练成了四个师。钱主要是西原借款,装备是日本的武器;军需官,教练,顾问有日本人,总司令是徐树铮。^⑥拥护对德宣战,拥护组织参战军的军人不少,但是值得注意的三个强有力的督军——江苏冯国璋,江西李纯,安徽张勋——和南方的督军反对参战军的组织,反对在陆军部之外另设一个独立的国防机关——参战督办处(后来改为边防督办处)。^⑦

参战和皖系扩军于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欧战因此而变成

① *The Times*, September 10, 1917.

② 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第二册,三七四页;章宗祥,《东京三年》,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第七册,一九九页;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一册,六十六——七十三页。

③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一册,六十六——七十三页;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一九六二年,一八四——一九四页。

④ 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一九六二年,一五〇页。

⑤ *The Times*, August 15, 1917;《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⑥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上,十一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一九三〇年,第一册,第五篇,十页。

⑦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了内政斗争的问题。这首先表现为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与总理段祺瑞主张参战之争（所谓“府院之争”）；其次表现为国会表决参战案，公民团体威胁国会，以及总统解散国会之争；为了解散国会，黎总统召张勋入京，演成一九一七年六月宣统皇帝在张勋支持之下复辟的滑稽剧；因为复辟而引起段祺瑞保卫共和之战；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总统，段祺瑞的参战案通过了，新宪法也通过了，新国会也选举了，南北之战发动了，由于南北战争，直皖战争也发动了。

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了参战问题和中国内政中派系斗争的密切关系。

因为参战又引起了另一个外交问题——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

巴黎和会是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第一次。中国的希望是借这个会议来（一）修改十九世纪各条约所订下的外交关系，清除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权益；（二）中国以协约国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同时废除一九一五年的中日五款二十一条；（三）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①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两份秘密条约为根据：（一）一九一七年日本与英、法、俄订立的秘密条约，^②（二）一九一八年五月日本与段祺瑞政府订立的中日陆军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③这些秘密条约的内容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会上宣布，到五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和会移交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① D.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N. Y. 1947, 3; S. Wright,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 Shanghai, 1938, 438—439.

② A. W.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 Y., 1938, 1962 reissue, 206.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第七册,二二七——二三六页。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使人想起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一八九五年在北京参加考试的举人没有能阻止中国政府签订《下关条约》，但一九一九年的学生发起的运动却成功地阻止了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约》的签字。一败一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分裂。徐世昌总统对付学生运动的态度和政策是学生应该专心学业，不应该干预政治，不应该荒废读书的时间，不应该干犯国交。^①实际上处理学生运动的人并没有完全遵照徐世昌的命令。北京的军警当局(吴炳湘，李长泰)劝学生不要游行，拘捕了三十三名学生，略略审问之后就释放了；同时学生冲进了曹汝霖(交通总长)和章宗祥(驻日大使)的住宅，而且章公使挨了一顿打。学生用武力对付他们所谓的卖国贼政治领袖，在中国政治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跟北京军警当局缓和的态度很有关系。^②

五四运动是全国性的城市的爱国运动。其它城市对学生，商人，工人的行动也有反应。一般地说来，都不赞成学生干政。但是真正用军警压制学生运动的人全是皖系和拥护皖系的军阀——长沙的张敬尧，济南的马良，西安的陈树藩，上海的卢永祥，杭州的杨善德，安庆的倪嗣冲，福州的李厚基。反之，直系军人控制的省份和南方军人控制的省份则没有用这样的高压政策。^③

北京政府的原意是签订《巴黎和约》——徐世昌，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都这样主张。^④但安福系发表宣言，反对和会对山东问

① 《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一九五九年，三十七——三十八页。

②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一九五九年，四十——四十一，一六五——一七〇页。

③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一九五九年，一七一——一七三页。

④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一九五九年，三十七，二七三——二七四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第七册，三六五——三六九页。

题的决定。^①因为皖系本身分裂,才有牺牲曹汝霖,章宗祥,甚至不惜牺牲徐世昌以挽救亲日的皖系的行动,才有军警所采取的和缓态度。^②长江三督(其中包括忽左忽右的王占元)竟通电请政府服从民意,惩办国贼。^③

巴黎和会之后,太平洋上的海军竞赛,没有解决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以及苏联在东方的影响的加强,促成了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以前,直系军绅领导的中国政府请各省派代表进京,商量有关华盛顿会议的事务,^④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中国的重要决议之一是召开关税会议,讨论中国增加关税率,裁撤厘金(国内的货物税),和关税自主问题。关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了。

如果中国真能裁撤厘金,提高关税率,恢复关税自主权,换言之如果关税会议成功,一方面会增加中央的税收,一方面会严重地减少各地厘金的收入,对地方军人是一大打击。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一九二五年中国的分裂加剧了。北京只有一个临时执政府,没有正式的政府;南方有国民党的广州政府。直隶,东北,内蒙由奉系与国民军(冯玉祥的军队)分割;江苏浙江是孙传芳和奉系斗争的地方。在那样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举行关税会议,显然会引起各大小派系力量的反对。国民党,孙传芳,冯玉祥,吴佩孚都反对召开关税会议。^⑤从一九二四年底直奉第二次战争刚刚罢兵之后,江苏浙江不断有战事——先是齐燮元与皖系残余军阀卢永祥之

①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14, 1919, 691.

② A.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California, 1976, 160—161.

③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

④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⑤ S. Wright, *ibid*, 464; *The Times*, September 24, October 16 and 24, 1925; *China Yearbook*, 1926 1142—1143.

战，接着是孙传芳与奉系张宗昌之战。一年多的战事加上北京政局的变幻，结果是关税会议上十三国的代表只好打高尔夫球和骑马游山玩水。^①

参战，巴黎和会，华府会议都和中国的派系政治，派系军队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各派系的军人和外国关系在于外债，购买军火，和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执政时代，外债的主要来源是西方国家；袁世凯死后到一九二五年，外债的主要来源是日本。一九一三年的善后大借款是一九一三年内战军费主要的来源；一九一八年的西原借款是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内战军费的主要来源。从一九一七年中国参加欧战到一九二五年各国陆续退还或停止庚子赔款。这些退还的庚款是否用于一九二〇年代的大内战，我们不大清楚，但是在欧战结束之后到南京政府成立以前，由西方国家借给中国政府各派势力的钱很少，那是无可疑义的。日本在这段时期借给中国的钱，多数交给北京政府，此外也借给东北，湖北，广东，直隶的地方政府。^②

关于军火的供应，我们有的材料很少，系统的知识更少。这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据不完全的记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欧洲的小国家，都私自卖军火给中国各派军阀。^③在这段时期中主要的内战开始用飞机，各主要派系的军队都有飞机。来源是德，法，意大利等国。各主要派系也聘用了外国顾问。张作霖有日本顾问；吴佩孚有日本和英国顾问；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有苏联的顾问。

① *The Times*, December 14, 1925.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第七册，一九七页。

③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上，二十七页；O. Champm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1927*, London, 1928, 185—186;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中国的分崩离析使各国不得不跟地方派系势力交涉以照顾他们在华的权益，因此又不得不支持地方派系势力。日本和东北张作霖的关系是一个例子；张作霖的态度和行动威胁到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使田中内阁放弃张作霖也是一个例子。^①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香港广州的大罢工严重地威胁到香港和华南的经济利益，英国不得不跟广州国民党当局交涉。一九二七年初革命势力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也使英国不得不与国民政府交涉。苏联为了在东方发展它的势力，不但在北京有使馆，而且与广州国民政府，洛阳的吴佩孚，西北的冯玉祥都有非正式的外交关系。

个别的军阀对外国和外国人不一定全是“和和气气的人”（‘friendly and good fellows’）。^②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英国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的商船浪沉了两支中国的木船，淹死了五十八个中国人和损失了许多军火。守（四川）万县的杨森下令扣留了三只英国商船，引起了英国兵船炮轰万县的事件。^③ 张作霖在一九二七年发展本国在东北的铁道系统，抗议日本出兵山东，^④ 那也不能说是对日本友好的行动。吴佩孚反对列强共管中国，反对联俄容共，是他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的态度。^⑤ 大体上说来，参与国家大政的军阀尊重几十年来形成的条约系统，怕国内的争斗波及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段祺瑞下令讨曹锟和吴佩孚的通电中，表示出他的基本考虑是保护外国在华权益：“京师为国家根本

① Takehiko Yashihashi, *Conspiracy at Mukden*, Yale, 1963, 19—52.

② Meyrick Hewlett, *Fifty Years in China*, 189—190.

③ 《革命文献》，第十八册，三页，一六八——一七一页。

④ 《黄报》，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

⑤ 《吴佩孚先生集》，二七七，二九三页。

重地，使馆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集。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①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也有同样的考虑：“曩以内乱未已，波及外交，曾经退电全国撤退各路军事，表示息争意旨，谅邀鉴察。方期彼此觉悟，早靖纠纷。既释友邦之忧疑，并泯未来之赤祸。乃外交之责难方亟，而同时之操戈未休。瞬将喋血京畿，转恐祸延中外。……”^②

至于长期的外交政策，徐世昌总统和吴佩孚上将都赞成把中国当作外国原料的供给地和外国制成品的销售市场。中国需要的外国资本和技术，用以发展中国的资源，才能增加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由外国投资而得到的利益可以中外平分。^③

中国之所以弱，在于中国自身，并不是外国的剥削压迫。中国要富强以统一为前提，中国必须消除种种造成中国分崩离析的衰弱原因。象这样的自省的民族主义在学者中也颇为流行。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胡适论反帝运动，催促中国人努力于民主。“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条件。”^④他以日本为例来反驳梁漱溟的理论：

“帝国主义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⑤

① 《吴佩孚先生集》，三四五——三四六页。

② 《国闻周报》，第五卷二十二号，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

③ 徐世昌，《欧战后之中国》，一九二〇年，九十六——九十七；《吴佩孚先生集》，二九〇——二九一页。

④ 《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一二八页。

⑤ 《新月》，第三期，一页。

从历年军阀发表的关于外交的通电看来，“帝国主义”那一个名词从来没有提过，更不用说反对帝国主义，或者把中国之分裂衰弱归之于帝国主义身上。一九二五年冯玉祥在天台山休息的时候，汪精卫和吴稚晖去看他，谈起打倒帝国主义。冯玉祥不懂，他问：“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该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打倒皇帝呢？”^①

这已经是五四运动以后六年的事。那六年之中学生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把执政的军——绅政权的领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已经从自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反帝的民族主义。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三册，四十一页。

第九章

法,统(宪法与传统)

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往来于日本,美国,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梁启超,接触了宪政的实际,也学习了宪政的理论。他认为“万世不易”“君民共守”的宪典才是国家的“元气”,有了宪法才能“永绝乱萌”,避免孟子所谓的一治一乱的循环。^①立宪的必要由日本战胜了俄国而得到证明。于是在日俄战争的翌年清廷下诏立宪,来“振国势”。^②宪法被认为是医治中国百病的良药。

绝乱萌,振国势,兴元气,显然是一个问题的几方面。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靠一部根本大法,来规定国家的组成,说明主权之所在,使一切从政的人服从宪法,政治行为才不会超出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国家社会的发展犹如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有法则,有规律;政治科学犹如自然科学一样要能掌握那些规律。

但那时西方的政治科学不注意怎样使干预政治的人服从宪法的规定,也不谈怎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而来教育人民在政治行动中服从宪法。“合法”的观念是那时西方政治科学的基本假定,不合法的行动不属于政治科学讨论的范围。不合法的事由法律处理,那是不科学的事,不必在政治科学中讨论。

中国的政治传统是政治文化的传统,一切政治势力在政治生活中所采取的行动以“有道无道”作为判断的标准。当然中国政治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一——六页。

^②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三十二页。

传统中也有“合法不合法”的观念，但“国法”是“王道”的结晶。所谓的“道”主要是儒家的道，辅之以法家的法。

传统的标准——有道无道；现代的标准——合法违法。这两个标准不一定完全相同，这是中国有了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大问题。所有的法都要用道德来保护，孤立的法是极其危殆的法。加之以中国的宪法并非完整的宪法，其中没有详细规定的事，仍然而且不可避免地用“有道”“无道”来判断。那是中国有了宪法以后的第二个大问题。民国成立以后有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一九一四年的袁世凯约法，一九一七年流产了的安福宪法，一九二三年的曹锟宪法。这些宪法中不同的地方，矛盾的地方，产生新的政治上的问题，那是第三个大问题。最后，第四个大问题是政治行动的程序手续问题——这当中包括宪法的制订程序和遵守宪法的手续。如果有人对宪法有批评，有异议，用什么程序手续来修改，增订，或推翻宪法。

让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问题。一九一三年的善后大借款，必须经过临时参议院通过，而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于是那次借款合法。^①但一九一三年的国会组织法规定新选的国会执行临时参议院的职权。那次借款没有经国会追认，于是国会认为不合法。^②在讨论那次借款的过程中，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四省的都督和一些地方领袖通电反对借款，他们反对行为的法律极据又是什么哩？因为这些人是有权有势的地方官员，袁世凯总统不能根据法律否认在职人员公开批评政府的权利，而只极据事实问他们——“为什么省款不解到中央？”^③没有钱不能治国，国不治就是无道。与其

① 《政府公报》，一九一三年五月十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九四七年，第一册，五十七页。

② 《政府公报》，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

③ 《庸言》，第一期，B十二页。

无道，不如违法。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任命汪瑞闳为江西民政长，江西都督李烈钧不能接受。袁的任命合法，李的拒绝不合法。李反对袁的理论基础是袁无道，说袁是“民贼”。^①最显著的法与统的矛盾是一九一七年张勋的复辟政变，那显然不合法。但张勋的理论根据是“以纲常名教为精神宪法，以礼义廉耻收决溃之人心。”^②宪法和传统格格不入，于是制造一个“精神宪法”。退一步，从国家大政看领袖之间的私人关系。一九二二年陈炯明攻孙中山于广州的观音山，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人伦大变”；^③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兵败之后，他对日本驻天津领事吉田茂说，他对曹锟的关系是“大义名分”，是“君臣”关系。^④合法与否不是考虑之点。

这样一来，比较新的人如象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乱源在“大法不立”。^⑤比较旧的人如吴佩孚，认为“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⑥而调和派的徐世昌则认为“旧基础(统)既倒，新基础(法)未确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无一定建设目标，无共通之更新理由。”^⑦法和统之间的矛盾，新制度和旧文化之间的矛盾真是难以解决的矛盾。

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是一份单一国家的宪法。但是它又没有规定省制。避免了省制问题也许因为当时各省的政治势力太复杂，各省的情形也不稳定。在那种情形之下，省的负责当局由民选或由中央政府根据既成事实而委任？省行政当局是否有解散省议会的权力？如果用民选的办法，就必须军民分治。一方面是为了

① 《革命文献》，第四十四册，九十七页。

②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卷四，七页。

③ 吴相湘，《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册，九十七页。

④ 《吴佩孚先生集》，四〇七页。

⑤ 见一九一九年护法宣言，《孙中山选集》，第一册，四二〇页。

⑥ 《吴佩孚先生集》，一五三页。

⑦ 徐世昌，《欧战后之中国》，一一六页。

统一军政,军事负责人由中央任命;一方面是怕已经有势力的军人无端干涉选举。^①军民分治事实上办不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关于省制的教令,断然实行军民分治,实际上也没有结果。^②

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继续审议宪法(天坛宪草)的时候,争论最激烈的也是省制入宪问题。天坛宪草既然规定中华民国为“统一民主国”,省制就必须列入宪法。实际上袁世凯死后,各省离心的倾向更为明显,西南几省一直在独立的状态中,省制能否入宪比省制应否入宪更为棘手。审议员为了这个问题,由口舌之争到互相斗殴。那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八日的事。^③

此后一系列的政治风潮和内战阻挠了制宪工作。到一九二三年十月四日才由宪法会议通过了地方制度一章。那一年通过的曹锟宪法也规定中国为“统一民主国”,但关于地方的问题则规定“依宪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规定行使”。换一句话说,中国既是统一的国家又是地方自治的联邦式的国家。至于哪些是中央的事,哪些又是地方的事,一九二三年的宪法采用列举的办法。没有列举的事,如果中央与地方有争议,由最高法院来解决。这是让一个解释法律的机关来处理政治问题。

这几次宪法不能适当地处理省制问题,中央地方权力划分的问题,一方面得归之于当时地方分权,尤其是分军权与财权,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中央集权的愿望。犹疑于现实与愿望之间的不是“合法”与“违法”的观念,因为根本没有行得通的法,而是“有道”“无道”的观念,因为传统的势力仍然固执地存在着。省,无论是军治或民治的省,不能代替北京而为最

① 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二册,九十一——九十二,一二七——一二八,一八六——一八七页。

②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二〇六页。

③ 《政府公报》,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

高的合法观念的源泉；北京，在没有宪法来处理省的问题的时候，只能用“道”来统治省或者用武力来征服省。用武力的理由也还是“道”，那才是“征伐出自天子”的“义战”。所以军阀时期，发动内战，通电交驰，陈述的理由全是以“有道”伐“无道”。

一九一二年通过了临时约法以来，几份宪法里矛盾的地方，产生出的第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九一六年大总统的承继问题。黎元洪承继袁世凯的法律根据，北京政府认为是一九一四年的袁世凯约法，^①南方的议员和名人认为是一九一三年的大总统选举法，黎元洪副总统本人认为是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②如果根据一九一四年的约法，黎元洪只能代理而不能承继，而且在三天之内就得宣布组织大总统的选举。如果根据一九一三年的大总统选举法，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到一九一八年十月为止，到任满时再组织新大总统的选举。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是一九一三年大总统选举法的根据，南方和黎本人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不同意见的中心在恢复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选举的国会。恢复国会是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所最不愿意的，也是南方的议员和名人所最愿意的。^③黎元洪就任之后申令实行临时约法，重开国会，制定宪法，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为中国的立宪政治带来了一点希望。^④

一九一六年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也为中国的宪政建立了一个传统，这是“法统”一词的另一个意义。中国的宪法，有正统的，也有一九一四年制订的非正统的宪法。与其说一九一四年的约法不合于正统因为制订程序不合法，不如说袁世凯在废除临时约法制订新约法的过程中一切行动都“反其道而已”。^⑤这时孙中山所

① 《政府公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② 《政府公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③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三七四——三七六页。

④ 《政府公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三十日。

⑤ 孙文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宣言，《革命文献》，第五册，五十一页。

谓的“道”也就是传统政治文化所产生的政治道德标准——袁世凯“以天下为私”，“残暴专制”，利用“金钱诈术”……都是些“无道”的行为。

但是，因为几份宪法的不同而产生的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护法战争。一九一七年，在张勋领导之下的军人干政，强迫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拥戴溥仪复辟，引起了“复辟之战”。复辟失败之后，皖系军人的政府不再召集旧国会，决意重选新国会。同时皖系军人进行武力统一政策。这样国民党（当时叫作“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占多数的旧国会受到打击；南方军人的利益受到威胁。于是国民党与南方军人联合来对抗皖系。国民党要求尊重临时约法，成立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①支持护法的有唐继尧领导的滇军，陆荣廷领导的桂军，孙中山所能影响的粤军和杂牌军，以及湘南，四川的一些部队。护法的理论则由孙中山和国民党提供。护法的基本前提是“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②但争回大法，争回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得靠强大的海陆军。^③孙中山所依赖的军力又是不尊重宪法的军力。他们把在广州召开的旧国会赶到昆明，重庆，他们威胁议员，打毁报馆，不发国会议员的薪水。^④孙中山所依赖的实行民主立宪的议员，很少人有一定的政治原则。为了生活，很容易被人收买。^⑤所以孙中山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⑥到底是大法不立，抑或是武人争雄，孙中山好象

① 罗家伦编，《国父年谱初稿》，第二册，四二六——四五三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一册，四二〇页。

③ 孙文一九一七年演说，见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二四八页。

④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二七一——二七三页；吴铁城，《吴铁城先生回忆录》，五十二页下；陈独秀，《独秀文存》，一九二二年，第三册，七十四页。

⑤ 《华字日报》，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一页。

⑥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九二九页；《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

也不大清楚。从军人的观点来看，吴佩孚就把一切归罪于国会：“旧国会分子庞杂，固无待言。八年变乱，无一非旧国会播荡噩潮。”^①

孙中山所依赖的两种人仍然属于传统的军——绅集团，他们治国的基本原则在“以道德为体，法律为用”，“借法律以辅道德”。^② 吴佩孚也认为政治法律都“生于礼教”。他们想恢复的“法统”，不过以法来辅助儒家道德哲学的传统。^③ 道德仍然比法律重要。这样一来，不合法的內战，只要是“义战”也可以打；不合法的杀人，只要是“义杀”（诛）也可以杀。那是在军阀时代常见的事。

最后，如果宪法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国情”有矛盾的地方，用什么程序来修改，重订，或推翻？先以袁世凯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所采取的程序和手续为例。临时约法用责任内阁制，以立法机关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约法。袁世凯提议修正以增加总统的权力。^④ 达不到修正的目的，于是他打击政党，解散国会，重订宪法。他之不满意于天坛宪草，也因为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且非法地鼓励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草。^⑤ 一九一七年的解散国会和清帝复辟；一九二一年吴佩孚认为法统混乱，改弦更张，由军人来保护国民会议和国军会议，在国会之外找解决中国大问题的办法。^⑥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曹錕贿选总统，重订宪法。都是用非法的程序来修改，推翻，重订宪法。这一系列非法行动的理由都是为了合乎中国的国情，用“有道”来结束“无道”的局而。

① 古越布衣编，《讨平安福吴佩孚书牒》，一九二〇年，第一卷，十二页。

② 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牒汇编》，一九一四年，一九六六年台北版，十四页。

③ 《吴佩孚先生集》，一五一——一五三页，三八四页。

④ 曾鲲化，《中国制宪史》，一九二四年上，五十六——五十七页。

⑤ 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九三六年，六十九——九十三页。

⑥ 《吴佩孚先生集》，三五——三五三页。

法和统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护法的人要护法，卫道的人要卫道。护法和卫道都靠军——绅集团的人，这几乎等于派罪犯当警察。制订宪法不但不能如梁启超在一九〇二年所企望的那样结束一治一乱的循环，反而造成不断的混乱。于是中国关心政治的人从二十世纪初年那种向往法治的态度，变为怀疑法治，轻视法治。陈独秀的一段随感录说得最透彻：

“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底（的）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①

① 陈独秀，《独秀文存》，第三册，八十五页。

第十章

财政与军费

中国军队确实的数字，正如中国军费的确实数字一样，谁也不知道。中央和各省正规部队的番号有，但每个单位有多少人很难说。此外还有非正规部队，如民兵，团防，土匪。这些都是武装的人民，需要给养，装备。军费一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负担，一部分由各军各单位就地筹集。一有战事还要征发，兵差，抢劫。实际的军费支出究竟多大，谁也不清楚。既不能估计实际的军费支出，只好看中央和各省的军费预算。如果我们假定草拟预算的人，不单凭想象在那里“闭门造车”，那么预算数字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各级政府负责维持军队的需要多少经常费，以及各级政府支付那些费用的能力。当然预算中所规定的数目不一定全部支付，甚至中央直属的劲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年年都要追索欠饷。^①此外如卢永祥，冯玉祥的中央部队也免不了欠发军饷的厄运。^②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个月中央欠发的军饷就有一千万元；冯玉祥领饷只能领到百分之四十。^③此外还有中饱，贪污，使预算数字也失去了准确的意义。

不精确的数字也许可以指出一些相当可靠的发展趋势。（一）

① 《徐树铮电稿》，一八八页；《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第二册，一六三页，*China Yearbook*, 1923, 712.

② 《华字日报》，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冯玉祥，《我的生活》，第三册，四一三页。

③ 《华字日报》，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年中国军队的人数增加，武装的人民的总数增加得更大也更快。因此(二)军费也随之而增加。但是军费的增加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趋势。第一，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时期中地方的军权财权不断增涨，中央所能掌握的军事和财政资源不断减退。中央实际负担的军费不但没有增加的趋势，反而在袁世凯死后，中央的军费预算逐渐减少。只有在段祺瑞执政时期(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和张作霖执政时期(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外债收入的增加，中央的军费预算才增加了。第二，中央既然因为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它负担的军费，增加的军队只能从地方的经济资源取得所需的费用，于是这个时期各省的军事预算增加得很快。这两点我们可以从本章的表一，表二看出来。第三，如果我们从省一级的政府往下推到县一级的政府，可以看出县一级政府负担的军费增加得比省一级更快。这就是说，如果要对这时期中中国军费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概念，我们得看县和乡的情形。我们本章的表三，四，五可以代表一般的趋势，局部说明人民负担军费之沉重。第四，绝大部分的军费固然由农民负担，其它的生产事业也不能避免军人的索勒。工，商，金融业都得负担，尤其在需款很急的时候，他们的负担特别沉重。

让我们从农业和其它生产事业，从最下层来分析军费的来源以及军费征收引起的影响。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冯玉祥问吴佩孚，关于直系军队的粮饷问题。吴佩孚说：“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他又说：“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因为官“花了五个(钱)可以报十个。”^①这一段话不但表示军绅两个集团的联合，也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三册，四九九页。

表示他们联合一致从人民身上榨取军费。吴佩孚提到的兵站就是“随地筹办”的机关。筹办军队的粮食，驻扎地，运输。筹办的手续是先“查封”，那就是一个师或一个团的名义，把所需要的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上面印好“某某师查封”字样，派几个卫兵把守，不准别人动用。^①然后兵站的负责人和这些财货的所有人交涉。如果所有人是大官僚，大军阀，豪绅，他们可以利用在当地的权势，通过当地政府，从别的地方筹集军队所要求的东西。^②如果所有人是大商人——银行，钱庄，矿厂，轮船公司——他们可以出一笔钱，请军队到别的地方去买或者征发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层层转嫁，只剩下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担负军费，兵差。除了实物之外，兵站也负责“拉夫”，拉来的夫替军队运辎重，修战壕，或其它杂务。^③这是军阀筹集军费的一个简便的方法。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全国一千九百四十一县中，八百二十三县负担兵差。^④比较轻的地方，如象山东，兵差的数目超过地丁税正税两倍多。^⑤比较重的地方，如山西北部，竟高出正税二百二十五倍！^⑥实际上兵差多半是实物和劳力，没有记录也很难精确地估计。一般地说来，乡下的兵差远比城市里重得多。^⑦

如果一个地方的官，绅，商拒绝付兵差，军人对付的办法是

-
- ① 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一九三一年，三十三——四页；〈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The Times*, January 8, 1920. 同时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形。
- ② 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一九三一年，二十一——三十五页。
- ③ 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一九三一年，三十三——四页；*The Times*, September 6, 1924；〈时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 ④ 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一九三一年，九页。
- ⑤ 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一九三一年，十四页。
- ⑥ 王效文等，〈中国土地问题〉，一九三七年，一五九——六〇页。这个数字也许太高。
- ⑦ 〈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二十四期，五十页。

威胁——“饥兵闹事”，^①或者干脆让部下“自由行动三天”。^②

为了对付军人的威胁，地方绅商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在乡下有团防，防军人，土匪，农民叛变；在城里有商团，例如上海，广州的商团。以四川为例，全省的五十万团丁由豪绅把持。^③但因为装备训练都不成，不能防兵，也不能防匪，^④变成了帮助军队镇压农民的工具。四川的南溪县，一九二五年一年之内换了六次占领军，地丁税从正税七千元增加到三十二万三千五百元。县政府和团防局都变成了代军队收税和办兵差的机关。^⑤收税时他们又作弊，把中饱的钱用来放高利贷。^⑥

农民自己也办民团，有秘密会社（甚至土匪）的支持。但他们一般的财力，装备，组织，训练更差，不能抵抗军绅联合的政权。^⑦

兵差与其它军费来源如果不同，并不是因为兵差没有制度化，不是法定的收入，或者只是临时性的。兵差有一定的组织负责，有一定的征收方式，又因为内战频繁，并不是临时性的，而是一而再的。至于合法与否，那得问根据的是什么法，什么人订的法，在法律根据上与其它军费来源有何不同？从这方而看来，“制度化”，“合法化”，“临时性”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观念。军队筹集军费以某一个或某一个集团军队为单位，以那一个军队或集团军队能控制的地区为对象，以军队的需要为最中心的考虑。各级地

① 《东方杂志》，第四十二卷三期，八十九——九十页。

② 《辛亥革命》，第七册，十一页；谢省云，《陈炯明叛国史》，一九二二年，八十一页，*The Times*, June 14, 1928.

③ 周开庆编，《四川文献》，第五卷一三三号，三——十页。

④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一册，八二七，一一二八页。

⑤ 《四川善后会议录》，上，三十一上——三十二上页。

⑥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四五三页。

⑦ 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一九三一年，二十——三十五页；《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十六期，三十八——九页。

方政府不一定完全听从军队的命令，但大体上说来是为军队筹集军费的机关。所谓的法就是军队的命令。由军队领袖下命令，通过地方政府机关，筹集的其它的收入，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一)田赋——我们的表三，四，五说明了增加田赋来支付军费的两个形态。一个是预征，另一个是附加税。这两种形式在全国普遍地采用。有的地方预征比较多，最多的地方是四川；有的地方附加税比较多，例如江苏的附加税达田赋正税的二十五倍。^①

(二)其它附加税与杂税——附加税的一部分由地方政府用作行政经费，于是从田赋的附加扩展到其它税的附加。屠宰税，印花税等等都有附加，从正税的一倍增加到正税的两倍三倍。^②厘金也照附加税的办法增加，如一百元的杂货由成都运到重庆，有五十多个收厘金杂税的关卡，收一百多元的捐税。^③我们的表六说明一种重要的出口货，在短短一段航运途中所付的种种杂税。四川全省的厘金在军阀时期较清末增加了二十多倍。^④

(三)鸦片——种鸦片的收入比种粮食大得多，军人所能收的税也因此而大得多。^⑤例如四川产鸦片最主要的地区，涪陵，几乎所有的农家都种鸦片。在一九三〇年前，每两平均售价在0.60元到0.80元之间。^⑥以一九三〇年每两值0.80元，每四石田种鸦片的总成本为56.89元，总收入为163.12元，净利为106.23元。^⑦

① 《汗血丛书》，《田赋问题研究》，一九三六年，第一册，一七七——八页。

② 《四川月报》，第四卷二期，十，二十页。

③ 陈兆庆，《中国农村教育概论》，一九三七年，五十九页。

④ 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一五三页。

⑤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二册，四八五页；《银行周报》，第十九卷十期，七——八页。

⑥ 《东方杂志》，第五十二卷十四期，一〇六——一〇七页；陈延炯，《涪陵经济调查》，一九三六年，四十九页。

⑦ 《东方杂志》，第五十二卷十四期，一一六页。

因此军队和政府可以从涪陵一县收得一千三百万元的鸦片税。^①涪陵属于二十一军的防区，鸦片税又是二十一军最主要的收入，超出田赋五倍，超出盐税两倍。^②

(四)截留税款——这是从民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央和省的财政收入大减的关键所在。最初截留的是除了关税以外的一切属于中央或省政府的税收。一九一三年善后借款成立之后，盐税由外国人管，中央的盐税收入于是有了显著的增加。但一九二〇年以后，连外国人管的关税盐税也被军人截留。以一九二三年为例，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外应收的关税为六百七十万元，中央实收七十万；盐税的收入应为九千万，截留之后剩下五千万，扣去征收成本中央的收入不过三千多万；烟酒税应收一千五百万，截留之后实收一百四十万；印花税应收三百二十万，中央实收三十万。名义上中央应收二亿一千万元，实收不过一亿五千万。扣去内外债还本付息及军事补助费等，中央实收只七百万元作行政费。^③正式有防区的省份如湖北，湖南，四川等，防区的最高军事当局截留中央和省政府的税收。^④没有防区的省份，地方军人截留税款。^⑤掌握铁路交通的军人如吴佩孚，冯玉祥，则截留铁路的收入。^⑥

(五)货币——发行通货来征收民间购买力充军政费是一个很简捷的办法。中国在清代货币的发行权就不统一，民国成立以后更分散，更混乱。例如四川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之间有本

① 《中国农村》，第一卷六期，八十四——八十六页。

② 《申报月刊》，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五十二页。

③ *China Yearbook*, 1924, 738—9.

④ 《中行月刊》，第四卷五期；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三三〇——三三一页。

⑤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一册，六十一——六十二页。

⑥ 《华字日报》，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二日；《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第二册，一六三页。

省银行，钱庄，甚至商店，军队发行的货币几百种。混乱的情形可从表七略略地看出来，但实际的混乱更为严重。^①四川所用的主要是硬币贬值，张作霖在东北用的是发行纸币——奉票。但是清代不用纸币的传统在一九三五年前还有相当的势力，人民有拒用纸币的习惯。于是一般的方法还是硬币贬值——减低银，铜币的成色或内在价值，或者增加它们的面值，例如发行当十，当一百，当二百文的铜币。在这样的过程中，恶货币把良货币驱逐出流通范围之外，这也是从表七中可以看出的趋势。至于军阀时期各地区发行了多少纸币和贬值的硬币，恐怕无法统计。

(六)公债——地方的军——绅政权垄断了地方的税源，截留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款，中央和省府只能依赖公债，但依赖的程度不同。内债的主要用途是作为中央各银行的货币发行准备金；发行纸币来支付军政费。此外中央政府只得靠外债度日。

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年北京政府发行的国内公债大概在六亿元左右。^②民间购买的人很少，专靠银行包销。^③包销时折扣很大，有时一百元的债券只值二十或三十元。^④从银行的观点看来，投资于公债，有关税收入的余款(关余)，盐税收入的余款(盐余)，铁路，公产等作为担保，利润富于任何其它种的放款。于是公债投机变成了各银行主要的业务。一九一七年以来成立的一百四十一家银行，其中三十七家在北京，多半是公债投机银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F— 一四页。

② 李文治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二册，五八六——五八七页；千家驹，《历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一一二页；朱契，《中国财政问题》，第一册，一四九——一五一页。

③ 王纯根编，《百弊丛书》，一九一九年，第一集，第一册，十八页；湖北大学，《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一九五八年序，二〇〇页。

④ 马寅初，《演讲集》，第一册，一八二，《银行月刊》，第三卷二期。

行。^①一九二八年以前，公债还不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但这并不是说省政府或县政府没有发行过公债。例如一九二七年湖北发行了七百四十万元的公债，福建五百万元。^②连偏僻的江西宁冈县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〇年也发行过两万多元公债。^③省公债的发行主要是一九二八年以后的事。发行的办法由财政厅召集绅商开会，政府说明要多少钱，绅商提出只能借多少，双方议定一个数目，规定利息，担保条件，由什么机关或哪些私人分购。财政厅的背后是军人，发公债多少有些强迫借款性质。^④

一九二五年底北京政府欠的外债，据财政部交通部的报告，是二十二亿元。据 A.G.Coons 的估计是十九亿四千七百万美元。^⑤其中以日本的无确实担保的借款最多，英国次之，美国又次之。^⑥外债主要用于军政费，占百分之六十；铁路用费，占百分之三十五；其余用于工业。^⑦如果一九二二年的 *China Yearbook* 的报告是可靠的话，北京政府每月需要九百二十万元，而收入只有二十三万一千元。换言之，一九二二年北京政府得借一亿零八百万元才能维持它的生命。而中国在一九一二——一九二五年十年之间所举的外债——Coons 的总额中减去三亿八千万美元庚子赔款——，名义上供给北京政府十六亿元左右。除了折扣手续费之外，也许正

①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一一六页。

② 〈银行周报〉，第五卷十八期，I二十一——二十二页。

③ 〈宁冈县志〉，卷四，二十四——二十六页。

④ 陈翰笙，〈东方杂志〉，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十四页；李文治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二册，五八六页。

⑤ *China Yearbook*, 1929—1930, 657—660; 刘秉麟，〈中国近代外债史稿〉，一九六二年，一九五——一九六页。

⑥ 刘秉麟，〈中国近代外债史稿〉，一九六二年，二二九——二三〇页；马寅初，〈演讲集〉，第一册，一八八页。

⑦ C. M.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Harvard, 1965, 29.

是以弥补收支的差额。没有外债，北京政府的生命很成问题。

中央政府靠外债内债，地方政府则由军——绅政权向人民取得各种收入。这个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是由帝国主义和军——绅政权结合起来维持住的一个机构。从这一个角度看来，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无论对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定义如何，方向是正确的。

附表一：中央及各省军费预算

年份	中 央		各 省⑤
	中央军费预算	占总预 算%④	
1913	120,000,000元	26.9	
1914	124,000,000元	39.9	
1915	156,000,000元	33.8	
1916			
1917			
1918	83,728,134元	42.8	76,534,924
1918	137,529,658元		
1919	112,985,534元		
1920	107,733,172元		
1921	97,984,769元		
1922	72,891,786元	46.9	181,847,427
1923	48,437,411元		
1924	29,373,821元		
1925	59,404,905元		
1926	131,176,340元 ③		
1927			

资料来源：① 邹鲁，《文存》，I，22。

②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I，92。贾之数字一般过低，例如上海和平谈判北方代表团估计1919年中央军费为180,000,000元，中央政府可以支出军费120,000,000元(*China Yearbook*, 1923, 582; 贾士毅，同书，I，160)，但中央政府收入减少，对直接负责的各师旅也常常欠饷，军费多由中央所属各单位自行筹集，从那样的角度来看，贾的数字也许比较近于实际。其它的估计，如陈翰笙，《东方杂志》，1928.10.10, 9—10，不分中央地方，而且过高。

③ *China Yearbook*, 1929—1930, 647。

④ 《经济年鉴》，1934, D193—194。

⑤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I，140—142, 148—150。

附表二：四川省军费

1913	7,043,832 元	1	1920		
1914	5,293,021 ¹ 元	1	1921		
1915	6,024,078 ¹ 元	1	1922		
1916			1923	21,000,000 ³ 元	
1917			1924		
1918	6,146,104 ⁴ 元	2	1925	26,514,918 ² 元	4
1919	5,805,518 ⁴ 元	2	1926	38,803,853 ¹ 元	1

资料来源：1.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10—16，省预算数字。

2.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13，北京财政整理委员会数字，〈四川善后会议录〉（上，46—5a）的数字为27,478,604元。

3. 只包括常费，吴晋航。

4.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I，160—162，朱启铃在南北和平会议上提供数字（1918）；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I，140—142，1919数字。

附表三：四川新都县的田赋预征

1920/12	征收	1922	1925/5	征收	1932
1921/10		1923	1925/7		1933
1922/6		1924	1925/10		1934
1923/3		1925	1925/11		1935
1923/6		1926	1926/3		1936
1923/12		1927	1926/6		1937
1924/2		1928	1926/9		1938
(1926田赋，大火灾免)			1926/12		1939
1925/2		1930	1927/5		1940
1925/4		1931	1927/12		1941

资料来源：〈新都县志〉，〈四川文献〉，V128号，14。

附表四：四川田赋预征的次数

1912—1924	每年一征
1925—1931	每年三征
1932—1934	每年六征

西华近代文献征集处：《四川农村崩溃实录》，
《四川农村赋税负担之概况》，1935/5/26，2—3。

附表五：一九三四年四川各军防区田赋预征

军 区	预 征 至	每年征收次数
28军	2008年	14
29军	2000	12
23师	1994	3
新 6 师	1992	10
20军	1984	6
黔军教导师	1967	3
24军	2009	2
21军	1956	4

资料来源：《四川月报》，28—29号。
《中报月刊》，IV卷，6号。

附表六：四川剑阁县田赋附加税

正税	1915	3,922.26元
解费		392.226元
捐输	1915	3,520.00元
解费		352.00元
共计		8,186.49元

附加税	年份	每元正税附加	文	元
	1910	2,062	文	2.06元
	1912	2,938		2.45
	1913-4	3,313		2.55
	1915	3,750		2.34
	1916	4,900		2.88
	1917	5,250		2.92
	1918	5,500		2.75
	1919	7,500		3.75
	1920	8,125		3.69
	1921	11,250		4.89
	1923	14,375		5.52
	1924	25,000		7.35
	1926	27,500		4.91

资料来源：《剑阁续志》，卷6，1A—2A。（两改元）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40—41，大洋合铜币表。

附表七：四川剑阁县临时军费

(始于1918)			
1920/5	3,000元	1923	13,000元
	1,000		36,000
1920/7	10,000		130,000
	10,000		16,667
	10,000	1924	179,100
1921	28,000		21,371
	67,000	1925	89,400
1922	159,500		32,000
	4,762	1926	81,000

资料来源：《剑阁县志》，卷6，4B—5A。

附表八：每百斤桐油从重庆一万县运至汉口的捐税

关税	0.30海关两	附加学捐	0.04元
二五附税	0.15海关两	附加市政捐	0.06元
省税	0.15海关两	以件计统捐印花税	0.04元
统捐	0.20元	以件计乐捐印花税	0.02元
马路附加	0.04元	以件计护商印花税	0.06元
商埠附加	0.08元	重庆夔州护商(以件计)	0.02元
乐捐(以件计)	0.22元	以担计手续费	0.10海关两
市政捐	0.11元		
护商费(以件计)	0.30元	共计 海关两	1.5两
重庆万县马路费	0.12元	厘金	1.3124元
附加女学捐	0.0024元		

资料来源：李昌隆，《桐油》，44—45。

附表九：四川人民所用的货币(%)

年份	纸币	制钱	银币	银锭	当10文 铜元	当20文 铜元	当50文 铜元	当100文 铜元	当200文 铜元	当500文 铜元
1922	0	40	30	5	10	3	2	6	4	0
1923	0	35	35	3	6	2	3	10	6	0
1924	2	20	33	1	3	2	2	17	20	0
1925	8	5	30	0	1	0	1	20	35	0
1926	15	0	34	0	0	0	1	7	42	1

资料来源：黄主一，《川北农民现况之一斑》，《东方杂志》，24卷，16号，35—36。

第十一章

社会结构的变迁

前一章里我们分析了由军费的增加而增加了捐税负担。现在我们看看由于捐税增加而引起的生产事业的变迁以及社会变迁。我们的分析仍然以山麓地带为主，尤其注意四川的情形。山麓地带与平原地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大体上主要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因为人口增加和捐税沉重，地主和农民的负担都增加。一般的情形是地主交正税（传统的地丁税），附加税和杂税则由地主与农民分担（主六佃四，或对半分）。^①从地主的立场看来，维持或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是他们的经济原则；从农民的立场看，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不致于冻饿是他们的经济原则。在这两个原则之间，政府和地主（军绅的结合）跟农民展开了农业生产剩余分配的斗争。地主所用以转嫁负担的方法是加租，加息，和扩大他们每一个人占有土地的面积。在其它生产事业比较发达的区域，地主可以投资于工商业来增加收入，达到支付税收同时提高生活水准的目的；在其它生产事业不很发达的山麓地区，加租，加息，扩大田场面积是不可避免的方法。于是一般的提高地租，利息，和土地集中三个趋势在山麓地区比较更为严重。

四川加租采用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加押租。押租是在订租约

① 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一九三七年，一七二页。

时先由佃户交一笔保险金。如果佃户欠租就从押租内扣除，扣完之后还欠得有租金，那就退租退佃，或者引起诉讼。四川是押租额最高的省份之一，^①川北的押租尤其沉重。另一种形式是增加地租率。一般说来四川的地租率高于全国的平均，山区的租率尤其高。（见表一A，B）川北的地租在丰年可能高到土地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②而且为了避免农作物价格的升降或灾荒等的影响，地主一般收钱租。^③川东川北森林地的租金可以用桐油林地为例。主佃分配产值大概是六四分或七三分。^④

根据一九三四年中国实业部的调查，农民借款一般的利率在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之间，占全部债务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五。^⑤巴克（J.L.Buck）教授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的数字也与此相同。^⑥四川的山麓地带一方面缺乏资本，另一方面缺乏新式金融机构与旧式金融机构的竞争，利率比全国平均高一些。^⑦有土地的人以押租作为高利贷资本，团阀和军阀以公费作高利贷资本。这些军人，地主，商人，富农所收的利息高到每个月百分之六十。涪陵县有“金斗翻”——借一元，十一天还清，每天还一角。^⑧

各级农民的收入列在本章表二B。在一九二七年，据《东方杂志》的估计^⑨上等农民需七十五元的最低生活费，中等五十五元，

⑦ 应廉耕，《四川租佃制度》，一九四一年，十五页；国民政府主计处，《租佃制度》，八十八页。

⑧ 《东方杂志》，卷二十四，十六期，三十七页；《经济年鉴》，一九三四年，卷七，二二九页。

⑨ 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M五页。

⑩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桐油》，一九四一年，二〇二页。

⑪ 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一九三六年，一七二——一七三页。

⑫ J.L.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Shanghai, 1930, 159.

⑬ 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M二十三——二十四页。

⑭ 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一九三七年，一七三页。

⑮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十六期，三十六页。

下等三十五元。如果以每家六口人计算，最低的生活费要二百一十元；以五口计算，要一百七十五元。这与 Buck 的估计六口之家需二百二十八元和 Mallory 的估计五口之家要一百五十元大致相合。^①以此为标准，那么所有的半自耕农与佃农都免不了要欠债，甚至小地主和小自耕农也有负债的危险。

农民借钱为了交租；交税，为了维持家人在“青黄不接”时期的生活费用，为了支付婚丧费用。^②全国农户一半以上都欠债。^③据中国银行和四川银行的调查，耕三十亩田以下的四川农户百分之六十二欠债，三十亩以上百分之二十五欠债。^④在川东涪陵竟有百分之八十三的农户欠债。^⑤

由欠债到抵押衣物，家具，房舍，耕牛，田地，到出卖田地，从小地主或自耕农交为佃户。这是一般土地集中于大地主之手的趋势，在山麓地带这种趋势也更为显著（参看表二A，C，D，E）。农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一方面是自耕农降为佃农，造成阶级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地主（军阀，团阀，新的豪绅）代替了旧的文人地主。^⑥新的有枪，有权，有势的地主把公田，庙田，祠田也占为私田。而且他们能把大部分的捐税转嫁到农民身上，更加重农民的负担，促进阶级结构的两极分化。^⑦这两个趋势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两个趋势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军阀时期农村社会的变迁。除了人口增加和天灾两个原因之外，主要的促成社会变

① J.L.Buck, *ibid.*, 386—7; W.H.Mallory, *China, Land of Famine*, N. Y., 1926, 9—10.

②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一九三六年,二〇〇页。

③ 千家驹引用实业部数字,《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一九三六年,一六五——六页。

④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一九三六年,四五四页。

⑤ 中国经济研究会,《经济研究》,第一卷七期,三十九页。

⑥ 张肖梅,《四川农村经济》,十一页。

⑦ 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一九三七年,二〇四页。

迁的是财政制度的改变，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民的贫穷化。换言之，是高税率，高地租，高利息，内战的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

农民的收入，除了耕种粮食之外，还有一些副业。在山麓地带自足自给的程度比较低，需要进行交换，副业就更为重要。再以四川的山地为例。主要的副业收入有川北的丝，川东的桐油，山地的药材，猪鬃，茶叶。在军阀时代受军阀的苛税而衰败的四川农村副业有川北的丝业和山地的药材业。由于军阀鼓励而发展的有川东的鸦片烟业。

桐油和猪鬃是两种国际商品，因为外国需求增加而大为发展。桐油在一九二二——一九三五年之间，平均每年出口四十万担，价值一千万元以上。^①黑白猪鬃的出口从一九三一年的三百七十万元增至一九三三年六百一十七万元。^②这些国际性的商品自然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例如川北的丝，只是西充南充两地就有二十多万人靠此为生。一方而受内战与捐税的打击；一方而受日本丝的竞争。^③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川丝出口增加。在欧洲战争时川丝的出口也增加。但世界经济萧条却又大大地打击了川丝。^④川茶，川药也因为苛税，日本的竞争，与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而失去了他们的市场而衰落。^⑤

山地的农民固然从事于经济作物的生产，但是他们的生产和消费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主要的经济考虑仍然是家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这还是“生存的农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而

① 《中行月刊》，一九三六年五月号，二十四——六页；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一九三六年，二九六页。

② 重庆中国银行编，《四川省之山货》，一九三五年，下，九十七页。

③ 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R二十五，三十页。

④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一九三六年，二九——五页。

⑤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一九三六年，三二〇页；重庆中国银行编，《四川省之药材》，一九三四年，四页；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T九十二——一三页。

不是商业性的农业。以家人生活安全为第一考虑,则不敢冒大险,不敢放手地采用新的技术。如果政府,军人,绅士用种种方法想多分一些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山地农民抵抗的理论根据还是生活的安全。这种看法好象初期工人要求最低工资时所提出的“工资铁律”(the iron law of wages),可以叫作“租税的铁律”。违背这个铁律来收租税,农民就认为是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不合乎天命王道的行为。这是 Yale 大学 James Scott 教授所谓的“道德经济观”(moral economy)。不道德的经济压榨,引起农民的忿怒。这种忿怒如果跟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城市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农村的反抗运动,农民的革命。

住在山地的农民有土著,有外来的流民。鄂西,湘西是苗,汉杂处的地方;陕南是回,汉杂处的地方;湘南,赣南,闽西北有畲族,客家人。他们各有各的文化传统,和平原的农民很不相同。首先,他们得上山砍柴,打猎,采药,采桐等等。这种人多半健步如飞,劲勇,好斗。甚至妇女也因为没有棉,丝等纺织纤维把她们困在家里,只好出门去种山,打柴。她们与异性接触的机会比平原农家妇女多,而且许多不缠足。外来的人多半是难民,例如避太平天国之乱的人,逃荒的人,穷苦无处谋生的人,或者是犯了法的人。这两种人——土著和流民——都不是受过高深的教育的人,都不是受了儒家传统熏陶的人。从那里各县的县志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山地人的性格。

以湘西南为例。苗人的传说是在太古洪荒的时候,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的人,剩下兄妹两人——伏羲和女娲——他们为传继人种而结了婚,这是人类的起源。^①这不但使人记起 Noah “方

^① 《民间文学》,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四十九——五十一页。

舟”(Ark)的故事，也使人想起日本的伊弉诺，伊弉册的神话。这样“乱伦”的传统，不知怎样没有被道学先生完全禁止。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共工以头触不周之山，这些都是洪水以前苗民的神话传说。^①这真是惊天动地的传统。人的力量，感情的力量，一直表现在苗民的文化里。例如“孟姜女哭长城”那个中国到处都有的传说，在广东是一个孝女，在苏州变成了神仙，不是儒家化了就是道家化了。^②但是在湘西，她既非孝女也非神仙，只是一个热爱丈夫的妇女，她“踢一脚来哭一声，万里长城齐齐崩。”^③湘西人民的感情没有向士大夫的礼教低头。

湘西南一直有苗民反抗汉族统治的传统。在太平天国时代，他们配合太平军反抗清廷。迁居到湖北，湖南，四川山地的汉人也不是懂礼法的彬彬君子，他们有他们的天地会，哥老会的传统。这些身体健壮的人有的是反抗的精神。

在男女关系方面，山地的人，无论苗族汉族，比平原上的人一般地自由得多。他们唱歌跳舞，那是平原上的汉人不干的事。平原上的汉人笑山地人“猥亵”，“淫乱”，“鄙俗”。^④甚至于收集民间歌谣的道学先生们故意不选收那些“海淫”的歌曲。但是山地农民有的是充沛的感情，多少世纪以来没有被儒家的官吏，教谕，乡绅完全压制下去。

这些农民跟平原农民一样，在军阀时期受了军——绅政权的剥削，他们的生活愈加痛苦，他们的安全感日渐丧失。甚至在灾

① 马少乔，《清代苗民起义》，一九五六年，三——四页；《中山大学民俗丛书》，第十一册，五十六页。

② 《中山大学民俗丛书》，第三十册，三页，一二——二三页。

③ 《中山大学民俗丛书》，八十一、一三四页。

④ 杨家骆，《笑话集》，四九一页；《中山大学民俗丛书》，第五册，六十四页；胡怀聚编，《民歌》，五十一页。

荒之年保障他们的常平仓，义仓内的积粮也给军人拿走了。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以后，大量的左翼知识分子从城里逃到这些山区。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方志敏等人带给他们理想和组织两个武器。这两个武器和山地农民的忿怒结合起来，变成了一支毁灭军——绅政权的力量。

现在我们转过去看看城市里的变迁。关于这方面的书比较多，用不着我详细地分析。军阀时期城市里反对军——绅政权和帝国主义的三个重要势力是工人，青年，妇女。从日清战争解放了中国新式工业，使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工业之外，还有私营的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更刺激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新式的产业工人(工厂，矿山，运输工人)的人数从一八九四年的十万左右，增加到一九二〇年的三百万左右。^①工人反对军——绅政权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之后的大罢工为最高潮。青年和妇女的斗争，一方面表现在示威请愿的行动，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示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女学生请愿；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兴的文化运动，和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组织，社会行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争斗。从“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白话文的争论，演变为国粹与反国粹的争论，玄学与科学的争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争论。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都与中国反传统，反礼教，反对军——绅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批评攻击传统的思潮，对象是束缚中国妇女和青年的礼教，以及由礼教面巩面的传统家庭制度，教育制度。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文化运动的背景中，共产党才在一九

① 《一九二七年六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估计》，见J.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1968, 44.

二一年成立，国民党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改组。由这两个新式的政党领导，才有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的革命运动。这虽是从城市里发动的革命运动，但对中国的农村有长远的影响。军——绅政权对这些运动和这些运动中产生的组织，一直抱敌视的态度，采武力镇压的手段。他们对“五·四”，“五·卅”，“三·一八”示威用的是武力镇压的方法；他们对共产党所用的也是武力镇压的方法。

城市里反对军——绅政权的人有的从事自由职业（大学教授，报纸编辑，文学家等等），批评军——绅政权，主张改革，但不参加政府也不参加政治行动，怕的是张謇所谓的从“矍然”到“秽浊”。有的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自由职业，多半在小县城或乡下教书，渴望改革，参加政治行动，身受武力的摧残。在思想上他们吸收了民族主义所以反对不合于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他们吸收了反帝的民族主义所以反对军——绅政权与帝国主义；他们也吸收了社会主义所以反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从文化的疏外(alienation)，到政治的疏外，以致到政治的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有系统的，有组织的镇压，也了解了应该用有系统，有组织的反抗。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些受传统教育，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或士大夫的候补，变成了洁身自好的学者，或者变成拿薪水吃饭，同时努力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不再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这是城市里跟工人阶级的成长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中国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变成另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的死敌。

到这些在城市虽求改革的人在城市里也找不到容身之地的時候，他们只好往乡下往山地跑。在山地上他们的积郁和农民的仇恨汇成一股洪流，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附表一A：一九三〇年代四川地租

土地	分租率(%)			谷租率(%)			钱租率(%)		
	上田	中田	下田	上田	中田	下田	上田	中田	下田
水田	65	58.2	55.2	66.7	64.9	63.5	20.3	19.7	18.9
(全国平均)	51.5	48	44.7	46.3	46.2	45.8	10.3	11.3	12.6)
旱田	50	48	46	55.6	51.4	46.3	9	8.6	7.6
(全国平均)	47.8	45.3	43.6	45.3	44.6	41.4	10.5	10.9	12)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1939，M6。

附表一B：涪陵地租

租价类别	上等地(亩)	中等地	下等地
水田地价(1938)	100元	80元	50元
平常每亩正产额	9元	7元	5元
每亩租额	8斗	6斗	5斗
每亩押租	8元	6元	3元
田主分租率	60%	50%	50%
山地价(1938)	40元	30元	25元
每亩租钱	4元	3元	2元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I，7号，35。

涪陵 水田 275,065 亩 旱田 733,508 亩 山地 101,850 亩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1939，A8。

附表二A：四川山麓地带地主

地 区	地 主	地主总 户数%	占田数%
川北区	新地主(豪劣, 团阀, 高利 贷地主)	73	87
	旧小地主	26	3
川东区	新地主(军阀占多数)	46	88
	旧地主	51.2	10
川南区	新地主(豪劣)	42.6	86.8
	旧小地主 存在于边远区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A.24。

附表二B：四川农村收入(1931—35每年净收入)

成 份	100亩以上	50亩以上	50亩以下
地主	1,068元	573元	304元
自耕农	496元	242元	103元
半自耕农	189元	103元	32元
佃农	120元	24元	-7元

资料来源：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229—235；应廉耕，〈四川租佃制度〉，25。

附表二C：四川北部农民分配

年 份	地主%	自耕农%	佃农%	雇农%
1912	20	15	29	36
1913	21	14	30	35
1914	22	16	29	33
1915	21	15	30	34
1916	23	18	28	31
1917	24	19	26	31
1918	26	15	28	31
1919	23	18	27	32
1920	17	22	26	33
1921	23	20	25	32
1922	20	24	26	30
1923	22	17	28	33
1924	22	18	30	30
1925	25	15	33	27
1926	28	12	35	25

资料来源：《东方杂志》，卷 24，16 期，34。

附表二D：四川全省农民分配

年 份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1912	30	19	51
1930	22	21	57
1931	25	19	56
1932	23	19	58
1933	22	19	59
1934	20	22	58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国租佃制度》，6—8。

附表二E：一九三四年山麓地区农民分配

省 别	佃农%	自耕农%	半自耕农%
陕西南部六县平均	29.75	37.97	32.28
(全省平均)	20	58	22
湖南西部南部六县平均	42.28	23.15	34.4
(全省平均)	46	24	30
湖北西部两县平均	56.5	19.5	24
(全省平均)	39	33	28
福建西北五县平均	53.68	19.66	26.66
(全省平均)	43	25	32

资料来源：《经济年鉴》，I, G, 3—4, 15—16, 18—19, 21—22。

第十二章

文化的趋势：守旧与现代化

分析军阀史的人常常忽略军阀所代表的文化，认为军阀是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没有值得一谈的文化。诚然，军阀之中有好些连字也不认得几个的人，可是外号“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还印行了一版《十三经》，^①粗知文墨的江苏督军孙传芳也提倡投壶古礼。^②忽略军阀文化等于否认军阀有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等于忽略他们之中也有些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等于忽视他们的幕府内有教育程度很高的幕僚——如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吴佩孚的秘书张其铨。忽略了这些也就是忽略了军——绅政权的理论基础。

说军阀有思想和判断能力，并不等于说他们的思想宏伟精深，判断正确一致。他们的思想并不新颖，判断常常前后矛盾。他们的思想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军权政权，对政治，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很不利的影响。

从袁世凯就任总统到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这十几年中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文化的传统。他们表现的第一个特点是几乎全都尊孔。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下令尊孔，一九二七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祀孔。^③在这两个年代之间，

① 《鲁迅全集》，一九五八年，第六册，二五二页。

② 《时报》，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③ 《政府公报》，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时报》，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

许多军阀公开宣言要以孔教为国教，在他们统治下的各省下令读儒家的经典，特别办学校来发扬儒家传统。在他们的幕府，政府之中雇用了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官僚学者，帮他们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发表通电。通电中振振有辞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根据的理论。例如一九一七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段祺瑞打败了张勋挽救了民国，理由也是儒家的纲纪。^①再举一个例子。黎元洪一九二二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话说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②黎元洪了解的乱七八糟的根源也还是纲纪不振。

退一步看看军阀们的家庭生活，私人生活。兖州镇守使唐天喜的三儿子订了潘鸿钧旅长的女儿为妻，不幸唐公子一病死了，但是潘旅长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那个旧式贞节观念很强的女儿。消息最后由一个婢女透露了，女儿于是决定遵照儒家传统，抱灵牌跟死鬼结婚。过门之后两天仰药自尽。这件事大得河南督军张福来的赞赏，一面开追悼会，据报告有几万人参加，一面将潘家小姐的生平宣付国史馆。但潘旅长本人在济南发了疯，用枪把全家二十五口人杀死！这是五四运动之后五年的事。

湖南督军，提倡联省自治，进行过立宪选举的赵恒惕，家教也很严。但他的女儿跟赵本人的变童私通，有了孕，逃到上海。没有钱，女儿投身电影界，变童恢复他的“相公”生活。不久两个人都自杀了。这是五四运动之后十一年的事。^③

儒家的学说是指导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基本理论。理论的权威，结构的稳固，行为的效果都因为

①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卷四，二十六——九页。

② 沈云龙，《黎元洪评传》，一九六三年，一三二页。

③ 《时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

外国在中国的行为而发生了动摇，引起人们的疑问。从一八六〇年以来，儒家的权威一再受到外国行为，结构，和后来介绍到中国的理论的冲击而节节败退。在败退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卫道的说法——第一是“西学源出中国说”，第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两者都认为儒家传统了不得，“中国的道德天下第一”！

“西学源出中国说”简单得可笑，不必多说，只举编《湘军志》的王闿运为例子。他认为墨子见逐于圣门，往西边走，外国人把他的名字读错了，变成了“摩西”(Moses)。他带的矩就演变成了十字架。这样可笑的推论方法，在军阀时代还有人一本正经地在那里用。吴佩孚上将就说：“中国既为世界最古而又最大之国，则世界文化渊源于中国，实为事理之当然。”甚至科学技术的发明，吴大将军也认为先出自中国。伏羲时的奇肱氏和春秋时的公输子不是造过飞车和飞鸢么？据他说那就是飞机。诸葛孔明不是用过木牛流马么？那就是汽车。吴大将军竟不耐烦地说人类要那么多语言干什么？还不如都说中国话方便得多。^①

比较重要，影响也很深远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公式。孙传芳承继了张之洞的衣钵，主张“中学为精神，西学为辅助。”^② 吴佩孚认为治国的人以“内圣为体，外王为用”，军人以“忠孝为体，顺逆为用”。甚至孔子的基本道德——忠，恕，也可以分为体用。他说：“忠者恕之体，恕者忠之用。”^③ 这真是一分为二，天下无事没有体用的看法。

在张之洞提出体用学说的公式时，中国对西方学术的认识是：西方有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好坏判断的标准，所以要用

① 《吴佩孚先生集》，一四四，二七五——六页。

② 波多野乾一编，《现代支那之记录》，一九二八年一月，五十七页。

③ 《吴佩孚先生集》，一五七——八，一六八页。

中国的好坏判断标准,才能好好地用;西方也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但也没有好坏判断的标准,所以要加上中国的好坏判断标准,才能好好地用;西方又有宗教,那是西方的好坏判断标准,但是中国决不能接受,因为接受之后一定“人伦大乱”,“纲纪不振”,所以中国还得要保存本国的好坏判断标准。

中国好坏判断的理论和实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不必等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来提醒中国人的注意。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刺激了中国人集体地自省,检讨出自己许多不好的地方,放弃了一些自高自大的态度。于是梁启超才在他的《新民说》里^①把儒家的判断标准划为“私德”,而他所谓的“公德”来自他在日本和欧美考察的经历和 J. Bentham, J. S. Mill 等西方学者的著作。以家庭为社会单位的儒家的社会道德水准退回到家庭的范围里去了。在家庭以外,新的社会国家不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扩大的家庭。据梁启超的看法,得让西方的“体”来指导。

梁启超的一篇文章当然不等于一个社会或文化运动。攻击儒家传统的运动是五四时代才开始的。不幸的是这时候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渐渐为人放弃,西方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在欧战之后,西方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抱严厉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比较安静恬适的文化传统有向往之意。Bertrand Russell, Henri Bergson, Rudolph Eucken 就是例子。在中国甚至崇拜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如严复,梁启超,陈焕章,也开始怀疑西方文化的价值。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之外,也有保存国粹,建立孔教为国教,提倡和发扬东方精神文明之类的趋向。这些趋向发展为“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

^①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一三〇页。

运动。一般不很了解西方文化的旧学者,旧官僚,军阀,受了这些趋向的影响,深深了解儒家学说与军——绅政权的关系,于是以卫道君子的身份,由卫孔子之道来卫军——绅政权。一九一七年张勋的复辟行动显然受了康有为等人那种卫道思想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变成了卫道的一支独立的势力!

这时期的“道”要用军阀的武力才能有效地卫,我们就不妨以吴佩孚的文化思想来说明军阀的治国,治社会之道。《吴佩孚先生集》是我们主要的根据。

吴佩孚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是大乱的根源,^①一九二四年他和市村瓚次郎谈话时说,礼教是“天之四柱,孝弟忠信;地之四维,礼义廉耻”。^②要恢复这八德,五伦,三纲,中国才能到“升平之世”。礼教要保存的是传统的道德,社会的结构,中国的旧秩序。吴佩孚把旧秩序叫作“分”,每个人的“本分”。他的一部书题名是《循分新书》。凡是想改变旧秩序的学说都是造成混乱的学说,应该打倒。因此吴佩孚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孙文“祖述太西”,过分注重权利而忽略了义务。^③他这种反西方文化的态度在段祺瑞的《内感篇》^④里可以找到,也在张宗昌重印《十三经》的序文里可以找到。^⑤

至于共产主义那更是要改变旧秩序,使中国大乱的学说,万不可用。^⑥孙传芳也有同感。^⑦反对赤化的宣传说“共产军实行共产

① 《吴佩孚先生集》,一一八,一五三页。

② 《吴佩孚先生集》,二七九页。

③ 《吴佩孚先生集》,三九〇页。

④ 《政府公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⑤ 《社会新闻》,第十二集,第三卷一〇二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⑥ 《吴佩孚先生集》,四一八页。

⑦ 波多野乾一,《现代支那之记录》,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页。

公妻”，那就是改变旧秩序，很可怕，要禁止。^①连外国传来的音乐，吴佩孚也要批评，说是“桑间濮上，乃（淫乱）亡国之音。近于京津沪汉处多闻之，吾国社会紊乱实由于此。”^②也应该禁止。

保存旧秩序的基本在发扬孔子的忠恕之道。忠是体，是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恕是用，是推己及人。前者是义务，是受治于人的人的本分；后者是恩礼，是治人的人的本分。忠于谁哩？忠君，忠父母，因为孝是忠的根本。甚至极不守纪律的涂玉璜将军在天津招待记者时夸着口说他“事上忠，孝母，处友信，临民仁”。^③中国之所以在大乱时期而不亡国，原因在于吴佩孚所谓的“父老政治”（paternalism），^④保存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又不得最后归功于家族制，使中国人口增加，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外国人想亡中国而中国不亡，因为中国人太多而且在增加。^⑤

但是民国成立以后，君废除了，这就是吴佩孚所说的“民国成立首废礼教”。“君”没有了，忠“君”就只好变成忠于长官。^⑥这样才能上下有序，那个序是旧秩序。没有“序”，人就变成“衣冠而牛马”。^⑦如果长官不正，也不能劝他正，就只好模模糊糊地忠于正义，忠于职守，忠于心。^⑧吴佩孚本人用这样的忠的观念来服事曹锟。曹锟贿选总统不正，吴佩孚又不能劝他归于正，但吴佩孚仍然尽忠职守，跟张作霖打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之后，日本驻天津总

① 《春秋》，七十八期，九页；波多野乾一，《现代支那之记录》，一九二六年四月，三三六页；《时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黎锦熙，《中国教育史论》，下，卷三，一五五页。

② 《吴佩孚先生集》，一四五页。

③ 《时报》，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④ 《吴佩孚先生集》，二八三——四页。

⑤ 《吴佩孚先生集》，一四六页。

⑥ 《吴佩孚先生集》，四十八——九页。

⑦ 《吴佩孚先生集》，十五页。

⑧ 《吴佩孚先生集》，九十九——一〇〇页。

领事吉田茂劝他拥护段祺瑞。^① 吴佩孚拒绝了，理由是“大义名分”（旧秩序）不能打乱。打乱旧秩序，很可怕，那就是黎元洪说的“翻云覆雨，人道荡然”，好象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倒戈一样。

可是军阀时期“翻云覆雨”是军人政客常做的事。在翻覆的过程中，知名的军阀政客必须经过一段“自圆其说”的时期，有的公开宣布改变方向的理由，总用儒家的八德，五伦，三纲。这不但使孔子之道添了不少各式各样的解释，也使转向“翻覆”的人不大了解别的人为什么也可以找出“翻覆”的道理。军阀政客对自己有一个印象，对别人有另一个印象。自己的印象可以“自圆其说”，别人的印象却前后不一致。用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来说，那就得要“明层次”。一走进一间空屋子里，可以很合逻辑地说：“这间屋子怎么一个人也没有？”说话的人不属于“别人”那个层次。有了这种层次的分别，自己属于一层，别人属于另一层，那么就不妨用一套标准判断自己，另一套标准判断别人。哪有军阀政客把自己也叫作军阀政客的呢？

既然把儒家的道当作“体”，其它的文化传统就只能有“用”。问题既然这样单纯地解决了，所以军阀政客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体”，什么是“用”，而是怎样解决一切有害于“体”的问题，使中国重归于治。达到了治，再谈“用”的问题。在那些人的思虑中，其它的文化都是只有“用”的小传统，应该服务于“大传统”，在没有达到“治”以前，现代化的“用”是暂时的，次要的。办一两个手工业工场，^② 整顿一下市容，^③ 修桥运兵，^④ 那可以办。为了这到“治”，保卫“体”，

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事。《吴佩孚先生集》，四〇七页。

② 例如杨森在成都办火柴厂，《四川文献》，第五卷三十七期，十五——十六页。

③ 例如冯玉祥在西安的设施，James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1966, 105, 113.

④ 例如吴佩孚修洛阳大桥，二二二页。

借用新式工业的资本来打内战，^① 提用铁路的收入和车辆来打内战，^② 也没有说不过去的地方。军阀一面不提倡现代化，一面摧残中国的现代工商业，理由是想达到他们所谓的“治”。对流行的佛教道教的迷信，他们也抱同样的态度。吴佩孚，谭延闿相信卜课，^③ 张敬尧相信九天玄女能保佑他打胜仗，^④ 张勋请政府恢复道教张天师的真人位界，^⑤ 吴佩孚请第六十三代的张天师到汉口开水陆道场追荐亡魂，^⑥ 都是利用小传统来帮助大传统，使中国能重归于治。

从被统治的人的立场来看，中国的旧秩序和大传统应该变，应该打倒。打倒之后怎样哩？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同时改革的办法多半失败。在主张改革最坚决的人当中，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用他的思想来代表，根据的是《鲁迅全集》。

鲁迅也向往中国归于治，但是治于新秩序，不是旧秩序。人要的是生存，温饱，发展，凡是阻碍这三者的，一切祖传的东西——从丸散膏丹到天球河图——都要一脚踢倒。

传统的礼教是吃人的礼教；他早在《狂人日记》里就表示对礼教的憎恨。吃的人是妇女，青年，一切被统治的百姓。“试看中国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⑦

中国的“国粹”，第一，并不能保卫中国，也不能保卫中国人；第

① 例如张宗昌借开滦煤矿的钱，《东方杂志》，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二九页；刘秉麟，《中国近代外债史稿》，一七八页。

② 《政府公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八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③ 《吴佩孚军略书牍合编》，二——五页；《鲁迅全集》，第三册，二三三页。

④ 陈独秀，《陈独秀文存》，第二册，三五七页。

⑤ 胡适，《留学日记》，一九二九年，卷七，四五九——四六一页。

⑥ 《时报》，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

⑦ 《鲁迅全集》，第二册，四十七页。

二,如果国粹真的好,为什么中国的情形又如此之糟?要使中国归于治,与其囑望于学问,道德,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①不如囑望于年轻的一代和中国妇女。他要中国青年放弃他们所谓的导师,“荆棘塞途的老路”,自己结成朋友,联合起来,向可以生存的方向走。^②他要老一辈的人让开路,奖励年轻人向那个方向走。他对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女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派出去镇压他们请愿的枪林弹雨中表现出的从容,果敢,看出了这些良好的品质,“虽遭阴谋秘计,压抑了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他也从此看出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③

据鲁迅看来,中国的一切都得从新做起。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不是民国;许多民国的国民实际上是民国的敌人。^④要从新做起就得要改革,要战斗。他虽然是近代中国作家中最先注意到农民的人,写过闰土,祥林嫂,阿Q等农民,但要到一九三〇年代,在他“答一个托洛斯基派的来信”中才认识了除依靠本阶级的青年和妇女之外,“从新做起”得靠工农大众。

鲁迅所代表的是五四以来激进派的思潮。对传统,旧秩序,国粹,对青年和妇女,李大钊,陈独秀,吴虞等人抱相同的看法。李,陈,和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就从青年和妇女向前发展了一步,把推翻旧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工农身上。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走向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继续他们推翻旧秩序的工作,更使广大的中国农民参加了那一件工作。在那样的工作中他们才一点点地看出建立一个新秩序的蓝图和程序。

军阀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

① 《鲁迅全集》,第一册,五二五页。

② 《鲁迅全集》,第四册,六十一——六十二页。

③ 《语丝》,七十四期,二页。

④ 《鲁迅全集》,第三册,二十二——二十三页。

建立新秩序的思想，是这段时期中两个主导的趋势。两者之间还有中国新式的工商业家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那些想“一点一滴”改造中国的人。他们注意的焦点在一个个的问题，不在整个制度的改革。这些人在经济上有些贡献，在学术的介绍研究上也有些贡献。不过在守旧与激进两大趋势之间，他们的力量微弱。他们所希望的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等等都在军——绅政权的统治下失败了。

第十三章

军阀的仇敌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两支反对军——绅政权的势力聚集在广州，讨论他们摧毁军——绅政权的计划，锻炼他们摧毁军——绅政权的武器。这两支势力是改组中的国民党和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共产党。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从摧毁军——绅政权那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政治史上象征着一个新方向的开始：推翻军——绅政权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武装革命，用革命来达到中国的统一。其它的方法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完全放弃了。在革命的过程中，唯一可靠的国外友人是苏联，其它的“国际友人”在孙中山逝世后也暂时放弃了。

聚集在广州的这些反军——绅政权的是些什么人？国民党在一九一三年受袁世凯打击以来，进行了几次改组，到一九二三年参加北伐之前改组的党员中，很少是旧军——绅政权的人物，那些人留在北京参加曹锟贿选总统。在广州的国民党人，好些是小有财产，收入相当高，在社会上相当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他们的教育程度很高，政治活动的经验也相当丰富。这些条件保证了他们即使不革命也可以在现存制度中谋得个人的成就。他们参加革命为了改造中国。改造和改造以后的中国应该由他们那样的人来领导，只有他们才有领导的知识和经验，地位和尊严。广州国民党人中另一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和地位，教育程度和政治经验比较差，在现存制度中他们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个人的成

就。他们参加革命也为了改造中国，但是他们知道改造中国必需“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改造了以后的中国应该为他们自己和一般群众带来比较好的生活。

广东是军阀时代军队最多的省份之一，广州又是军阀环伺的城市。这两种人能在那里安全地改组国民党，准备摧毁军——绅政权，把广州附近的地方当作革命的基地，因为有一些同情革命的军阀的支持。那些是在军——绅政权之下受排挤，很不得意的军阀，一部分是在广东作“客”的滇军和桂军，受粤军和闽军的排挤，他们没有地盘，主要靠广州的财政收入来维持。他们也想改造中国，怎样改，改了以后的中国会怎么样？他们的观念很模糊。

换一句话说，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不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操纵的政党，而是小有产者，薪水收入者，知识分子的政党。在社会阶级的组成上，跟人数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显著的分别。他们对改造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很清楚的远景，那个远景叫做“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孙中山为那个远景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那是一九二四年的事。在那以前他也拟订了“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五权宪法”。他所憧憬的新中国不很清楚，达到那个新中国的步骤更不清楚。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达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步骤大概是这样的：（一）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一个新式的政党。这个党有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统一的组织。（二）由党来领导在广州的政治机构，和新成立的黄埔军官学校。（三）由党深入民间作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进行社会改革。这三个步骤在广东的革命基地进行，等到革命基地巩固之后，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用武力统一的方法扫除军——绅政权，赶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在党的指导之下准备民主宪政的实施，使中国成为三民主义的立宪民主国。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立刻呈现出分

裂的局面。上层领导人对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远景有不同的解释，对国民党的组织也有不同的主张。西山派，大元帅府，甚至国民党左派的高级领导人应该用模糊的政纲和私人感情来团结，抑或用党的纪律和训练来团结？统一中国的军政时期应该由高级领袖和军人来进行，抑或是应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来进行？

发动和组织群众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从左派的立场看来，发动和组织群众是积极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基础，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基础，是以党治军的基础。从右派的观点看来，是暴民政治的起点，是反对循序渐进的建国程序的起点，是篡夺党的领导的起点。群众问题又因为联俄容共面更加复杂。当时在华南社会改革的工作在苏联的指导之下由中国共产党员在那里进行。

因为华南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巩固，社会革命的工作还没有完竣，所以鲍罗廷(M. Borodin)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九二六年夏天开始北伐。^①陈独秀，彭述之都认为革命是群众性的事，必须有群众参加。军事的北伐而没有社会改革，只能增加农民的负担，那样的统一对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哩？

领导北伐的军事长官蒋介石只考虑军事，政治，不注意社会经济。他认为北伐的时机是一九二六年夏天。一旦错过，帝国主义者必然帮助吴佩孚，孙传芳，唐继尧。吴佩孚必然利用他控制之下的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京汉路的收入，武汉商埠的资源；张作霖必然利用奉天和德州兵工厂和津浦路收入，加之以日本的帮助，军力必然增强。那时进行北伐一定更加困难。^②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的北伐攻击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① L. Fischer,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London, 1930, II, 648; 《向导》，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八月八日。

②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八B，四下——五下页。

和北方军阀。^①至于打倒共产党，把共产党当成“唯一的敌人”，那是北伐第二期，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后的事。^②第一期北伐要打倒的是“北洋军阀”，但不包括东北的军阀。早在一九二一年蒋介石就说过“须视中国东北之作战，以为解决东方问题之导线。”^③为了只打倒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战略是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劝冯退到西北，保全实力，也就是不要“问鼎中原”；与四川贵州的军阀合作以防止唐继尧扰乱后方；与唐生智和江西军阀合作，劝他们参加北伐，因为湘赣是北伐必经之道；与孙传芳保守中立。^④所以北伐出师的口号是：打倒吴佩孚，中立孙传芳，不理张作霖。^⑤

北伐的军费和武器，在最初有一些苏联的帮助。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显然不能完全靠苏联。蒋介石估计北伐最初两个月的军费需要五百万元，由革命基地广东负担。^⑥实际上北伐最初十个月广东一省每月担负的军费就是一千万元。此外湖南，湖北，尤其是武汉筹集的军费远超过广东的担负。蒋介石的军队在武汉出卖湖北政府的不动产二千一百万元，又发行公债，不兑换纸币，和收税。^⑦武汉的经济能力有限，这从北伐江西之战国民革命军欠发军饷可以看出来。^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蒋介石在取得武汉之后，决定用广东和武汉的资源东下攻上海。占了上海之后，蒋介石估计每月军费需要二千万。^⑨主要来自上海的公债一万四千七百万。^⑩

① 《蒋介石北伐誓师词》，见《蒋总统集》，一九六一年，第二卷，四七〇页。

② 《蒋介石在南昌讲话》，见《蒋总统言论汇编》，一九五六年，第九册，二十七——八页。

③ 王德胜，《蒋总统年表》，一九五六年，三十页。

④ 董显光，《蒋总统传》，一九五四年，第一册，七十二——三页。

⑤ 《东方杂志》，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二十七页。

⑥ 沈凤岗编，《蒋委员长全集》，第五册，十五页。

⑦ 《革命文献》，第十三册，二三四页。

⑧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八A，九十九下页。

⑨ 《蒋总统言论汇编》，第四册，四十一页。

⑩ 朱骝，《中国财政问题》，一六五——六页。

公债由上海的银行包销,也就是所谓的“江浙帮”包销。^①为了取得上海银行的支持,蒋介石付出了些什么样的交换条件我们不知道。甚至上海武汉的资源也不能保证国民革命军的纪律。湖南之战时军纪还不错。^②在武汉,九江,济南军纪越来越糟,抢劫的事越来越多。^③

国民革命军军纪败坏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北伐途次收容了许多军阀的军队。例如国民党代表熊式辉到瑞金去见江西第四师师长赖世璜,赖投降于国民党,交换条件是由国民党接济军饷。^④守南昌的蒋镇臣,唐福山也是收买过来的。^⑤其它类似的例子很多,这就是“易帜”的意义。投降之后又不加以革命思想的训练。刘汝明,佟麟阁那样的师长,要他们读三民主义,他们觉得“未免予人以滑稽之感。”^⑥

军纪不好并不限于士兵的抢劫,官长之间的合作也很成问题。蒋介石订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渡长江北伐,但战事真正开始在四月七日,延迟了七天。这七天之中张作霖与孙传芳能全力对付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⑦蒋介石也扣着不发第二,三,四集团军的军饷,达六个月到八个月之久。^⑧

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有四个集团军和其它军队一共八十二个军,人数在一百六十万以上。这当中真正属于国民党嫡

① *The U.S. Daily*, May 23, 1927; *The Times*, April 24, 1927.

② *The Times*, September 1, 1926, October 23, 1926, May 23, 1927.

③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April 8, 1927, November 14, 1927, November 15, 1927.

④ 《革命文献》,第十三册,二四七页。

⑤ 《革命文献》,第十三册,三八〇页;波多野乾一,《记录》,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页。

⑥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一九六六年,九十六页。

⑦ *The Times*, April 11, April 18, 1928.

⑧ 冯玉祥,《回忆录》,一九四九年,十七页。

系的军队不过九个军，其它都是从前军阀的军队。估计军费支出要三亿八千万元！而政府的收入不过四亿五千万。扣除债务费用之外，政府的收入只有三亿二千万元！^①

北伐所及的地区有限。东北，外蒙，内蒙，新疆，西藏，青海都在北伐的范围之外。山西，西南三省，两广也在北伐的范围之外。除了广东是革命的基地，这些广大的地区中旧军阀照样地维持他们的地盘，防区。“易帜”并没有改变割据的现实，军阀时期的分裂依旧。

北伐所影响到的地区是主要水道和铁路沿线的城市和乡村。国民革命军打击了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之后，乡下的军——绅政权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全国性的政治机构中，大银行大企业的势力抬了头。这就是说，国民党在北伐途中，从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的小有产者，知识分子的政党，变成——由军人，绅士，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名义上由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也是军人，绅士，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能控制大城市和富庶的农业区的军队，靠土地和资本的收益来维持军队；不能控制大城市只能控制土地的军队，仍然靠土地的收益来维持。在省以上是军——绅——资产阶级的政权；省和省以下是军——绅政权的继续。这并不是真正统一的局面。

不过在北伐以后大家有了一个共同接受但没有一致的解釋的政治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家承认（一）贪污，腐败，无效率的行政机构应该改革；（二）中国应该进行经济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的领袖和地方割据的势力竞争。于是有了山西的模范省，广西的建设，冯玉祥的廉洁奉公的作风等等，来为他们割据中国辩护，好象在说：“看，我们的割据比中央统一还要好一

^① *The Times*, December 24, 1928.

些。”但割据还是武力割据，它一天存在，内战就一天不会停止。

北伐消灭了“北洋军阀”，但并没有消灭军——绅政权，没有消灭军阀割据的局面。

至于帝国主义哩？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谓的帝国主义指一切不平等条约——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和由外国人管理关税，和一切其它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这一切都应当取消，代之以平等互惠的新条约。^①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国民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对外，国民党应该联合革命之先进国，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压迫的人民；对内，国民党应该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工具——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②

北伐初期的反帝政策以一九二七年初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为最高峰。接着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南京事件。在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抢劫放火，杀死了三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美国人，此外有几个日本人，两个美国人，两个英国人受伤。^③ 于是英国和美国的军舰开炮，同时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④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件。这也是以反帝为口号的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与帝国主义势力接触。蒋介石的反应是对外国记者申明国民革命军对外国友好的态度，答应尽力保卫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⑤ 他说国民革命军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⑥

① 《中国国民党历年宣言汇刊》，六十三页。

② D.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291-5.

③ *The Times*, March 28, 1927; D. Borg, *ibid.*, 295.

④ *The Times*, April 12, 1927.

⑤ *The Times*, April 1, 1927.

⑥ *The Times*, March 23, March 28, April 12, 1927.

南京事件解决的办法是惩办肇事的人，赔偿损失，向各国道歉。^①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与帝国主义势力接触在山东济南。为了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田中首相下令攻击国民革命军。损失很严重。蒋介石军队应付的办法是退出济南，避免战争。他的态度是：“彻底考虑国家民族存亡问题，乃决定暂时忍让，先求国内统一，而后抵御外侮。”^②

济南事件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显然有了性质上的变化。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的对外宣言，清楚地说：“中国既不能忍受国际的压迫，亦不能生存发展于一种国际孤立状态之中。我人经济政策之完成，势不能不有赖于诸友邦之赞援。”^③这时所谓的诸“友邦”已不是一九二六年的“革命之先进国”苏联，而是日本，英国，美国等等。

“暂时忍让，先求国内统一”，“经济政策之完成，势不能不有赖于诸友邦之赞援。”这是“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开始。于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统一（思想，政治，财政，军事的统一）。统一之后，国力充实之后，“外交上方有胜利可期。”^④从“暂时忍让”变成了长期的妥协，甚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件，日本占据了东北，也还不是蒋介石起而领导抗战的时机。

这一段时期中，中国的外交政策，远东的国际局势，受着四个原则的影响。英美的原则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一方面保护中国表面上主权的完整，一方面保护十九世纪建立的条约系统。这一

① D. Borg, *ibid.*, 382—383; *The Times*, March 19, 1928.

②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一九五四年，第三册，三十二页。

③ 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一九二九年，二〇四页。

④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一九五四年，第三册，二六一页。

个原则在废除了英日同盟之后，连一个守门户开放的看门人也没有。这是保存中国现状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和美国国务卿蓝辛(R. Lansing)讨论的“东亚门罗主义”(East-Asian 'Monroe Doctrine')。日本与中国毗邻，犹如美国和美洲国家邻近一样，于是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些利益必须保护发展。第三个原则是苏联的反对帝国主义，要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建立的制度。第四个原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省的民族主义(先安内而后攘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最后的目的也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益。

以反帝反军阀为目的而集合在华南的革命势力，在北伐途中改变了他们反帝反军阀的看法和战略。反帝变成了“先安内后攘外”。安内变成了收买，易帜，让军——绅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在表面的统一之下内战和分裂依旧。北伐好象是一件劳而无功的事(Much ado about nothing!)。

第十四章

结 论

在前面的绪论和十三章分析之中，我们没有追溯中国近代军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们觉得那样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史学上的意义，也不一定能得出圆满的答复。北洋和南方军阀都是在一八九五年以后练新军才逐渐形成的军事势力。他们变成军阀的过程是在义和团之战以后，中央势力渐趋微弱，地方势力抬头，到清室退位，民国成立时期的事。这个新兴的军——绅政权之所以不能统一中国，一方面是派系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地区的分裂。派系的分裂象征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地区的分裂象征着既得利益不能调和，养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我们认为要了解军阀时期的政治问题必须集中深入地分析地区的分裂和派系的分裂。

地区的分裂表现在南北之争，北方内部之争，联省自治等方面，派系的分裂表现在内政外交之争，宪法与传统之争。这些争斗挑动了许多次内战。养兵，内战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使中国陷入长期产业衰落的局面。为了解释养兵和内战的理由，军阀和附属于他们的绅士变成了卫道的人，反对内战反对军阀的人走向了新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绅割据的激进的政治社会思想。

一开头，我们就说明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军队不是现代国家的军队，军——绅政权也不是现代国家应有的政权。从日本，德国，

俄国这三个比较晚近的工业化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对工业化,现代化有很重要的作用。首要的作用是维持政治安定的局面。即使政府不积极参加工业发展的工作,至少也应该使货币制度统一,稳定;发展交通运输;发展一般的科学技术教育;用关税或其它政策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其实,德国,日本,俄国的政府都在工业发展,金融事业的发展,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三个国家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中国军——绅政权的记录跟德,日,俄的发展途径正相反。它造成中国政局的不安定,破坏和阻挠交通运输,摧残中国的教育,搅乱中国的货币制度。在它统治期间,中国新式工业的进步跟军——绅政权毫无正面的关系。

据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 Carl Riskin 的研究,^①一九三三年中国的剩余生产(消费之余的生产)占全国国内净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农业,三分之一来自其它生产事业。但是用于国内新式工业投资的剩余生产不过全国国内净生产的百分之二。一九二〇年代的情形也差不多。又根据谷春帆的估计^②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中国新式工业,包括生产工业,交通运输,矿业,总资本积累不过九亿八千七百三十万元。如果把这个数字来跟中国军阀统治时期,十六年中的军费来比较,我们也许可以看出军——绅政权怎样阻挠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以每一个士兵每年需要一百二十元的饷为标准,根据我们在第六章中估计的军队的人数,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中国的军费最低在二十四亿元左右。如果中国能裁兵到五十万人,那么

①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D.H.Perkins,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1975, 75—79.

② 《工业化通论》,一九四七年,一六〇、一六九——一八〇页。

这十六年中可以节省军费十五亿四千万元，这已经就超出中国工业总资本额五亿五千二百七十万元。如果加上北伐以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军费，再加上团防土匪的费用，中国用来打仗的费用会几倍于新式工业的总资本。

关于军阀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都把军阀当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爪牙。一九二〇年张作霖对园田一龟说吴佩孚受美国人操纵，于是园田就说吴是“亲米派の头目”。^①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举出一些英美商人跟吴佩孚作军火生意而证明英、美政府支持吴佩孚。^②蒋介石也说香港的英国殖民地政府暗助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军在广州作乱。^③这些罪名不是不可能，问题在如何证明。正如密勒（T.F. Millard）所说的那样：“那样的事在中国当然有，但是通常通过中国或外国的银行，跟英国没有明显的关系。”^④只有日本在支持中国军阀时不大小心，跟段祺瑞、张作霖的关系好象是公开的事。很容易证明。

中国在军——绅政权统治时期不能捍卫中国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至于他们是否甘心做外国统治中国的爪牙，那是“意愿”的问题。在历史上要证明“意愿”（intentionality）是很不容易的。张作霖一生受日本的帮助也帮助日本统治东北，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似乎毫无问题。但他也发展了南满中东两个铁道系统之外一个独立的铁道系统。田中内阁决定出兵山东，他公开提出抗议。他之干预北京政治是日本人极力反对的。这些事又似乎说明他不愿意作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

湖北督军王占元在五四运动时对武汉学校校长谈话，“我国既

① 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大正十一年，二七五页。

② 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大正十一年，二〇六页。

③ 沈凤岗编，《蒋委员长全集》，卷一，四十八页。蒋认为陈炯明与英国也有勾结。

④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1926.

无实力，何可言外交，何可享国际平等权利？只要不吃大亏已属万幸。”^①王占元怕帝国主义，但很难说他甘心作帝国主义的爪牙。在五卅运动时期，闽北，陕西，四川，江浙，湘西的内战并没有因为全国反帝的高潮而停止。参加那些内战的军人破坏了民族主义的势力，但历史学家不能气愤地说：“这些人毫无心肝，简直甘愿作帝国主义的爪牙！”

在缺乏确切的证据的情形下，与其推测军阀是否甘心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如从他们的行为和政策来说明他们是否是民族主义者，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者。那我们在第八章里讨论过了。

在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努力于平定内乱，开始了所谓的“同治中兴”。那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开始。同时，德国的统一，日本的维新，俄国的农奴解放，美国的南北战争，意大利的统一，这些主要的国家也走上了工业发展的道路。到十九世纪末，只有中国和土耳其是失败了的国家。

中国现代化的失败是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历史中一个极重要，也极有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中国现代化失败于传统的绅——军政权的阻挠，恐怕不会犯很大的错误。那个时期中工商业和农业没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结构上与作用上的联系，企业组织由官办或官督商办，教育仍然由传统势力把持，社会结构没有适应现代化的变迁。这一切保守，阻滞的政策都得归之于绅——军政权。那样的政权中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两湖总督张之洞。张文襄公主办汉冶萍煤铁事业和芦汉（即京汉）铁路。两者都失败了。但他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公式，来总结绅——军政权对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和态度。那个公式也是中国现代化最顽固的阻碍。那和明治天皇的誓言，从全

① 《时报》，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世界吸收知识以巩固帝国的国基，有天渊之别。

前面十四章中我们解释了一九一二年以后的军——绅政权怎样承继了这个公式。更加上内战，重税，对新兴事业的摧残，又把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延迟了三十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开始，中国才达到统一，一致对外。但是八年的战争不可能是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真正有计划的现代化的工作在一九四九年才真正开始。

前有绅——军政权，后有军——绅政权，阻挠中国的进步几乎达一个世纪！

我深知在中国以外台湾香港等地的高级知识分子还在那里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保存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来保存中国人固有的宝贵的品德。他们的基本公式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也知道在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之间，派系斗争也是很严重的。学术意见之争常流为私人派系之争。凡有中国社团的地方，派系之争总不能避免。

派系的斗争到处都有，但是不受规章，纪律，宪法约束的派系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大特色。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如果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保存派系斗争的传统，我以为那样的传统还是送进博物院，研究室，寺院，庙宇里去保存的好。

附 录

军官团与军官团的精神

一九七七年底草成了全书之后，读到一些美国年轻学者讨论中国练兵的文章，他们邀请我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到芝加哥东方学会的年会上讨论他们的论文。于是有这一篇附录之作。

一九七八年二月记

一八六〇年代李鸿章，左宗棠派了几十名军官，在外国教练指导之下学习洋操。^①那时旗兵，绿营，湘军的军官，跟早期欧洲和日本的军官一样，由父传子或师传弟子的方式受军事训练。日本有剑术的“道场”，有一些同门弟子的精神和共同生活方式——也就是武士道。欧洲的军官还没有军事学校，但多半是贵族子弟，有贵族的精神和共同生活方式。中国的旧军官既不由贵族或武士阶级出身，又没有独立的军人精神。他们理想的军人是儒将，跟师爷，税吏一样，是专家不是通人，需要通人（士大夫）的指导。这当然是士大夫从思想方面统驭军人的办法。

军人受了儒家的训练，一方面能在儒家统治的社会中求得生活的地位与生活的规则，另一面能在儒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与士大夫共同处理国家的问题。中国传统军人的精神是儒家的精神。军官没有学校，也不过共同的生活。所以《湘军记》卷二十第一页

^① 《清史稿》，《兵志》，卷三。

说：“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这是缺乏共同生活所造成的。

一八七六年李鸿章派了七名军官到德国去学军事。这是中国半新半旧的军队已改用洋枪，而且用后膛枪，演习露营，野战，攻守之法。^①同时德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帝国，经过Scharnhorst, Moltke等人的改良，德国陆军不但洗雪了一八〇六年耶拿(Jena)之败的耻辱，而且在色丹(Sedan)一战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陆军。

我们知道那七名中国军官在柏林附近学军事，他们学的只是步兵。据《清史稿》《兵志》上的一点材料看来，他们回国之后改良了士兵的操法，阵法，也训练士兵用“水雷”，“旱雷”(mines)，而且介绍了电学。在德国时期，即使有语言的困难，他们观查了操练，露营，行军，也学了一些课本上的知识。

这些拖着长辫子，穿着朝靴的军官，大概从没有加入过什么军官俱乐部(Kasino)，对俱乐部内军官生活的情形大概一无所知，恐怕也不了解俱乐部对军官团精神的培养有什么作用。

普鲁士(Prussia)的军官学校(kriegsschulen)是在炮兵与重炮广泛应用以后才建立的。但贵族子弟对书本，学习仍然抱轻视的态度。固然在德国不同的地方，军官训练的重点不同，军校的传统也不同。最初派去的中国军官，学的恐怕不是工程，军医，军法之类，而是带兵打仗的军事技术。那样的训练仍然受到普鲁士军人精神所笼罩。训练的军官的性情的锻炼，天性的发挥为主，知识和思考能力的发展是极为次要的。除了课本的知识和操练之外，中国学军事的那几位军官恐怕对德国军人发挥军人性格的方法一点也不知道。

后来中国送了不少军事学生到日本学习。就本世纪初中国在

^① 《清史稿》，《兵志》，卷三。

日本学军事的人的文章看来，他们了解“大和魂”，“武士道”等观念，但是很少提到这些精神和行为标准是怎样形成的。

这里我想插一句话。德国，日本的军人有轻视书本知识的传统，中国军人不一定崇拜书本。中国一面有关羽读《春秋》的儒将传统，另一面也有班超投笔从戎的传统。蒋介石对黄埔学生训话时就指出文人是优柔，放纵，文弱，自由的人。^① 军人不应该有这些坏习气。

但是在德国和日本，中国的军事学生大概跟其它中国学生一样，注重功课和操练，不参加校内或军官俱乐部的共同生活。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不了解军官俱乐部的重要性，也不了解军官团形成的文化因素以及军官团的精神。

在外国受过训练之后，回国，译书编书，例如《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从北洋陆军学校直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用的军事学书籍，各大学图书馆收集得不少，但是军事史家从不注意这些资料。竹内实教授最近在《思想月刊》上（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月）发表的“现代中国人の视角”，才算有系统地运用了《黄埔丛书》来研究黄埔训练军官的历史。

单就秦德纯的回忆录来看吧。他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员大将，一九〇八年入济南陆军小学，一九一一年入北京陆军中学，一九一三年入北京军官学校，一九一四年入保定军官学校，最后在一九二〇年入北京的陆军大学。在这些学校里他学过战略，战术，战史，射击，兵器，筑城，野外演习等等。他也学了日本文，德文，英文，物理，化学，数学等等科目。用了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学科，在中国战争条件之下，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中国的内战科学的成分很少，仍然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猜谜的玩意儿。

① 《蒋总统言论汇编》，一九六六年，卷九，六十五页。

但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军官有同学之谊。他们常互相推荐，在同一个单位中工作，好象四川军人中的速成系，保定系，国民革命军中的黄埔系。同学同事关系在各单位中形成了军官团，犹如十九路军的军官团。^①这样的军官团可能相当稳定，相当持久。但是它没有军官团的精神。

军官性格的培养主要在建立军人的荣誉观念。军人的第一职责是战争，在作战时最不荣誉的事是怕死。课堂，操场上训练的一个中心是消除军人怯懦的心理。这一方面需要道德的训练，另一方面需要一些制度——如决斗，残忍的待遇，处罚等等。德国军人的荣誉观念一方面来自基督教的信仰，一方面来自日耳曼人民英雄事迹的传说。日本武士的信念和日本传统英雄事迹是日本军人荣誉观念的来源。

中国军人的荣誉观念来自何处呢？又什么制度来加强荣誉观念呢？

以蒋介石在黄埔练兵为例罢。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蒋介石对军校学生训话，“宁肯学生军事学知识浅一点，不算什么。最重要就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②

黄埔的学生不是“人类的渣滓”，而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这些人不能象日本的武士或德国的 Junkers 那样，用残忍的办法来发挥他们残忍，不怕死的精神。他们既没有夸张的男人性质，也没有比武决斗的风气。要这样的人明白做人，做军人的道理，得用说服的方式。说服的方式发挥的是军人的头脑，不是军人的天性，性格。

黄埔的校训是“亲爱精诚”，不是绝对服从。意志集中，精神训

① 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一九六九年。

② 〈蒋总统言论汇编〉，第九卷，一八一页。

练要经过说服的方式，所以蒋介石就不断训话了。说服，一方面是为别人所说服，一方面是自己说服——那就是孔子的教诲和修身的两个方法。说服的内容是集大成的三民主义，那是当日的革命理论，从那里推演出革命的人生观——做人的道理。

单靠说服太慢，而且有时碰着愚玩的人行不通，所以也得用纪律。蒋介石的军纪有两个意义：纪纲和惩罚的规则。纪纲是儒家的三纲五常，纪律是由外而内的整齐划一的训练。^①那样一来，蒋介石在黄埔用儒将曾国藩，胡林翼的方法来治军，训练学生，以三民主义为辅佐，也就毫不足怪了。他所谓的理想军人是儒将加三民主义的战士。此外在表面上他也采用军营中各种制度——俱乐部，小组讨论，宿舍的整齐清洁等达到行动敏捷一致的目的。

蒋介石到底是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人，要一个日本学者，竹内实先生，来指出他对死的看法和不怕死的观念。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那是司马迁的老话。中国革命比死（也比生）更重要。怕死是“没有血性”，“没有志气”，跟下等动物一样。^②

志气，体面，名誉，血性——这是蒋介石所谓的荣誉。这也就是他想培养的军官团的精神。除了教诲修养之外，他的军队最初有一个统一的军需制度，那也是保证军官团的精神一个重要的制度。国民党领导政府，政府以军需和思想来领导军队。如果国民党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的互相矛盾的解释，国民政府不能供应军需，那么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团精神就要涣散，国民革命军与其它的军队军阀军队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那样的情形在北伐途次发生了。

黄埔的军官团继续存在，但是北伐之后没有军官团精神。中

① 《蒋总统言论汇编》，第九卷，四十四——四十六页。

② 《蒋总统言论汇编》，第九卷，四——五，一二四，一四四——一四五页。

国的军队能有无独立精神的军官团，这是我们初步的结论。

再看看毛泽东练兵的方法，那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部分。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为以党治军订下了方针。这有三个要点：打破军队与政工人员的隔阂，打破军人与群众的隔阂，打破军官与士兵的隔阂。他要的是平等精神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加之以游击战或运动战不必要军官有近代化专业的训练，于是红军军中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一个军官团。

红军的士气来自政治训练和军纪。红军的目的是革命；团结的基础是同志的感情。从制度方面来看，他们大量利用小组讨论，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批评达到思想，目的，行动的一致。红军也利用俱乐部，文娱活动，同食同住等等办法来培养军队的共同精神。

我们第二步的结论是，在中国养成军队共同的精神不必一定非有军官团不可。